

炎黄春秋

第 **6** 期
2008年

教育投资体制：从过去看未来

我们向毛泽东告迟群

请理解李慎之

《译林》事件始末

朱元璋为何把孟子清出孔庙

中国 中国 中国 泪流满面

本刊编辑部

三百公里的伤口
划破巴蜀大地
撕裂十三亿华夏儿女的心
中国哦，泪流满面

目光，聚焦在汶川
行动，凝成一道道生命线
关爱和真情
在颓败的废墟上浴血升腾
无数震撼人心的片断
我们泪流满面
中国哦，泪流满面

抓紧妈妈的手

——献给在汶川大地震中遇难的孩子

孩子

快抓紧妈妈的手
去天堂的路太黑了
妈妈怕你碰了头
快抓紧妈妈的手
让妈妈陪你走

妈妈

怕
天堂的路太黑
我看不见你的手
自从倒塌的墙
把阳光夺走
我再也看不见
你柔情的眸

孩子

你走吧

前面的路
再也没有忧愁
没有读不完的课本
和交不完的考卷
你要记住
我和爸爸的摸样
来生还要一起走

妈妈

别担忧
天堂的路有些挤
有很多同学朋友
我们说
不哭
哪一个人的妈妈
都是我们的妈妈

哪一个孩子

都是妈妈的孩子
没有我的日子
你把爱给活的孩子吧

妈妈

你别哭
泪光照亮不了
我们的路
让我们自己
慢慢的走

妈妈

我会记住你和爸爸的模样
记住我们的约定
来生一起走

(这首诗在网络和手机短信中广为流传，本刊特予转载)

目 录

求实篇	
2 教育投资体制：从过去看未来·····	思 源
亲历记	
9 我们写信告迟群·····	唐少杰
16 朝鲜停战协定签署仪式和战俘谈判·····	阎稚新
人物志	
20 好一个“小兵”金敬迈 ——《好大的月亮好大的天哪》摘记·····	李南央
25 请理解老一代 ——怀念李慎之·····	刘志琴
治方杯征文	
29 走在艰难平反路上的一年·····	何 方
36 恳请不任内蒙古区党委书记·····	孙 奇
38 胡耀邦谈“反对精神污染”·····	魏久明
43 《译林》事件始末·····	施 亮
沉思录	
50 集体世袭与“权力场”·····	杨继绳
53 能反省历史的民族才有光明的未来·····	资中筠
55 继承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遗产·····	马 向等
怀人篇	
61 怀念爸爸李斌·····	李 静
65 托派老人刘平梅·····	段 跃
一家言	
69 “带病提拔”症结何在·····	谷 翔
72 样板戏进课堂有感·····	王海光
随想录	
74 经济发展随想三则·····	杜润生
品书斋	
75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的文学史定位·····	鲁 煤
76 一把手更需制衡 ——读白石新作《上任以后》·····	肖 荻
古今谈	
77 朱元璋为何要把孟子清理出孔庙·····	陈 虎

顾问：
杜润生 李 昌 于光远 李 锐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俊义 方 实 冯 征 冯 健
冯其庸 曲润海 朱厚泽 李 普
李一鑫 李冰封 李维民 杨继绳
杨天石 吴 象 宋木文 苏双碧
张岂之 张文彬 张荣华 何 方
杜导正(召集人) 范敬宜 金冲及
钟沛璋 徐 孔(副召集人) 袁 鹰
凌 云 萧蔚彬 曾彦修 彭 迪
韩 钢 雷 颐 魏久明

社 长 (法定代表人)：杜导正
副 社 长：徐 孔 杨继绳
常务社长、总编辑：吴 思
执行主编：李 晨 徐庆全
社长助理兼编辑室主任：赵友慈
社长助理兼办公室主任：胡竞成

理 事 长：杜导正
副 理 事 长：莊其環 李 琼
理 事：白建钢
秘 书 长：徐 孔
副 秘 书 长：杜明明

主管、主办单位：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本刊常年法律顾问：
张思之 (吴奕赵阎律师事务所 010-68083211)
步凌云 (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 010-85869163)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ISSN1003—1170
国外发行代号：1274M
国内总发行：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订购处：全国各地邮局(所)
网络电子版全球总代理：龙源期刊网
网址：www.qikan.com
印刷：唐山市润丰印务有限公司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编：100045
本刊电子信箱：yanhcq@sina.com
电话：发行部：010—68532048
编辑室：010—68534879 68523512
办公室：010—68522852
传 真：010—68532569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0296号
出版日期：每月4日
定价：5.80元

教育投资体制： 从过去看未来

思源

中国提出教育改革,从1958年算起,已经半个世纪;从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发布以来,也有15年了。应当说,工作做了不少,争论也不少。其中有一个问题似是而非,却又争论不休,每每令人欲说还休——请问:是教育部办学还是学校办学?

当今中国除了13万所学前教育机构以外,大中小学共有42万多所。这42万多所学校都由教育部办?简直是对教育部的莫大讽刺。似乎毫无疑问应该是由学校办学。然而大学、中学、小学,如今都在抱怨没有办学自主权。在这遍及城乡的校园呼声后面,反映的是目前中国教育体制的一个主要弊端:高度集权、高度垄断和单一化。针对这一主要弊端,现代中国教育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应当是教育多元化。这是人类社会生活多元化的需要,是满足人们多样化教育需求的必然途径。也可以说,没有多元化,现代教育便难以发展。

教育多元化的内容十分丰富,简单罗列一下,就有十多项,诸如教育投资多元化、办学主体多元化、办学体制多元化、办学目标多元化、办学方式多元化、教育供给多元化、教育需求多元化、教育领导体制多元化、学校内部管理体制多元化、教育效益多元化、教育发展途径多元化、教育发展策略多元化、考试制度多元化、招生制度多元化等,不一而足。

纷繁之中,何为关键?关键在教育投资多元化。这是因为,投资所有权不仅可以决定投资的性质,而且往往决定教育事业的特点。一个国家教育投资如果全部或大部分由政府负担,那么,与此相应,整个教育事业就难免会由政府垄断包办,教育多元化及其他多元化便没有生存基础。

据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2005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共计5161亿元,是社会团体、公民个人办学经费(不包括学杂费)以及社会捐资、集资办学经费总和545亿元的9.5倍。正是这么多的国家投资,使公办学校占据了学校总数的95%,这就是高度集权和单一化的雄厚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教育部就是每年几千亿元国拨教育经费的监护人,你叫他放手不管,不行使决策权,行吗?

根本出路在于采取各种措施鼓励和调动社会团体、企业和公民个人投资教育的积极性,一方面减轻国家财政的压力,另一方面提高非国有教育投资的比重,使之达到三分之一乃至二分之一左右,真正开创一个教育投资多元化的局面,其他的多元化也就水到渠成。

国家有责任将义务教育延长到12年

教育投资多元化主要包括两个问题:一是国家要负全责保证全体适龄少年儿童都能享受免费的义务教育;二是鼓励社会团体、企业、公民个人投资参与兴办大中小学和学前教育机构。我们不妨先从义务教育谈起。

多年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协不断有人呼吁,建议将中国义务教育的年限由9年延长到12年。2007年秋季开始,珠海市中小学已在全国首开12年免费义务教育之先河。2008年的“两会”一开幕,12年义务教育的呼声再起。

3年的高中或职业高中教育对于初中毕业生来说,可能会改变他们一生的命运。用法律的强制性把义务教育延长3年,对提高下一代公民的素

质、提高国家的软实力、强化发展后劲，意义实在是太大了！

面对“议员”们的动议，教育部长断然拒绝。据《北京青年报》2008年3月8日报道：教育部部长周济明确表示，目前不会考虑将义务教育时限延长到12年，目前这种建议在我国没条件实现。义务教育意味着政府要对整个教育阶段负全责，目前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实现了在高中阶段义务教育，但这不符合目前中国的国情和政府的财力。我们不能对教育的实施水平目标过高，我国的教育能力还是相对比较低的，因此提出将义务教育延长到12年，目标过高，很难实现。

周部长没有具体说出12年义务教育究竟如何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和政府的财力，但世界上现已实行12年义务教育的并不仅仅只有日本、韩国和我国的台湾，而是遍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像拉丁美洲的古巴，经济发展远不及中国，他们也实行12年免费义务教育。不但学杂费全免，连校服费也全免，还免费提供午餐。目前全球90%以上的国家都实行了全部免费的义务教育，连亚洲一些知名的穷国，包括人均GDP只有中国三分之一的老挝、柬埔寨、尼泊尔等国也是如此。据2003年9月8日《义望东方周刊》报道，缅甸联邦军政府也实行了12年义务教育。学龄少年儿童入学，不但不用交学杂书本费，还解决吃饭、穿衣及住宿等。来自外邦的穷人同样能享受如此待遇，以致于中国云南临沧边境地区不少孩子跨过国界去求学，直至高中毕业才学成归国，成了小小的“海归派”。让我国同胞不能不脸红心跳。

2006年3月20日人民网曾报道，中国教育部长周部长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还说到，普及9年义务教育的奋斗



“希望工程”给贫困的孩子带来希望，却杯水车薪

目标，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就已提出来的。60年了，各项事业都在与时俱进，义务教育的奋斗目标为什么偏偏不能与时俱进，不能由9年前进到12年？！

众所周知，政府是人民的公仆，政府办义务教育，不能随心所欲，随意而为，这是政府对人民应尽的义务和职责。正因为如此，世界上100多个国家都将公民受教育的权利在宪法中作了详细的规定。

如日本宪法规定：一切国民，按照法律规定，都享有同等受教育的权利。一切国民，按照法律规定，都负有使受其保护的子女接受普通教育的义务。义务教育为免费教育。如白

俄罗斯宪法规定：每个人都享有受教育的权利。保障免费接受普遍中等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这些国家宪法的教育条款，对于我国颇有借鉴意义。

中国有个口号叫做“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可惜至今为止这还只是一句口号，并未落实。1991年世界平均公共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为5.1%，其中发达国家为5.3%，发展中国家为4.1%。我国1993年发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规定：这一比例要在2000年达到4%，却迟迟没有实现，2003年还只达到2.84%，2004年更降到2.79%。据专家计算，仅1993—2003年间，全国财政对教育经费的欠账高达9391亿元。

国家教育经费欠账的后果有二：

一方面使老百姓的学费开支增加，不堪重负，以致全国失学儿童高达2000万人。中央电视台2005年6月18日介绍：一位老实巴交的农民，为了让孩子能上学，铤而走险搞起了贩毒，最后梦想破灭。另据报道，宁夏银川市13岁的小学毕业生秀秀，因不忍心让家长背上沉重的择校费，而悄悄

地离开人世，她留给父母的遗书里有一句话：“我死了可以帮您节约 10 万元”。此话叫人如何不心痛！

另一方面，教育经费不足，使许多学校教学场地和设施短缺，导致老师带着学生在马路上跑操的情况，在全国各地相当普遍。正因为如此，2005 年 11 月 14 日早晨 6 时，山西沁源县第二中学师生在马路上跑步被一辆货车撞倒，21 条鲜活的生命暴亡，哭声震撼山河。尤为可怕的是，此类悲剧的隐患至今尚未消除。据《北京青年报》2008 年 4 月 3 日报道，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委托独立研究机构对全国 12 个省（区）的 34 所希望小学进行了体育运动状况的抽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没有专门运动场地的学校高达 47%！

目前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义务教育公共投资的主体是中央或地方高层政府，而我国却恰恰相反，把包袱压在低层或基层政府，甚至是以乡镇为主。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全国义务教育中，中央财政负担 2%，省地财政负担 11%，县财政负担 9%，乡镇财政负担 78%（其中大部分负担实际上又转嫁给了农民）。由于各地贫富悬殊，对义务教育的重视程度也各不相同，这种以基层财政为主的义务教育投资结构，必然导致各地义务教育经费多寡不均，学校面貌大相径庭，以致于有媒体戏曰“城里学校像欧洲，乡下学校像非洲”。

针对此弊，中国的义务教育要真正实行免费并不难，关键是要在提高义务教育投资总量的前提下，改变投资结构。我建议乡镇财政承担 5%，县财政承担 5%，省地财政承担 10%，中央财政承担 80%。其中义务教育经费的最大部分即教师工资，应由中央财政全额保证，以避免发生某些地方长期拖欠教师工资，西部地区 50.6 万代课教师 20 年拿 40-80 元月薪之类的悲惨事件。

财政性教育经费，中央财政应承担 50%以上

中共中央、国务院早就明确提出“必须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然而中央财政的支出结构却并没有体现这一点，请看下表。

中国财政总收入与教育经费统计分析表（见附表）

通过此表我们发现四个重大问题：

1.在全国预算内教育经费中，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二者所占比重极不相称。1996-2005 年间，中央财政的教育经费投入一直十分低下，并且从 11.6%降到 8.1%，地方财政的教育经费则从 88.4%上升到 91.9%。可以说，我国教育经费匮乏之责，主要在于中央财政表现不佳。

2.中央财政总收入中，预算内教育经费所占比重历年都没有超过 4.1%，并且自 1996 至 2005 年十年间，每况愈下，在 2005 年竟然降至 2.3%！鄙人斗胆请问中央财政：这能说是“优先发展教育”吗？

3.中共中央、国务院 1993 年提出的公共教育经费达到 GDP4%的目标至今未能实现，使国人蒙羞。究其原因何在？2008 年 3 月 27 日《北京青年报》报道，财政部教科文司司长赵路近日表示，是由于国家财政收入占 GDP 的比例偏低。言下之意还要提高财政收入！我说此言差矣！上列“中国财政总收入与教育经费统计分析表”有力地证明：主要拖后腿的因素，恰恰是中央财政预算内拨付的教育经费太少！2005 年才区区 378 亿元，只及地方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 4287 亿元的 8.8%，实在是太可怜了，在现有财政总收入不变的情况下，中央财政只要舍得拿出 1984 亿元，公共财政占 GDP 的比重 4%的老大难目标就能一举实现了！

4.中央财政如果能以身作则，增拨教育经费 4084 亿元，总金额则为 4462 亿元，就能在全国预算内教育经费（8749 亿元）中雄踞 51%，为地方财政投资教育作出像样的表率。而此举确有现实可行性。因为以上财政总收入与教育经费的统计分析十分直观地告诉我们：即使中央财政为教育投资 4462 亿元，也只占中央财政总收入的 27%，略略超过四分之一，还有几乎四分之三的财力可以用于其他领域，可谓绰绰有余！

以上四个问题概括起来就是说：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应当由中央拿大头，中央有此责任，也有此财力；公共教育经费占 GDP 的比重 4%的目标并不难实现，也不难超越，关键就看中央财政的实际行动。

教育券，公民受教育权的有效凭证



江苏第一所民办高校三江校园全景

我国宪法第四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公民受教育权利落实在经费上，应是公民有平等享受国拨教育经费的权利。但是，实际情况却是千奇百怪。例如，据《羊城晚报》2007年7月25日报道，2006年度广东省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情况显示，广东上年享受免费义务教育的1000.8万名农村学生中，有25万多名属于“子虚乌有”。25个县（市、区）以及省农垦系统的6个农场，凭借虚报免费义务教育学生数量，多获得省级财政补助资金1027.9万元。农村免费义务教育资金的使用方面，除了虚报学生数量多获省财政补助上千万元外，还发现有20个县（市、区）的220所中小学校，挤占补助资金611.1万元，用于发放教职工工资福利500多万元等。

2001年出台的《长兴县教委关于教育券的使用办法》标志着长兴县开始实行教育券制度，《办法》规定，发放扶持民办学校和职业学校的教育券，由学生交到职业学校或者民办学校，抵充相当面值的学费；2002年秋季，长兴县开始发放扶贫助学教育券；2003年发放补助薄弱高中和民办高中的教育券；2004年，劳动力转移培训经费的划拨也开始采用教育券的形式，农民凭券选择培训基地，培训基地凭券向政府领取经费。

“教育券”最初是一些美国学者目睹社会中弱势学生教育机会不均等与不公平的状况而提出的改进措施。1962年，弗里德曼（Friedman M.）在其《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中首先提到教育券制度。

其要点是：政府发给每位学生一定数额的有价值证券（即教育券），以此支付部分学费。这样，家长可为子女选择任何学校就读，不再受到学区的限制。而学校将所收集的教育券向政府兑换现金，用以支付办学所需费用。于是，学校间将会为了争取学生和经费而互相竞争，努力改善教育质量，以符合教育消费者的需求。

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了对“教育券计划”的论证和可行性研究。90年代初，一些地方便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了教育券制度。后来这一制度逐渐被不少西方国家接受，并根据自己的情况作了灵活的调整。

教育券政策有不同的“版本”。西方国家在实行教育券政策时，根据各国的国情和实际需要作了不同的选择和调整。我国香港地区的教育券制度则被称为“学券制度”。

许多教育专家都认为，教育券政策是一个好政策，它具有以下优点：

1. 家长有自主选择的权利，可以因此而更加关心教育，也更加了解教育的本质；
2. 通过教育的开放和引进竞争机制，刺激教育机构和教育工作者更加努力地改善教育环境、提高教育质量，并积极发挥自己的优势，促使教育的多元化，以满足社会的不同教育需求；
3. 通过家长的选择，自然地筛选、淘汰那些不合格以及不符合社会需要的教育机构；
4. 更加有力地支持那些质量优越、管理良好的教育机构，使得教育及学校行政人员能无后顾之忧。

之忧地致力于办学。

我建议分两步走,全面推行教育券制度。

第一步,在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中实行教育券制度。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部门、教育行政部门在联合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共同制定本行政区划范围内小学、初中、高中的国拨教育经费的标准。譬如说,每年每个学生的平均教育经费标准分别如下:

小学	500 元 (北京市已定为 800 元)
初中	1000 元
高中	1500 元

教育券可按以上标准相应分成三种,均由省级财政和教育部门共同审定、编号制作。学生凭录取通知书领取相关教育券。

财政部门派员到相关招生学校或学校附近设点,按录取通知书,记名颁发教育券。教育券的含金量就是国家核拨给该学生每年的教育经费。学生领取教育券之后,相当于得到了一份国家拨给的教育经费持有券。他或她可以选择就学的学校,并将所持教育券交给学校。学校则将所收到的教育券向政府财政部门兑换成经费,用于办学的各项开支。

第二步,在高等教育中实行教育券。具体做法及其意义,与中小学基本相同,只不过国拨高等教育经费由国家财政部负责,大学教育券也应以财政部为主,会同教育部监制、颁发。这里就不赘述了。

鼓励社会集资办学,发展民办教育

不言而喻,教育投资多元化意味着:一方面国家投资要足额到位、保证公平;另一方面社会集资要广开门路、鼓励多元化。而教育券制度恰恰把这两个方面联系起来。

在我们的设想中,财政部、教育部颁发的高等院校教育券,按院校专业特点制作。相同专业的大学生,其教育券每年的含金量是相同的,大家一视同仁;而由各省市自治区财政部门、教育部门颁发的中小学生学习券,在省市自治区范围内,含金量也是相等的。这就保证了每位学生所享受的国拨教育经费是大体相等、大体公平的。

由于国家对义务教育范围内的初等教育、中

等教育负有全责,国拨教育经费只要完全到位,便足以保证初等、中等教育的顺利完成,全国绝大多数中小学生学习券应该是能满足于国立中小学校的免费义务教育的。与此同时,由于人们对于教育的需求客观上存在着差别,当今世界各国普遍鼓励个人或企业、社会团体集资打造私立学校或曰民办学校,以满足一部分人对于教育的更高需求。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教育私营化的比例已经达到 70%甚至 80%,超过了发达国家的水平。

在普遍实行教育券制度的情况下,民办学校的学生毫无例外也应当享受教育券所体现的国拨教育经费。譬如说,民办小学的学生在将教育券交给学校,由学校向政府财政部门兑换成 500 元现金用于办学的同时,又缴纳 500 元额外的学费,这家民办小学便拥有生均 1000 元教育经费,可以进一步改善办学条件、提高教学质量,满足这部分学生及其家长更高的教育需求。

对于民办中小学的学生来说,平等的、免费的教育券保证了公平地享受国拨教育经费,在此之外自己交付的学费则是实现差别化教育需求的必要条件。二者相辅相成,这就是集资办学的民办中小学校合理合法的生存、发展空间。

对于高等教育来说,由于它完全不属于义务教育的范围,高教经费由各方分担是理所当然的。据教育部规定,北京高校普通专业每年收费一般在 5000 元、5500 元、6000 元三个档次。若按 5000 元计,约占高校生均经费两万元的 1/4 左右。余下的 15000 元,假设国家财政投一半,为 7500 元,凝聚在大学生教育券中;另外的 7500 元,就成为社会集资的空间。

社会集资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只出资而不参与学校管理,如给大学捐赠钱物;另一类是出资同时享受股权,行使股东权益。如此,则大学如同股份公司,社会集资达到控股地位时,该大学便可称为民办大学了。股份制大学不仅可以减轻国家投资高校的财政压力,而且可以增加社会及个人投资办教育的积极性、创造性。同时,将教育成果与股东自身经济利益挂钩,也有利于调动各方资源,切实监督教育经费的利用效率和教学质量。

2002 年底,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规范国家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和个人,利用非国家财政性经费,面向社会举办学校

及其他教育机构。规定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国家保障民办学校的办学自主权,鼓励投资办学。

民办教育促进法第 37 条规定:“对接受学历教育的受教育者收取费用的项目和标准由学校制定,报有关部门批准并公示”。

民办教育促进法第 49 条又明确规定:“人民政府委托民办学校承担义务教育任务,应当按照委托协议拨付相应的教育经费”。

以上两条规定显示,民办学校在一定条件下既可以使用国拨教育经费,也可以使用社会集资和学生缴费。这实际上也就是民办教育投资渠道多元化的法律根据。而多元化投资的比例结构,则因地制宜,因校而异。

民办教育促进法颁布已经 5 年多,各项配套法规和政策也陆续出台,对民办教育的促进作用不小。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年公布的教育事业统计公报,截至 2006 年,全国已有各级各类民办学校、民办教育机构 9.32 万所,比 2002 年增加 3.2 万所。其中各类学历教育在校学生达 2313.02 万人,比 2002 年增长 1197.05 万人,规模已经翻了一番。

民办教育顽强的生命力体现为民办学校办学规模扩大,教育质量明显提高,涌现出一批办学水平较高、特色较为鲜明、社会信誉较好的学校,得到学生及其家长的追捧。据《北京青年报》2007 年 7 月 2 日报道:6 月 30 日,广州 15 所民办初中联合招生考试,尽管只有 3000 个名额,却有两万多名小学毕业生前往赶考。与如此热闹相对照,公办初中却显得出奇的安静。一位资深的省一级公办初中校长对记者透露,“说实话,民办初中抢走了不少好生源,公办初中现在只能坐等电脑派位生”。

一些民办学校教育理念先进,课程设置、教育内容全面,教学手段多样,教育方法灵活,卓有成效。从根源上看,这一切都是教育投资多元化带来的局面。从前景上看,开创新的局面,还需要在进一步维护民间投资、民办学校的合法权益上做工作。譬如说,目前民办学校被定性为“民办非企业单位”,直接影响了教师的身份和与公办学校教师的平等待遇问题,阻碍了教师流动;民办学校建设用地、信贷融资及其他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教学科

研和经营活动都无法享有与公办学校同等的政策待遇,制约了民办教育的发展。亟需将民办学校确立为自收自支的事业法人单位,从根本上解决民办学校的法人属性问题。

教育投资多元化除了表现为民办学校如雨后春笋之外,也表现在企业家捐赠和教育类基金会的快速发展。此外,还可引进外资,以合作方式办学,或由外国在华独资办学,等等。教育投资多元化的潜力是无穷的。

社会力量在资助教育的同时,也在改变着传统的教育模式,主要包括推进教育理念的转变、教育模式上的创新、引进新型课程等等。

例如:由江苏长江平民教育基金会捐助建设的安徽德胜鲁班(休宁)木工学校和德胜(休宁)平民学校,就倡导“诚实、勤劳、有爱心、不走捷径”的价值观,强调了在中国农村有许多读不起书、生活毫无着落的穷苦孩子,通过对他们的持续化、体系化的学校教育,将爱的教育、感恩的教育、独立自主的教育,以及与此相关的一系列有关孩子生活方式的转变方面的教育等结合起来,把一个传统的农家孩子转变为一个具有现代文明素养的合格公民的成长过程。经过这个转变,这些孩子不再是现代文明的被动接受者,而是现代文明的体现者,以及现代文明的传播者。其价值来自于多元化的教育,其影响则远远超出教育领域。

许多忧国忧民之士,面对我国教育界问题重重而忧心忡忡,都在思索出路何在?我以为,教育改革与经济改革在某一点上是相通的,那就是都要走所有制结构多元化之路。

在所有制结构问题上,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工业和教育,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国有制;三十年之后的 2006 年,中国工业总产值中的国有工业只占 31.2%,生龙活虎的非国有工业已达 68.8% (见 2007 年《中国统计年鉴》第 501 页),而教育界的国有制仍然僵持在 90% 的高位上,这就是教育改革落后的综合标志。如果未来若干年之内,中国民办的大中小学能达到 50% 以上,真正实现多元化了,神州的学堂就将满园万紫千红!

这个未来“若干年”,究竟是五年、十年还是二十年,就看国人的努力了。

中国财政总收入与教育经费统计分析表

货币单位：亿元； 比重：

年份	国家财政总收入			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 ^a						b/a		中央		财政支出 占GDP 比重											
	金额		比重	全国		地方		中央		地方		教育经费 占中央财 政总收入 比重 ^c			财政性 教育经费 占GDP 比重										
	全国	中央	地方	金额	比重	金额	比重	金额	比重	金额	比重	全国	中央		地方	比重									
1996	7408	3661	3747	49.4	50.6	1672	100	210	12.6	1461	87.4	1212	100	141	11.6	1071	88.4	72.5	67.1	73.3	3.9	71177	2.35	11.2	
1997	8651	4227	4424	48.9	51.1	1863	100	233	12.5	1630	87.5	1358	100	157	11.6	1201	88.4	72.9	67.6	73.7	3.7	78973	2.36	11.7	
1998	9876	4892	4984	49.5	50.5	2032	100	261	12.8	1772	87.2	1566	100	200	12.8	1366	87.2	77.0	76.6	77.1	4.1	84402	2.41	12.8	
1999	13395	6989	6406	52.2	47.8	2287	100	277	12.1	2011	87.9	1816	100	215	11.9	1600	88.1	79.4	77.9	79.6	3.1	89677	2.55	14.7	
2000	13395	6989	6406	52.2	47.8	2563	100	280	10.9	2283	89.1	2086	100	219	10.5	1867	89.5	81.4	78.2	81.8	3.1	90215	2.58	16.0	
2001	16386	8583	7803	52.4	47.6	3057	100	333	10.9	2724	89.1	2582	100	267	10.3	2316	89.7	84.5	79.9	85.0	3.1	109655	2.79	17.2	
2002	18904	10389	8515	55.0	45.0	3491	100	353	10.1	3138	89.9	3114	100	304	9.8	2810	90.2	89.2	86.1	89.5	2.9	120333	2.90	18.3	
2003	21715	11865	9850	54.6	45.4	3851	100	390	10.1	3460	89.9	3454	100	335	9.7	3119	90.3	89.7	85.8	90.1	2.8	135823	2.84	18.1	
2004	26396	14503	11893	54.9	45.1	4466	100	419	9.4	4047	90.6	4028	100	368	9.1	3660	90.9	90.2	87.8	90.4	2.5	159878	2.79	17.8	
2005	实际发生	31649	16549	15101	52.3	47.7	5161	100	410	7.9	4751	92.1	4666	100	378	8.1	4287	91.9	90.4	92.3	90.2	2.3	183868	2.81	18.5
2005	法定数额	16549	①	7355	②	2362	③	6649	④	4287	90.4	2362	⑤	2362	⑥	4287	49.0	4287	49.0	49.0	49.0	14.3	183868	4.0	(设定值)
2005	合理数额	16549	①	7355	②	2362	③	6649	④	4287	90.4	2362	⑤	2362	⑥	4287	49.0	4287	49.0	49.0	49.0	27.0	183868	4.0	(设定值)

分析：1)、已知条件①、②、③、④不变；

2)、2005年C值若由2.3%提高到14.3%（即增拨1984亿元），则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使用可达到GDP的4%；

3)、2005年D值若由8.1%提高到51%，则C值为27%（即增拨4084亿元）。

参考文献：1997-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

我们 写信 告迟群

唐少杰

2005年8—10月是原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惠宪钧、柳一安、政治部主任吕方正两次联名给毛泽东写信反映清华问题30周年。我采访了四位当事人之一的惠宪钧。

惠宪钧，男，1932年生，原中共清华大学委员会副书记、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总务长，现已退休。

唐：惠老师，在1975年11月初至次年9月，这短短的十一个月所经历的变化中，你是怎么过来的？你当时有无失望过？

惠：其实，我们作为个人无所谓，作为我们的国家才是重要的。我先大致把自己的情况给你说一说，完了以后看你有什么提问的。

我是1947年参加人民解放军的，是四野八纵队独立团。参军以后，我参加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因为我过去在家乡读过私塾，学过的东西，我都背下来了。读书有五、六年，所以在部队我算是有文化的。解放天津后，我们算留守了，就留在天津公安局了。1951年我调到了中央警卫师。一开始中央警卫师有一个团负责中南海，其余的团负责别的地方，其实8341是在“文革”前从中央警卫师分出来的。中央警卫师曾负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警卫工作。“文革”之前，8341成立，就把中央警卫师编为北京卫戍区第一师，我曾在该师四团当过作战股股长。我们团负责从王府井到西城区的警卫工作。我在部队期间，表现总的来说还是不错的。我过去在战争年代立过两次功，到清华之前做



清华大学四位上书人(前排左起:刘冰、柳一安;后排左起:吕方正、惠宪钧)

警卫工作也立过四次功，一共立过六次功。部队为了培养我，又送我去了步兵学校，所以我在部队，总的还是比较顺的。我来清华工作时才36岁。那时我是我们师重点培养对象之一。我来清华的时候，我们的师长、政治部主任都来了，我是师作战科科长。那天不是1968年“7·27”嘛。当天，我参加了组织指挥。解放军一共有三百多人，有海军的，有8341的，一师的是我负责，一百多人。在清华平静了以后，我们师长和政治部主任不同意我回去，我就留下来了。我在部队这阶段，我感觉自己从参军到成长，都是毛主席思想培养的。

到“文革”期间，自己思想上就有些变化，是什么呢？就是“文革”期间，虽然我对于毛主席没有任何可以怀疑的，但我总感到国家搞得这么乱，那么多老同志都被挨斗、下台，非常不理解。对我影响特别深的、感到思想上波动比较大的有几个事件：一个是在首都体育馆斗“走资派”，以彭真为首的，一一揪出来。斗的时候，我作为警卫部队领导人负责组织警卫。到了那里，造反派把彭真、安子文等圈到厕所里去了，我说为什么这样啊，他们说你不要管，我说我该管的就得管，我不许这样。还有一个就是彭真同志渴了，我说给弄点开水去，造反派他们说不行，渴了喝凉水去，把厕所的凉水管打开喝就行了。我当时感到特别难受，我说把这些领导人闹成这样，在万人大会挨斗，还关到厕所里喝凉水，很不理解。还有一件事，对我印象很深，贺龙元帅那时被关押在西山，那里也归我们团管，我有

一次晚上去看警卫战士。我问执勤战士，首长现在有些什么要求，战士反映首长想吃点辣椒，专案组他们不让给。我说，想吃点辣椒有什么不让给的，怎么这样呢？战士说，咱们没办法。那时候，贺龙身体也不太好，一两个礼拜，不是老吃窝窝头，就是在生活上受到虐待。贺龙这样堂堂的军队缔造者、国家领导人，落到这种地步，多么心酸呀。还有一件比较突出的事，就是罗瑞卿跳楼。罗瑞卿的住地也是我们团管的。那时候罗瑞卿天天挨斗。一次挨斗完后，一个警卫战士当天晚上就向我反映，首长昨天晚上回来情绪不好，我嘱咐说，你们注意点，要保证绝对安全。第二天我就去检查。我到时大致十一点多，十二点罗瑞卿跳楼了，我正在现场。唉！罗瑞卿是中午正十二点跳下来的，他住的是一个楼，有三层，那个时候，他日夜睡不着觉。他把衣服脱到二楼，从三楼往下跳的时候就穿了一个衬衣跳下去。他是直着跳下来的，就是站着跳下来的，腿一下子就完了。最后我们工作人员和警卫班就往屋里抬，把罗瑞卿抬进屋里去，然后一层一层报告，向军委报告，向中央报告，你得治呀，还得请示批准，上哪个医院，一直拖了四个小时没人管。跳下去四个小时没人管啊！这几件事，我现在想起来，真难受啊。我就想到，咱们的国家怎么这样呢，罗瑞卿这样一个元勋怎么受到这样的待遇，遭受这样的结果呢。

我写信的思想初衷，我就感觉这几件事对我挺有影响。所以，就是说为什么要写信，这首先就有一个原来的思想基础。再一个，我们写信的事，这件事不是刘冰提出来的，是我们三人提出来的。从提出写信来讲，有好多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就是说迟群、谢静宜紧跟“四人帮”，因为那时候“六厂二校”是他们的大本营。为什么对迟、谢有这种看法，就是迟、谢接触的这些人都是“四人帮”那条线上的。那时候我们不是很确切地知道，但知道江青、姚文元、陈伯达，他们来清华，不管是深夜还是清晨，迟、谢都积极接待。可是，朱德总司令到清华参观，迟群不接待，他对我说，你接待去吧。我说，哎呀，朱总司令来清华，让我负责接待，这合适吗？你这个清华党委书记，你不去接待，让我去接待。迟群说，他是“老右”。朱总司令来了以后，迟群不见，我想在朱总司令走时你总可以见一见面吧，也不见。迟群说，走就走了呗，“老右”有什么可见的。

迟群那个时候说，他和谢静宜是毛主席的两个“兵”，开始时还和主席有联络，后来越变越不是这个状况了。后来，他们主要同包括毛远新在内的一些人经常打电话，还经常给我们这些人发什么这个材料、那个材料，一大堆。

第二个呢，就是迟群这个人野心勃勃，没有当选上中央委员，狠狠闹了一通。平时，迟群和谢静宜关系比较好，谢静宜当选上了中央委员，他没选上，一闹差不多就是胡作非为了，前前后后，连哭带闹，大概有半个月。他不是一般的闹，有时是喝酒乱闹，有时是和谢静宜吵骂。有一次，在夜间，迟群为了找谢静宜闹事，竟在谢的门口撒尿。最后，刘冰跟我们说这个怎么弄？我们为了避免这样的事对教职工的影响，我们找人把迟群干脆看住，不许他出这个门，只能在工字厅东院，让他在那里睡觉，他闹完了就睡，睡起来再闹。他当时认为，谢静宜没有在主席面前给他说好话，所以他没有当上中央委员。一次抽烟，把被子烧掉了，还有一次撞门把头撞坏了。他闹的时候，对我们说，你们给我召集人，他还想开大会，我们说不能给你召集，你有事我们可以给你去做。这些都暴露了他的野心。他当时是国务院科教组组长，他原想当教育部部长，下一步呢，他是想当副总理的。他当不上中央委员，副总理也当不上了，教育部部长也没份了。再一个就是对教职工，比如有一次在二教楼会议室的会议上，他一口气点了几十位清华教职工的名，把他们都打上了反革命，点了建筑工程学系的何家辉，说这个人是想一口气吃掉社会主义；点了邢家鲤，说他是“养猫反党论”，等等。他一点到谁，被点名的人就由所在的系的人带出去。

还有对待柳一安同志的问题。那个时候，柳一安带着一个组进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柳一安回来后，迟群不给安排工作。正好有一次，吕方正、刘冰、我几个人商量说迟群现在这种状况怎么办，我们决定，把柳一安叫回来。回来以后，吕方正、柳一安和我，三人商讨，没有让刘冰参加。我们说，迟群现在大吵大闹，对工作不管不问，另外他这么闹下去，我们怎么工作？对学校的影响怎么挽回，这样下去是个什么结局。听我们简单介绍了一下情况后，柳一安说，我们要想办法了。这事得解决，我们对解决的办法作了考虑。一个办法是让迟群离开清华这个地方。我们决定，干脆给毛

主席写信，我们通过党组织来反映。后来，我俩跟吕方正说，不行，咱们先跟迟群谈一次话。所以，有一次，吕方正、柳一安和我就到国务院科教组迟群住的地方，跟他正式谈了一次。我们说，你跟谢静宜这么闹，对学校影响很大，这样就造成我们在工作上非常被动，这样下去是绝对不行的，所以你必须注意这事。当时跟他谈，他还听得进去，他也说，我就出不了这口气，我为什么当不了中央委员。最后，迟群还在他那儿请我们吃了顿饭。其实，他以后还照样，他心里对我们已经有看法了。有一次，我们决定干脆找刘冰，我们四个人干脆把迟群和谢静宜召在一起，咱们正式谈一谈。我们还真去了，因为到一定时候有碰头会呀，去了以后，迟群他也闹得出来，我们跟他说，咱们的碰头会，要注意些什么东西，教职工对我们有反映，就是说你们两个关系不好，这以后对全校可是全局问题；再一个，我们这些人多少在行动上若是不注意，一个是我们讲错话，一个是我们做错事，教职工就会有反映；另外就是说，你迟群对谢静宜有意见，你们可以交换意见嘛。谢静宜当时说，我做得不对，但是我不是要干预你当什么，这不是我的事，你这么闹，这不是我愿意的，也不是我告你的状，我们工作这么长时间，你还不知道。最后，他们两人又火了，又当面吵起来了，最后我们没有办法。迟群没有悔改的表现，他也不想认识自己的错误，他不认为他这样做是错的。其实，这个事我们为什么考虑谢静宜，谢静宜本人应该对迟群的行为向主席或者是向杨德中反映，因为你们都是8341的，你可以反映，你却不反映，而且把这个矛盾都暴露在清华园，暴露在教职工面前，让我们领导班子跟着倒霉。所以，这个正式集体谈话也没有奏效。最后，干脆吧，咱们向毛主席反映吧。这在当时是柳一安建议向毛主席反映的，他说咱们直接向主席反映，我们讨论后认为可以，作为一个党员向党的主席反映情况是正常现象，我说我同意，吕方正也同意。但是，我个人认为，向主席反映，咱们三个人可能在威力、影响面上还差点儿，因为我们不知名啊，我们想来想去，还是找刘冰同志吧。刘冰同志在对迟、谢的看法上跟我们是相通的。另外，就是刘冰同志这个人呢，他整个的聪明才智呀，老实呀，心胸呀，道德呀都比较好，而且他当时对“四人帮”、对迟、谢是敢怒不敢言。为什么写信一事不是刘冰

同志提出来的，而是我们提出来的呢？这个问题，我就想，现在我们这三个同志都提出来了，你让刘冰同志提出，不行。为什么呢？因为刘冰他本身被打成过“走资派”，他是有“前科”的，“带罪之身”的，他怎么能提出呢？就是他本人有这个想法，也没这个胆量提出来。我们提出来，我们没有“前科”，起码不是“走资派”，我们该怎么提就怎么提，我们没有这个压力。

唐：但是你们一提出来，想没想到，刘冰会不会拒绝呢？

惠：我们有把握，他会同意的。但是，我们得先征求他的意见。有一次，我们去政协礼堂开会，休息时，我们就把他拉到一边长谈。我们把迟、谢的那些行为，以及当前清华教职工的一些反映，作了概括。作为共产党员，所以我们想把这些事向主席反映，请你刘冰同志参加，他欣然说“我同意”。

唐：我在一个材料上看到，迟群说，1973年，周恩来总理要调他到国防科委去当副主任，他不去。有过这事吗？迟群说，我哪儿都不去不去，我就在清华待着。迟群还说，能当省长、部长的人不一定能当了清华校长。

惠：他说过这话一点也不假。他说副总理有什么了不起的，连“走资派”都能当，我为什么不能当？这些话，他在我们跟前经常说起。他说的话，那简直是毫不隐瞒。

唐：有一个问题，当时你们写给毛主席的第一封信，为什么只提到迟群而没有涉及到谢静宜呢？为什么在第二封信上，你们把迟、谢连在一起呢？是否可以这样说，毛主席对迟群可能还不太像对谢静宜那么熟悉，毛主席收到你们的第二封信，一看到提及了谢静宜，因为毛主席比较了解谢静宜，所以他对你们的这封信大为不满。你觉得这种说法有道理吗？

惠：不是这个情况。为什么我们第一封信要告迟群，因为闹的是迟群，但是他有好多在学校的做法以及在政治和经历上，跟谢静宜都有关系。我们在写第一封信之前，我们还想，我们写这封信能不能征求一下谢静宜的意见，让她和我们一起向杨德中反映情况。我们当时还有这种想法，怎么会在第一封信里涉及谢静宜呢？还有一个想法。我们把迟群搞掉，谢静宜也就无关大局了，因为她不是政治决策者，而是顺从者，就是迟群说什么，她就同

意什么,她就是这么一个人。

唐:谢静宜是不是能力比较差?

惠:能力比较差。凡是出头露面的,政策决策的,出点子搞坏事,都是迟群提出来的,谢静宜她是举手者。所以,在第一封信中,我们主要是反映迟群问题。另外,我们考虑现在也不能把两个人都弄上,谢静宜毕竟是主席的联络员。我们写那封信,我们是从一般的意见谈起,好让主席派人来清华调查,我们再谈深层次的。我们准备由浅入深,深层次的问题,我们等着派人来找我们面对面地谈,因为我们要是把信写到深层次、写得广了以后,这个东西可能就不清楚了,主席就可能产生很大的误解,所以我们在第一封信没有涉及谢静宜,主要是反映迟群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在第二封信又写了谢静宜问题呢?就是我们的第一封信上去以后一个月,没有回音。一个多月以后,在北京,有些人告诉我们说主席收到信了,还没有表态。这第一封信还引起了李先念、纪登奎等副总理以及吴德等在有关会议上的议论,说清华有几个副书记写信告迟群。我们还感到,这些人挺支持我们的。但是,这封信到了主席那里,谢静宜知道以后,她就对我们采取了很多措施,就派人监视我们,在领导班子有关会议上指使人反对我们,派人跟踪我们。我们就不能工作了。那时候谢静宜出面要为迟群“打抱不平”了,谢静宜把一些人组织起来,对付我们,因为她知道我们写信了,就把我们基本上控制起来了。最后我们实在是没法工作了。这事儿,我们本来是在这第一封信给她留着面子呢,其实很多决策是你和迟群两个决策的,好多做法你们是同心同德的,我们没有告你,就是我们还有一个主次问题,所以这次我们写第二封信就考虑,不把这两个人连在一起不行,要反映就同时向主席反映。不反映谢静宜的问题,我估计主席是不可能派人来的。所以,我们基于这个原因,才反映谢静宜的问题。也就是说,她对我们采取措施了。实际上,这些都是迟群暗中布置的。

唐:那时,迟群也知道了?

惠:迟群知道了,他们知道了,所以就采取了措施。写第二封信,我们也没有敢写深了,我们也是大致从思想作风、工作作风谈起,每一句话都不要写得太重。我们想了,如果主席知道了,如果主席要是能客观一点儿,能派人过来了解,我们会

把详细情况,向主席全面地、实事求是地做个汇报。那个时候,至于主席怎么断,我们都心服口服了。我们告迟群的信,摆在主席的床上很长时间,主席看了一次又一次。这个信,现在看来,主席把它与邓小平同志搞的整顿联系起来。第二封信上去后,主席看了就重视了。毛远新等一些经常同迟群、谢静宜联系,几乎是天天电话联系。毛远新的干预作用很大。

唐:在我看到的有关材料中说,1975年11月3日下午,吴德来清华口头传达毛主席让清华就你们的两封信进行辩论的指示精神,当时你们没有想到吧?

惠:没有想到。

唐:当时还设了个圈套。在这次会上,先让大家辩论,先让你们表态,迟群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这次会议故意没有公布毛主席对你们的信的具体批评。

惠:第一次辩论会,传达了主席指示精神。参加会议的总共有三四十人(实为53人,——唐少杰注)。他们挑好了地点,事先做好准备。我们一看就知道了。我们认为,这既是好消息,又是坏消息。好消息是指主席看到我们的信以后,有说法了;坏消息呢,那我们可能要倒霉了。我们当时就感觉到,一看吴德来了,他们兴高采烈地通知我们,下午开会。吴德没有讲什么,他传达完了以后,说主席让大家辩论,宣布这次会议由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主持。辩论开始后,我们发言。我们首先就说,我们说的这些事,实事求是地讲,是不是真事儿?我们发言时,一帮人在那儿有组织地起哄,喊撒谎,你们说撒谎,你们知道谁撒谎?再一个,对吴德,我们说,吴德同志,你传达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写信有什么不对?我们作为清华大学的领导班子成员之一,我们有权向北京市委、向主席写信,这封信也给你这位市委书记了。我们写信同时两份一起送的。我们就问,吴德同志,这封信我们也给你送去了,你知道不知道?他一声不出。我们说,我们要是不对,你为什么不说?在这次会议上,有人看那个劲头,又哭又闹,好家伙,说你们四人反对毛主席,我们看错人了。原来一些人还是对迟、谢有看法的,但是一经鼓动,什么上当了啦,“走资派”啦,“投降派”啦,全来了。他们说,刘冰是“走资派”,你们三个是“投降派”。

唐：还有就是公布并指责你们写信一事，从那时起一直到毛泽东去世之际，批斗你们，这个人际关系及清华文革方方面面的问题，你当时都有什么看法？

惠：挨斗，我是最多的，因为拿我做典型，我没有什么思想负担。为什么呢，我当时考虑，第一个你撤我的职，撤我的职没关系啊，这对我是无所谓的事儿。

唐：军籍还有吗？

惠：有。你要是开除我军籍，你得报中央军委，我不怕。你撤我职，我无所谓；你开除我，就开除我。我当时死都不怕，还怕什么，我是思想有准备的。批我反对毛主席，我就没有什么可顾及的了。我没有可以愧对毛主席的。你们说我反对毛主席，那是你们的事，对我后人自有评论。所以，那时候斗我们，我的态度最强硬。他们把我弄到清华农场斗我，我在那儿站着。他们说，你给我坐下，我就不坐下，把我摁下。一会，他们又说你给我站起来，几个人抬我，我也不起来，就不站。我说为什么斗我，他们说你说瞎话啊什么的，我说你们胡说八道。反正我不服，我们给毛主席写信有什么，我们犯什么错误了？我不服。折腾到最后，又拉回去斗，弄到清华后勤系统来斗。他们让我背诵毛主席语录，我说背诵毛主席语录我不反对，但大家要一起背，你指着我的背，我也有权利指着你的背。

唐：当时，你挨打了吗？

惠：没有。那时候他们不敢打我。还有，那时在胡健（当时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唐少杰注）主持的一次会议上，他问我，斗你，你有什么收获？我说，我收获大了。什么收获呢？我说，你斗我一次一小时，你得准备一个星期，而我就听一个小时，我占便宜，我说这就是收获啊。他们说，不行，决定连夜斗我。我说，你们连夜斗我，你们还得准备夜餐。我是不怕死的，看你能把我怎么着。你们叫我一讲，就说我是反对毛主席的。我反对毛主席吗？不反对。我反对迟群吗？反对。难道反对迟群就是反对毛主席，反对谢静宜就是反对毛主席，或者说，反对毛主席就是反对迟群，反对毛主席就是反对谢静宜？我说，这些都是你们说的。每次我都这样，挺有意思的。

唐：1975年11月18日，在清华、北大万人参加的有关大会上，才正式公布了毛泽东对你们写

信所作的批评。你听到毛泽东的这段批评以后，你当时有什么想法？

惠：当时，我不相信。很长时间，我一直不相信。我因为对主席一直怀着感恩之情，即使对主席感觉到有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你比如说“大跃进”的时候有人批评他，我都是从客观上积极地评价主席。我想，即使一时出现误判，主席也是可以改正错误的。所以，我认为我们是对的。我还认为那不是毛主席批的，有可能是“四人帮”捏造的。

唐：很有可能，这个批评是由毛主席口述的，毛远新或别的什么人记录下来的。毛主席对你们的信有一句批评在当时是很厉害的，即你们写信告迟群，“矛头是对着我的”，你怎么看？

惠：有可能，我们写的这两封信还没个结局，总得有个结局呀。主席考虑来，考虑去，“四人帮”这些人吹吹风，主席可能说几句，他们就记下来。但是，我完全可以说，我从不反对毛主席。我们对主席的感情有什么可怀疑的？

唐：你现在对毛主席的感情也是依然如初吗？

惠：是的。但是，我现在看文革那时候的事，是主席一个非常大的错误。“文革”是主席晚年的错误所在。你再肯定主席，“文革”这个事儿都在。不管怎样把主席一生功过各分为“七开”和“三开”，那“三开”都是存在的。我现在都认为，“文革”是把国家搞乱了。

唐：对评价历史上杰出人物而言，功和过是不能相抵的。

惠：对，不能相抵。不能说，我有功我就可以杀人。“文革”这个事儿，你对主席再崇敬，他也是错误的。跟着你出生入死、共同战斗的一些老师，你都把他们打倒了，你不知道吗？把这个国家搞到这个地步，头脑还清醒吗？

唐：“四人帮”倒台以后，给你们平反等了一年的多的时间，那时候把你们怎么处理的？把你们放在哪儿了？

惠：让回家休息了，但很快又让我第二次回清华农场劳动。这时，因为“四人帮”倒台，迟群、谢静宜被逮捕，我再次回农场，很有意思，你到哪个班，哪个班都不要。人家说“四人帮”倒台了，你又什么了；我说我也不是什么，你们不要怕我说你们什么。我到农场劳动，就是来老老实实劳动的，什么活都干。

唐：当时你们看到了希望吗？平反大约是什么时候？是在邓小平复出后吧？

惠：反正我们知道“四人帮”倒台了，迟、谢倒台了，平反不平反，我们心里踏实。那时候迟、谢刚倒台，清华还有人来到我们面前，他不敢斗我们了，说你们等着吧。我们与他大吵，就指着他，我们的案子你能说了算吗？谁让你说了算的？吓得他赶紧跑了。

唐：就在你们给毛主席写信的前夕，在社会上流传着对“四人帮”的不满，什么毛主席点名批评了江青呵，什么毛主席指责了“四人帮”呵，当时你们能知道这方面的消息吗？因为当时有些材料说，你们听到了关于所谓中央首长的“谣言”，就说你们也参与了所谓攻击中央首长的“坏话”，你们当时知道毛主席对于“四人帮”的不满吗？而且这些和邓小平 1975 年的整顿正好是非常吻合的。

惠：当时我们知道的并不多。你说知道太多深层次的东西，我们从未有过。我们只能从现象上看。迟群、谢静宜经常不断地在清华一些会上议论中央上层的事情，不仅议论“四人帮”的一些事情，就连毛主席的以及教育部的等等事情，都大加议论。再加上江青还不断给他们来电话，内讧的东西，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们似乎都见怪不怪了。

唐：当时清华一些人，尤其是工宣队的一些人，对你们四人的批判和迫害非常卖力，到最后甚至令人觉得他们比迟群、谢静宜还积极，挺可悲的。你是怎么看的？

惠：这批人呢，感到大局对他不利，要保护自己，除了像清华政治部吴××是想出人头地之外，其余的人都是为保护自己。所以，在我们写了第二封信以后，迟、谢给他们的人打了招呼，我们也打招呼，因为有些人，迟、谢一给他打招呼，我们就知道了。迟、谢给他打完招呼，我们接着给他打招呼，迟、谢说我们不是好人，我们也说他们不是好人。一些人是不负责任的，我感觉他们都是为了保护自己。我总结过，一开始斗我们的时候，他们就给我坐过“喷气式”，即两个人按着我的脖子，让我竭力低头弯腰，还让我把双手高高向后伸。在清华西主楼阶梯教室里斗我，他们是高凳子上再加高凳子，让我站在上面，“高高在上”。还有“坐飞机”，就是四个人把我抬起来往地下扔。还有“站电线杆子”，等等。我想得开，你怎么斗我吧，反正你让我

站着的时候，我就让你搀着。你怎么折腾我，你折腾到最后的时候，许多群众也看不下去。我特别难过的就是 1976 年 7 月底大地震之后，一些人斗我，让我在防震棚外“喂蚊子”。别人在外面搭的防震棚都挂有蚊帐，却不让我挂蚊帐，让我只穿衬衣。那蚊子咬得可真厉害。整你什么花样都有。还有一个就是吃苦，“吃苦思甜”，让我吃饭的时候不能吃好的，不能给打好饭好菜，只能吃窝头咸菜之类的，就得吃这个。

唐：这就是说，你吃饭的时候，自己不能去买，是看守人员给你打的？

惠：他们给打的。人家告诉我不许吃好的。平时，喝水也没有开水，没开水，我可以上厕所，拿水壶打凉水，我也能喝，也没出事。

唐：就是来大地震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减轻对你的批斗，比如说，现在是地震时期，可以减轻批斗？

惠：没有，斗得更多了。他们没事儿，好家伙，在防震棚外面斗。他斗一次，我画一道，一共斗我 214 次，这就是结果。

唐：你还真不错，挨完了这么多次的批斗以后还能在清华继续工作，你有什么想法？

惠：“文革”结束后，原来我是想回部队的。清华新的一把手是刘达同志，他说，不行呀，你留下来是党的需要，因为你们四人写信给毛主席这件事就发生在清华，所以你们总得有一个人留在清华这儿。柳一安同志回原来的单位去了，吕方正同志也回去了，刘冰同志调走了，所以你写的回部队申请，我不能批准。我原来所在的部队本来打算我回去就给我安排新的工作。

唐：在迟群、谢静宜被逮捕之后，你见过他们吗？

惠：与谢静宜没有见过面。迟群出狱后不久，就病死了。

唐：审判迟群的时候，让没让你作证？

惠：作了。我发言了，那时迟群在场。

唐：那就是审判会的证人发言了。我问一句，迟群个人的工作能力如何？

惠：迟群这小子有能力，有点才能，在 8341 担任过宣传科副科长。迟群是毛主席派到清华来的，在那种环境下，他太狂，太骄傲，把握不住自己。他写字模仿主席的字体，还模仿得特像。他大会讲

话,好多时候不用稿子。这个人还是有点才。谢静宜没有什么能力,她也没什么特殊经历,就是中央机要局的一个给主席送信的机要员。她没有迟群那样的能力,客观上,我们写第一封信时不考虑她。

唐:但是,谢静宜的机会太好了,那时任过许多职务,如中共中央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北京市团委书记,还有清华党委副书记,等等。

惠:人家就是看主席的面子嘛。有主席,她行,没有主席,她什么都不是,她懂什么呢,你让她出点子?出不了。你给她出点子,她半天还不理解呢。迟群就聪明。反正她没有。

唐:你的家人或亲属在当时受到什么牵连吗?

惠:我的家乡在辽宁。毛远新当时不是在辽宁吗,这回我出名了。毛远新说,辽宁出了一个“投降派”,所以他的亲属,你们都要把他们监视起来。我的一个妹夫就被抓了。在辽宁呢,我的事,辽宁各区、县都知道,辽宁出了这么一个人物,毛远新亲自下指示要监视他的亲属。

唐:1975年11月3日开了第一次关于你们写信的辩论会后,你们四人的表现有所不同。当时,刘冰处在你们当中的第一位,迫于巨大压力,他很快就承认“错误”了,这对你们三人是不是有影响?

惠:主要是因为让他参加了中央政治局的有关会议。在政治局会议上,“四人帮”大加指责、批判刘冰同志。还有其他一些人也批评刘冰同志。还有列席的几位所谓犯错误的老同志也很快承认了错误。当时,他也没办法。

唐:当时让刘冰列席政治局的有关会议,告诉过你们吗?

惠:没有。

唐:刘冰回来也没有跟你们说?

惠:没有,也不可能。那时我们不能见面了,我们四个人,每个人被分在一个地方,每个人都由好几个人看管。

唐:你们写给毛泽东的两封信的原件,你知道现在存放在哪里吗?应该在中央档案馆吧?

惠:信的原件在哪儿?我也闹不清楚。反正这两封信是历史文物。

唐:我很长时间找不到你们两份信的全文。我

在清华档案馆看过一回,那是当时清华党委副书记周家恣在1975年11月18日会议上对你们的信一边念一边批的记录稿,我不知道哪些是你们写的,哪些是他批的。不但清华档案馆、图书馆、校史馆等都没有收藏你们的两封信的原文,而且清华当时绝大多数人也从未看过你们两封信的原文。这真有些遗憾。我后来从1988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余习广编集的《位卑未敢忘忧国——“文化大革命”上书集》才看到了你们两封信的全文,并复印给清华档案馆收藏。

惠:那个信,总的来说,我们是从侧面写起,浅写深谈,我们采取这个策略。我们希望主席派人来,我们要全面汇报深层次的东西。

第一封信是吕方正起草的,我们讨论、修改;第二封信是刘冰起草的。第一封是我送去的,第二封信是刘冰托教育部的一位叫李琪的同志,通过邓小平办公室转送的。

唐:1973年夏季开了中共“十大”,1975年初开了第四届全国人大以后,迟群没有爬上去,对于你们的关系来讲是个关键点。

惠:对!关键点。他的本质暴露也是在这个时期,就是说他当不上中央委员、当不上教育部部长,别的台阶他又上不去,他的要害就在这里。迟群跟谢静宜的关系是又和又反。和的时候,他想利用谢静宜跟主席说他的好话;反的时候呢,就是说他没当上中央委员,跟谢静宜有关系,要不怎么是你当上了中央委员,我怎么就当不上呢?就是说,你谢静宜当上了以后把我挤掉了。他怀疑谢静宜在主席面前没有给他说好话。就是这个事儿。迟群说,清华大学的地位和作用,非常重大。谁能领导清华大学呢?他大会上说,下来也经常跟我们说,这是他的名言,出口就来,“我的能力是超强的”。“我能领导清华大学,我就可以当一个副总理”。

他的野心支配他好多的言论。有的言论呢,是他表达能力强。还有些呢,是他嘴上把不住门。他要是心血来潮以后,什么都可以说。你说他水平高,那他跟谢静宜闹矛盾后,在谢住室的门口小便,那算什么?就因为这个事,我们还专门找过他,批评他。

唐:我的采访差不多了。非常感谢你!

(作者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萧 徐)

朝鲜停战协定签署仪式和战俘谈判

阎稚新



1953年7月，国际红十字会在板门店（前排左三为作者）

年前，当年参加朝鲜谈判的林戊荪战友告诉我，1953年在西方出版的书籍中有两张我的照片。翻开这历尽沧桑仅存的孤本，半个多世纪前参加朝鲜谈判的日日夜夜恍若昨日。同人亦发现，在我国出版的正式文献上有彭德怀签字照片，我也在后排见证。从1952年到1954年，我是以板门店联合红十字会中方代表的身份参加朝鲜谈判的。当时也只有国际红十字会代表才可以进入对方占领区。

赴朝前我曾接收毛岸英遗物

我还没到朝鲜，战争的残酷就透过前线的硝烟传到北京。最使我感到震撼的是接收毛岸英烈士的遗物。

1950年11月25日，美机疯狂轰炸大榆洞志愿军总部时，在志愿军总部担任俄语翻译兼秘书的毛岸英，在美机几十枚凝固汽油弹的火海之中，不幸牺牲。不久志政组织部将毛岸英的遗物，送来总政组织部。

我那时在总政组织部兼管志愿军的优抚工作，亲手检点过这包烈士遗物。这是一个普通的包裹，里面只有几件洗干净的衬衣、内裤和鞋袜。最大的发现是遗物中夹着毛主席写给毛岸英的一封信，是四十年代从延安托林彪捎到苏联的。这是毛主席在三四页泛黄的麻纸上，用毛笔行书写的一封信。可惜过了五十多年，对信的内容已经淡忘。印象中只记得毛主席谆谆嘱咐儿子毛岸英：要好好学习苏联经济工作，将来为新中国建设做贡献。

看着这一件件遗物，我不禁想起1950年春和毛岸英偶然相邻的情景。当时我在太原战役前线被子弹击中胸膛，从心脏和脊椎间斜穿而过。九死一生后转到北京治疗养伤待命，住在中组部前门外利顺德饭店招待所。当时毛岸英的岳母张文秋大姐也住在那里，同在一个小灶餐厅就餐。毛岸英和他的新婚妻子刘思齐，每逢假日就来招待所看望张大姐。我初次看到毛岸英时，他穿

一身朴素的蓝布中山服，体型修长，相貌英俊，和年轻时的毛泽东有几分相像。那时他刚二十多岁，但显得很稳重。和不苟言笑的毛岸英相反，刘思齐笑容甜美，背着一个帆布书包，一身学生装扮。他俩是 1949 年开国大典后结的婚，那时还在新婚蜜月之中。

毛岸英夫妇和邻居们一样，进进出出，也逗一下我两岁的儿子。这个四合院顶棚下的天井里，摆一个乒乓球台子。毛岸英和刘思齐常在一起打球，有时我也和他打两盘，不计输赢。巧合的是，毛岸英 1948 年从苏联回国后，还曾经到我老家临县搞过土改。作为毛主席长子，毛岸英牺牲时年仅 29 岁，也没留下一个后代。战争的残酷和命运的莫测可想而知。

这包遗物经我检验后上报总政首长，按应该交给家属。不管经历了怎样的周折，它肯定要经过毛泽东的手。最高领袖把儿子放到彭德怀身边，除了对总司令“唯我彭大将军”的信任，还有对湖南同乡个人的托付，彭德怀的压力可想而知。

不久，我就受命作为国际红十字会板门店小组的中方代表前往朝鲜三八线高丽古都开城。当时《人民日报》还发了消息。

亲历朝鲜战争停战协议签字仪式

1953 年 7 月 26 日，朝鲜持续三年之久的大规模战争，经过上千次的艰苦谈判终于达成停战协议。我作为板门店联合红十字会中方代表，首先参加了双方首席代表的板门店签字仪式。

7 月 27 日 9 时 30 分，出席签字仪式的双方人员，分别由大厅的西门和东门入内就座。大厅东部、西部作为双方出席人员的席位，各有一排排可坐 300 人的长条木凳。西部第一排就座的有中朝方面的杜平、曾思玉、张明远、李呈瑞与张香山、王焰等领导人。我坐在他们身后的木凳上，等待着庄严时刻的到来。

这座签字大厅规模很大，双方商定共有一千多人参加，每方各有 300 名代表，各国记者数百人，大厅需要占地 1000 多平方米的面积。根据双方协议，签字大厅及内部设备，由朝中代表团提供和布置。这是一个关系全球观瞻而又极其紧迫

的繁重任务。有的美国记者说：“摊子铺的这样大，要修到何年何月呀？”不料，朝中方面早已从全国各地把预制配件紧急调运到开城，经过通宵达旦的设计和施工，只用了一个星期，就奇迹般地矗立在板门店了。

上午 10 时整，我方首席代表南日大将与对方首席代表哈里逊中将，从南门走进大厅会议桌前，各自在事前准备好的朝、中、英三种文字的 9 本朝鲜停战协定上，用了不到 10 分钟时间，就顺利地完成了签字仪式。唯一的插曲是，美国首席代表哈里逊中将一反翻译常例，坚持把中文译名改成“海立胜”。看来，这是美式的阿 Q 精神。

随后在汶山的一个帐篷里，“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国陆军上将克拉克，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了字。他在签字后说：“当我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时，我知道这件事并未结束。”接着他又沮丧地说：“敌人甚至较以前更强大，更具有威胁性。”

值得注意的是，在停战谈判和签约中，一方为朝鲜和中国，一方为美国代表的联合国，但没有当时南朝鲜的代表。据我的记忆，这一方面是由于朝鲜方面的坚决不承认李承晚政权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也是美国和南朝鲜当局在战和问题上产生裂痕，担心坚决反对停战的李承晚影响和谈。而我方则对朝鲜政府给予了最大的尊重，由朝鲜人民军南日大将出任朝中方面首席代表。

彭德怀用毛笔一笔一划地签下自己的名字

我怀着喜悦的心情走出签字大厅，在回开城的一路上，锣鼓喧天鞭炮齐鸣。街道上的扩音器里，传来了金日成元帅和彭德怀司令员停战命令的声音。夜幕降临，板门店中立区的探照灯光柱，骤然升起，划破天空。这是双方代表签署停战协定后 12 小时起立即生效的标志！

7 月 27 日下午，已在北京主持军委工作的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到达开城，下榻来凤庄。当天晚上，彭总出席了志愿军代表团庆祝停战的晚会，还高兴地观看了由著名越剧演员徐玉兰、王文娟主演的《西厢记》。当时越剧团隶属总政归志愿军建制。余兴未尽的彭总还走上后台勉慰演员说：“你们这些小鬼不容易呀，从老百

姓一下子变成志愿军！”

7月28日上午，我又有幸在开城参加了彭德怀司令员签署《朝鲜停战协定》的隆重仪式。彭德怀在代表团李克农、杜平、乔冠华及李呈瑞、张明远等领导人的簇拥下走进松岳堂，腰杆笔直旁若无人，一派大帅风度！几十个中外记者蜂拥而上，镁光灯闪成一片。

彭总从容地戴好老花镜，看着摆在面前的《朝鲜停战协定》，拿起毛笔。和前天“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在纹山用钢笔率性潦草的签名相比，彭总端握狼毫一丝不苟地签了彭德怀三个大字。在双方悬殊的火器停歇以后，两种文化的差异越发凸显。

看着彭总倔强的棱角，这是一个东方男子汉的形象。我想起1939年在山西沁源县支角村第一次听他讲话的情景。那时我是抗日决死队的年轻教导员，第一次听作为八路军副总司令的彭德怀训话。他身穿普通灰色军服戴着“八路军”臂章，也是这种不屈必胜的表情，在龙王庙用那铿锵的湖南话一气讲了几小时。

彭总签字那天也是普通军装，那时还没有军衔。那年他55岁，短短的平头已看见白发，但他的每一个字都震动着世界。他在签字后谈话说：“朝鲜战争证明，一个觉醒了的爱好自由的民族，当它为祖国的光荣和独立而奋起战斗的时候，是不可战胜的！”

后来身陷逆境的他在《自述》中可能更真实地表现了他的军人个性：“我在签字时心中想，先例既开，来日方长，这对人民来说，也是高兴的。但当时我方战场组织，刚刚就绪，没有充分利用它给敌人以更大打击，似乎有一些可惜！”

在彭总签署朝鲜停战协定的珍贵照片上，也有我在后排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

烟火舞会不夜天

当晚，在彭总签过字的会议厅里举行庆祝舞会，总政越剧团上海姑娘们化妆伴舞。我们以往驻地相邻，曾有来往。在庆祝停战胜利的舞会上相逢，再也不用怕飞机的轰炸防空警报的干扰，格外尽兴，直至东方欲晓。

彭总不跳舞，但酷爱京剧，最喜欢的剧目是

“失、空、斩”。陈赓喜欢的是“贵妃醉酒”。那些天，代表团驻地成了欢乐的中心。志愿军文工团和人民军协奏团，在可容二千人的开城人参厂大礼堂轮流慰问演出。记得朝鲜著名舞蹈家崔承喜的女儿安圣姬，也作了精彩表演。

演出刚刚落幕，桌椅板凳立刻搬走，那时探照灯划破夜空烟花腾空而起，大型交谊舞会开始了。安圣姬和朝方女演员浓妆艳服，主动邀请我和中国战友跳舞。作为大家推选的俱乐部主任，我带着刚从舞台下来的安圣姬跳了一曲。还没卸妆的安圣姬非常漂亮，飘起的长裙飘飘欲仙。我们严守规矩，保持距离，一曲终了礼貌地把舞伴送回座位。而朝方官员与舞伴脸贴脸、胸贴胸的作风，比较开放。那时朝鲜人民军苏式建制军装笔挺，营以上军官都配备一辆吉普，除司机外同车还有警卫和女秘书。

在会仓的岩洞大礼堂，著名越剧演员徐玉兰、王文娟，主演了《西厢记》和《梁山伯与祝英台》。在炮火连天的战场硝烟还未消散，那些天长地久的爱情故事更显得情意绵绵令人陶醉。

西方书籍的两张照片引起的回忆

1952年至1954年，在停战谈判代表团领导下，我作为板门店国际红十字会的中方代表，先参加了联合红十字小组交换战俘的筹建工作，又参加过解释代表团战俘解释工作的攻坚战。这两张西方书籍中的照片，一张是在战俘交接区，我和各国代表一起接收伤病战俘。一张是在中立国印度代表的主持下听受虐战俘的控诉。

当时双方的根本分歧是：我方认为应按《日内瓦公约》“战争结束后战俘应该毫不迟延地释放并遣返”回国；美方认为应就地释放由战俘自己选择去向。双方进行了艰苦的谈判，因为这不仅关乎战俘的命运，也关乎两大社会制度的政治形象。最后达成的协议是有中立国主持，由交战各方向本国战俘集中进行甄别解释工作，最后在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主持下，逐一由战俘本人决定去留。这就是战俘“解释代表团”的由来。

当时曾有指示争取全部战俘回国，但一进入实际操作遇到的困难难以想象。战俘交接在一个200平方米的帐篷里，中间是中立国代表，一侧

是中方代表。战俘集中在东场里交接区几十个这样的帐篷里。战俘从一侧门进来,在中立国的监督下,听取中方代表的解释后当场表态。愿意回国的从另一侧门出去,由我方接待和医务人员接收,不愿回国的从原门折回。

当时我担任板门店交接组(中组)的中方代表。面对一个个战俘,我的心情是十分复杂的。很多战俘由于在战俘营的威胁充满恐惧,当他们折回原路时眼睛里是诀别故乡的绝望。决心回国的战俘也是充满疑虑,他们有的写过拒绝回国的声明有的被迫纹身。有时遇到当场指着你大骂和把唾沫吐到你脸上的战俘,虽然明知他是受人驱使,但也要表现出极大的耐心和定力,这时所有的镜头都在对着你。

我们接收的战俘状况凄惨,我曾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元老主持人齐越主持的座谈时,介绍了朝战双方交换战俘和解释工作的艰苦斗争。我们也组织战俘在记者招待会上揭露战俘营里的虐行。包括印度总理在内的各国舆论,都对联合国军违反日内瓦公约的行径进行了谴责。两个西方左派记者,根据调查和我们提供的资料写出了《巨济岛真相》和《背信弃义》。

我见过这两个西方的左派记者。贝却敌(Wilfred Burchett),澳大利亚人,法国巴黎《今晚报》(Ce Soir)记者。阿兰·魏宁顿(Alan Winnington),英国《工人日报》记者。他俩都个头不高,体型瘦长,看样子三十多四十来岁。贝却敌虽少言寡语,可跳起“华尔兹”来舞兴甚浓,满场旋转。

谈判桌外的美国代表

实际上由于美方的重重阻挠,原定90天的解释工作只进行了10天就被迫中断,85%的战俘没有得到见面。当时有案可查的中方战俘有1万4千多人。最后只有440名战俘申请回国,12名申请去中立国,15名在看管期死亡,14,235名被裹胁到台湾。

这件事现在的学者可能难以理解,美方为什么花这么大代价背上安置上万战俘的包袱。但在当时这是甚至高于战场胜负的两种制度两大阵营的政治较量。在板门店我方的彩色牌坊上写着

“祖国怀抱”,对方也竖起一座牌楼写的标语是“奔向自由”。

从战场的较量到会场的对峙,双方在谈判桌上的冷战达到了空前绝后的地步。在双方上千次的谈判中曾创下了双方一言不发“静坐”132分钟 records。但在联合红十字会,由于是以人道主义为宗旨,相对沟通容易些。

双方在帐篷里工作会谈时,隔着一张铺着绿呢子台布的长桌。有意思的是,代表东方阵营的中朝代表坐在西面,而作为西方的联合国美国代表坐在东面。双方轮流担任主席,互不握手、不递烟,表情严肃。我记得我作为轮值主席时要整个班子连夜开会,准备大量文案。而美方则显得比较有个人色彩,常常随意提出议题或建议休会。这时我们的英文翻译尤为重要,他们在同声翻译的同时,往往在条子上写上几个字给你提出建议。

在谈判桌上虽然也是唇枪舌剑,但相对比较务实。对明显违反日内瓦公约的事例,美方也能表示歉意。我的对手记得是美国的奈德琳和英国的纳托。在冬天,我们穿着新发的毛料军装和大衣,皮鞋皮帽。美国代表会在会下摸摸你的衣襟说料子不错,但接着耸耸肩膀说可惜样子难看。

那张在朝中方面扎起的“祖国怀抱”下的照片,就是双方红十字代表的合影,右边分别是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南朝鲜代表。牌楼两侧分别写着:“朝鲜民主共和国万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这在当时拒绝承认中国的敌对的美国也是很难得的。

当然,我们深知,对手对你的尊重首先取决于战场上的胜利。但外交领域的斗争艺术无疑也是难以替代的。在这里,我们领略了留着八字胡的李克农和才华横溢的乔冠华的风采,不少人都由此走上了外交舞台。

55年过去,斯人多已作古。我也过了88米寿,所幸顽躯尚健,笔耕不辍。友人都劝我撰写回忆。但正式文献权威回忆高山仰止,我只能以亲历亲闻,或可缀以边角,留给后人。

(责任编辑 萧徐)



好一个“小兵”金敬迈

——《好大的月亮好大的天哪》摘记

李南央

父亲李锐 1966 年 7 月 9 日的日记中记有：“至下午四点半，将《欧阳海之歌》<读毕>。此书值得多次翻阅，可学之处甚多，完全崭新的品质。”父亲那时已近知天命之年，且是戴罪之身，在看此书。我的同龄人中就更是无人不读“欧阳海”，无人不知它的作者——金敬迈了，除非他从来不知“书”为何物。金敬迈笔下的欧阳海与同时代的雷锋不同，他不是党要我们学的“样板英雄”，而是个有血肉，有性情的战士，让我们这些少男少女们由衷地爱，由衷地效仿。

后来，金敬迈这个名字在“横扫一切”的年代曾被列入了报纸上那已经缩得很短、但能领导我们“继续革命”的耀眼名单中，只是时间不长，便无声无息地消失了。现在若在大陆的街头做个调查，能够答出金敬迈何许人也的，怕是上不了两个百分点。

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的老总送了我一套“九思实录书系”中已经发行的书，其中有一本《好大的月亮好大的天哪》，作者居然是金敬迈。我把这本书放到了聂元梓、徐景贤这些当年名气更大些人的回忆录的后面，但这最末读的一本却让我记下了一万多字的摘记，写了这篇文章：请读读《好大的月亮好大的天哪》，这本书厉害！

“不知从哪年开始，说清楚、说实话成了难题。……你要谈‘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这件往事，别说什么，说不得；你要提到‘四人帮’的什么什么，别讲别讲，不能讲。不说不讲行吗？这是对老百姓造下的孽、欠下的债，因为你不好意思，它就不存在了？这么糊弄下去，哪年是个头？”

—

几十年过去了，尤其 1989 年夏后几年，“文化

大革命”在大陆成了个不能碰的禁区，其真实面貌已经模糊得十分可以了，要不在纪录片《Morning Sun》中将面孔隐在黑暗中的宋彬彬，怎么会不再忌讳让自己给毛泽东带袖章的照片和博士像一起堂堂正正地印在 2007 年师大女附中的《知名校友》册上？要不编辑怎么会把正是在毛泽东的一句“彬彬？要武吗！”的激励下被打死的校长卞仲耘和宋放在册子的同一面上！纽约百老汇也有了音乐剧《江青》。弄得我女儿这一代中的一些孩子，以为江青与阿根廷前总统夫人艾薇塔·贝隆一样，虽然是影视演员出身，靠姿色手腕当了主席夫人，却是个给国家做过不少好事的悲剧人物。

而江青是与林彪搅和在一起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在 1980 年的 11 月 20 日由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审判的。当天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写着：“林彪、江青一伙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罪行最重、为害最烈的反革命集团。他们为了篡党篡国，有预谋地诬陷、迫害包括国家主席（按：刘少奇）、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按：朱德）、国务院总理（按：周恩来）、中共中央总书记（按：邓小平）在内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一批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没有死于敌人的监牢和炮火，却被林彪、江青一伙折磨致死。”

金敬迈在书中先引了江青在文革中接见红卫兵时讲的一段话：“革命小将们，我也是个很普通的人，普普通通的人，只不过为党为革命多做了些工作罢了。这也是应该的。你们不要把我看成个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不是。首先，我是个共产党员，其次，我是主席身边的一个工作人员，第三，我才是他的老婆……”

金敬迈然后说：

堂堂中华，如今只剩下八出戏了。八个样板全都没有了作者，都是首长一个人“磨”出来的“剑”。

谁要是提个意见，谁就是反革命。……不就是对待一部文艺作品吗？样板戏成了人人必须信奉的“圣经”，它比圣经还神圣。世上还有什么事情能比这个更荒唐？

面对这个荒唐，谁都不敢吱声。八亿人民都懂得：她是碰不得、沾不得、惹不起的。黎民百姓懂，当官的也懂，而且官越大、地位越高，说话越算数的官，懂得的越具体：她的可怕不在于她“第一”是什么什么，也不在于她“第二”是什么什么，她的可怕、她的碰不得沾不得，她的惹不起，在于她“第三”才是个什么什么。

首长不是自称：我只是谁谁谁在文艺战线上的一个游动哨兵吗？哨兵，你手里拿的是一支步枪，还是一颗原子弹？怎么威力就这么大，把全国的老百姓，不，岂止是老百姓，把全国全军全党的各级干部，包括中央领导人在内，都给震住了？

据称中国有八亿舜尧，假定男女各半，都是四亿，那为什么单单她这个“四亿分之一”是如此神圣、如此不可侵犯，如此至高无上呢？她凭的是什么？她仰仗的是什么呢？

金敬迈谈的不是什么理论问题，是“浩劫”中人人尽知的事实。

问：她仰仗的是什么呢？

二

感谢香港让金敬迈发出了声音，让我们知道这个曾短暂地“混进”领导队伍的人眼中所看到的“文化大革命”是个什么东西。金敬迈字字滴血，他让我们必须面对、必须审视、必须承认那场运动过后沉淀在中华民族心底的是些什么样的污垢，扪心自问：不把文化大革命留给我们的耻辱说清楚、洗刷干净，我们的民族还有希望吗？我们的后代还有未来吗？

金敬迈如此写道：

一场“史无前例”把人们心底最丑恶、最肮脏、最狠毒、最惨酷的一面搅翻了……小时候，我知道日本鬼子很坏，长大后，在这场“非常及时、非常必要”的创举中，我才明白，中国人当中的有些人并不比日本鬼子更好。

作为一个人，没有什么比尊严更值得珍贵的了。哺乳动物中……只有癞皮狗才不要尊严。我们

则动不动就侮辱人，以侮辱人为乐，以侮辱人为革命。我们把自尊、清高、独立的人格，都看成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反倒以不怕丑、不要脸为荣。斗争会上，谁最会污辱人，谁就最革命；谁能变着“花样”作贱人，谁就是积极分子；谁肯下狠心，谁就是我们重用、依靠的对象——几十年来，我们培养造就了这样一些“基本群众”。不管你犯的是什么罪，也不管你有错没错，只要“上边”说话了，就谁都可以往你脸上吐唾沫。吐唾沫的人革命最坚决、革命性最强，是好人；被吐的人，稍有不满意，就是对抗无产阶级专政，只有让唾沫挂在脸上，仍然满面笑容，这才表明你是可以“挽救”的。……我们到底要怎样折磨我们的人民，怎样来糟蹋我们这个民族呢？难怪敌人咒骂我们，骂我们是“痞子运动”！

“中国赫鲁晓夫的臭婆娘”在挨斗时，胸前挂着一长串乒乓球，……为什么要这样来作贱污辱一个人，特别是污辱一个女人呢？因为首长说了：她出国以前来请示过我，我嘱咐她说，衣着打扮要得体，你是代表社会主义中国出访的。但是，革命小将们，她不听我的，她把我的话当成耳边风！她居然像资产阶级的贵妇人似的戴了一串项链……这就犯下了滔天大罪了。大学生们、红卫兵们心领神会，于是，我们在污辱人的招数上又开创了一片新的天地。乒乓球加入抹黑脸戴高帽的行列，成为我们这个黑铁时代的又一标志性的象征。历史会记住这一“创举”的。创举发生在那个全国著名的大学里。他们玷污了自己的光荣传统。我不知道他们痛不痛心。但是，历史不会把这件事忘记。受污辱的不是哪一个人，也不管他是好、是坏。受污辱的是我们的整个民族！

三

我们这个民族有一个传统，管你是当爹妈的、还是当领导的，从来都只喜欢听话的“乖孩子”，“乖下级”。“听话”、“乖”是晚辈和下级为人的首要条件，是一切被肯定的品德中最优秀的品质，是诸多美德中最关键最美的美德。“乖”；家长气顺，家庭和睦。“听话”；领导放心，天下太平，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

听组织的话叫做“进步”，是向组织“靠拢”；是被赞扬、被肯定的；而保留自己的看法，坚持自己

的信念，被当成是“顽固”、“错误”，和组织上“分道扬镳”，不走一条路。这算什么标准？这正是被马克思批得头破血流的那个“柏林小市民”麦克斯—施蒂纳的观点！正确与错误、好坏是非的标准如此荒谬，只因为多年来，我们以什么“立场”的名义，“阶级”的名义在提倡背信弃义。我们从“阶级斗争”出发，鼓励落井下石。我们根本不谈人性，我们不承认有人性，我们完全无视人性中的正直，无视品德中的善，无视人间的美，用“斗争”用“立场”来掩盖一切假、恶、丑，借斗争弘扬假恶丑，以至假的、恶的、丑的人和事，四处泛滥，上下泛滥，无处不泛滥。人性泯灭了，道德沦丧了。这是我们做的孽！我们种下的这颗苦果是肯定要发芽的。

一个丧失了自信、自豪、自尊的民族，一个毫不计较人格、人品的民族，一个挨了一拳连哼都不敢哼的民族，必将被淘汰。世界民族之林中，没有它这么一棵歪脖子树赖以扎根的土。

四

金敬迈是以“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图谋政变”为由被抓的。刚进秦城的头几年，没有人发给他如当年延安知识分子们整风必读的“学习文件”，而且不像那时多人关在一孔窑洞，是单人监禁。他与外界唯一的连通，是高高镶在墙上被铁栏分割成32块的一扇小窗。他要求看书，要求看马克思、恩格斯的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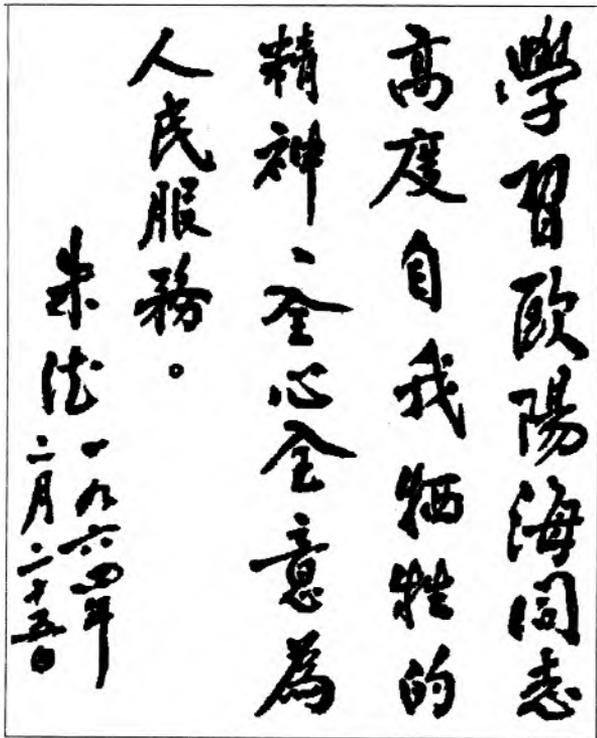
我要看书，我不能光听你们是怎么说的，你们说的这些我已经听够了，我还想知道“世界五百年出一个”、“世界一千年才出一个”之外的其他人是怎样认识世界、评价历史、理解人生和预期未来的。……我要的这点“自由”也不能给吗？你们怕什么呢？

无人理睬，他只能日日枯坐在那张直接放在地上的硬床板上，盯着那32块小天苦思冥想。他想出了眉目：

害怕犯人看书的所谓专政，是弱不禁风的专政，是不堪一击的专政，是野蛮之至的专政。

后来有马列的书读了，他如饥似渴地看，看得那一双被打坏了的眼睛瞧什么都模糊一片，他只好放下书又开始想呀想啊：

我是个人，一个活人，我不仅仅是个读书机。



朱德为欧阳海题词

作为人，我要求得到人应有的起码待遇。在无法证明我罪当枪毙之前，你就得把我当成一个人来对待。即令我罪恶万端，早该五马分尸，那在您“分”我之前，也得把我当成一个人。……早在几百年前人们就已经确认：“人权天赋”。……当然，也可以像我今天这样，一切做人的权利都被剥夺了。这又怎样呢，这能说明您伟大，您有力量吗？不。这只能说明您的虚弱，您的害怕和您的毫无自信以及这个时代的无比黑暗、无比野蛮和无比荒唐。

金敬迈在受难中思考，这思考让他的精神升华：

岂止是被关在单身牢房中的我？所有被抹杀了人的个性的人，都不是一个完整的人，都不是一个真实的人。什么“工具”，什么“齿轮和螺丝钉”？“工具”能是人吗？“齿轮”、“螺丝钉”能是人吗！几千年来，人类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就集中在对“人”的解释上，对“人”的日益尊重成为人类进步的尺度。人类是逐渐把人当成人的。只有奴隶主才一直把奴隶当成工具……

金敬迈悟出了自己是“人”而不是“工具”；认识到把人当作人，对人日益的尊重才是进步，而把人当成工具则是倒退到奴隶社会了。在这一点上，他比秦城监狱中关押过的许多共产党的高级干部

要了不起得多。回归人性!有多少共产党的干部悟到了这点?

我知道母亲在文化大革命中揭发了父亲几乎所有的朋友,写了很多负面的外调材料。后来在整理父亲的旧日信件和日记中,又知道父亲在文革中也被要求写了很多的外调材料。虽然他要求自己实事求是,但是从未拒绝过写材料、有求必应,尽管有时实在无甚可写,搜肠刮肚地也要应付差事。而金敬迈不然,当中央专案组的外调人员让他在秦城写揭发陈伯达的材料时,他拒绝了: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除亲自动、亲自领导者外,还有“文化大革命小组”,组长就是陈伯达。如果组长是骗子,那怎么看待这个“文化大革命”呢?揭发陈伯达,会不会误伤“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的“文化大革命”?揭发陈伯达,会不会成为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我不能揭,太危险。再说我也没有什么可揭的。硬要我揭发,我觉得他这个“骗子”比有些“中央领导人”还多少强一些呢。

……中央领导人、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和骗子之间究竟有多大的区别?如果能一夜之间就变过去,那说明他们如果不是同一流货色至少也相差无几。这就有点麻烦了。陈伯达“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混进党内少说也“凡四十年”了。这么长的时间全党也没能识破他的真面目,那说明要区别一个中央领导人是不是骗子,非常困难。是他隐蔽得太深,我们不易察觉呢,还是他们之间的区别本来就不大,或者说他们本来就是一回事?还有没有别的“中央领导人”也是尚未被识破的骗子呢?往后平民百姓们怎么看待“中央领导人”呢,是先把他们当成骗子免得上当,还是宁愿上当,姑且先把他们当成中央领导人再说呢?或是既把他们看成是中央领导人又把他们看成是“刘少奇的一类骗子”呢?“刘少奇一类”骗子的出现,确实带来一系列问题:骗子和领导人穿的是连裆裤,已经难解难分了。

这不是危言耸听,这是今后还将时时遇到的一个十分具体的问题。遭罪的是真正的“小小老百姓”。从今往后,他们还能信得过谁呢?把骗子当成了中央领导人,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把中央领导人当成了骗子,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照样没有好下场。反正老百姓啊,完了。

这是何等上乘的黑色幽默佳作!金敬迈参透了!

……我们现在正借反对资本主义、反对修正主义为名,大肆复辟封建主义。你就看看现在的“一言九鼎”、“唯我独尊”、“天无二日”;就明白我们在干什么了。

……什么“脱了裤子割尾巴”,什么“竹筒倒豆子”,把最见不得人的事“抖落”出来……都是主张人们不要尊严,不要脸的。……当你连自尊心都不要了,当你连脸面都不顾了,那么好了,你已经“脱胎换骨”了。这该是多么荒唐。

……硬要把人往死里逼、往疯里逼、往坏里逼,这算什么本事呢?重新做人?怎么重新做人?重新做鬼吧!

金敬迈拒绝做鬼,他要做人。他认为:“一个由连自尊心都没有了的人民所组成的民族,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吗?这样的民族能被世人瞧得起吗?”他在书中记述了如何为做人而抗争,他以命相拚,让那个将烟灰弹在他牢房地板上的“领导”用手帕擦净它;他喂养过一只小老鼠,一只后来因天天放在“红宝书”上由绿变红的蚂蚱,两只跌落在放风夹道的地上凄凄待毙的小麻雀,他从这些小生灵的身上体恤着灵物的温暖和情感,让自己像个人一样地活下去,而不变成鬼!金敬迈了不起啊!还有什么比从“狗洞”中“走”着出来,保持了“人”的尊严和情感更让人敬佩的事呢!

五

刚解放时,金敬迈是个文工团的小演员,他除了想演好英雄人物,对自己的一生没有太大的奢望。一本《欧阳海之歌》把他身不由己地推进了政治的漩涡,在里边蒙头蒙脑地跟着转了四个月零三天,还没找着漩涡的流向就灭了顶。他说:

我还是老实交待一下吧:我从未反对过谁。我是从基层来的一个小兵,我有什么理由,有什么根据去反对谁呢?原先我以无比钦佩无比敬仰的心情把您们看得无比神圣,后来,特别是这七年多来,当我明白了“伟人们之所以看起来显得伟大,只因为我们自己正跪着。站起来吧!”这个道理后,当我冷静地想了想后,我倒是很瞧不起一些人。从我那还没脱掉的胎,没有换掉的骨子里瞧不起

一些人：凡夫俗子，不过尔尔，既不伟大，更不神圣。

这不是学者之言，这是个曾经被“伟人们”翻手招入近侧、又被他们覆手推入大狱，经过了“思考着”这一美丽境界的“小兵”，用双腿支叉起大写的“人”之后的实在话。这个觉醒了的小兵的认识质朴而彻底：

一个人水平的高低，取决于他的觉悟、修养、道德、学识，情操等等，而不是由他担任什么职务

而定。人，如果不和他屁股底下的那把“椅子”分开，世界就麻烦了。世上还没有这样的椅子，谁一坐上去，水平马上就高了。

金敬迈在这里道出了一个真理：一个知耻的民族，方能爆发出“后勇”的精神；一个由“人”而不是“工具”组成的自尊的民族建立起来的国家，才会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强大国家！

(责任编辑 吴 思)

书 名	作者或主编	定价	邮 费
风雨岁月——1964——1976年的清华	刘 冰	34.00	7.00
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	托洛茨基	58.00	7.00
季羨林自传	季羨林	45.00	7.00
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	邢同义	24.80	6.00
经历——我的 1957	和凤鸣	29.00	6.00
丁陈反党集团冤案始末	李向东 王增如	34.00	7.00
知情者眼中的周扬	徐庆全	24.00	6.00
一个少年犯的回忆录	常振威	26.00	6.00
河南大饥荒	宋致新	22.00	5.00
淮海战役秘密战	夏继诚	33.00	7.00
辽沈战役秘密战	松 植	35.00	7.00
平津战役秘密战	松 植	36.00	7.00
人生至理的追寻	梁漱溟	35.00	7.00
透视当代中国重大突发事件(上下)	程美东	68.00	8.00
综合哲学随笔	高亮之	22.00	5.00
牛棚杂忆	季羨林	29.00	6.00
日记的胡适	李伶俐 王一心	29.80	6.00
张国焘传	姚金果 苏 杭	39.80	7.00
红墙见证录(上、下)			
——共和国风云人物留给后世的真相	尹家民	69.80	8.00
学问人生(上、下)——中国社科院名家谈		79.00	8.00
庐山会议实录	李 锐	18.00	5.00
赫鲁晓夫回忆录	(俄)尼基塔·谢·赫鲁晓夫	29.00	6.00
沧桑十年——1966—1976 共和国内乱的年代	马识途	38.00	7.00
命运与使命——中国知识分子问题世纪回眸	冯建辉	29.80	6.00
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张素华	28.00	7.00
季羨林谈读书治学	季羨林	19.00	5.00
红墙大事——共和国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上下)	张树德	69.80	8.00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 69 号
 邮 编：100045 收款人：炎黄春秋杂志社
 (注：邮购三本书以上，可按总书价的 10% 付邮费)

代购代邮

历史是一面镜子。读史可解惑，可益智。本社对读者函询较多的有关图书，开展代购、代邮服务。

《透视当代中国重大突发事件》叙述了 1949-2005 年间中国重大突发事件的发生过程及其深刻经验教训。书中收集的突发事件每一个都具有标志性意义，第一次农村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共和国史上第一个导致副总理被处分的“渤海二号”石油沉船事故；第一个导致部长被撤职的 1987 年大兴安岭火灾……

《沧桑十年》在中国历史上的那场空前灾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今天的年青人已难以置信，那些曾受过迫害的人有的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作者真实、公正、客观地写下了当年的遭遇，给后人留下宝贵的教训，目的是杜绝惨绝人寰的悲剧重演。

《经历——我的 1957》这是一段沉重的历史：1957 年的反右斗争，作者和丈夫共同被划为右派分子，劳动教养。在 1960 年的大饥荒中，丈夫被活活饿死在甘肃酒泉夹边沟劳教农场里，作者的大半生经历了家破人亡的不幸和痛苦、受尽各种凌辱委屈，经受了—一个女性所难以承受的各种情感遭际与心灵创伤。这是血和泪写就的历史。

《日记的胡适》胡适自 16 岁开始，直至去世的前三天，共留下二百多万字的日记。从日记看胡适，这位中国新文化的弄潮儿与代表人物展现给我们的，必定不只是他人生中精彩的一面，或许更多，我们将看到隐秘于那些琐碎文字背后映射出的个性和真实自我，那便是一番别样的风景了。

请理解老一代

——怀念李慎之

刘志琴

今年是李慎之先生逝世五周年，时间早已远去。我与他既不是深交，也不是同辈，只是因为他的言谈风貌光照后人，尤其是他一篇《国庆独语——风雨苍黄五十年》感动过无数人，有一件事至今难忘，我想应该公示于众，以告慰崇敬他的读者。

李先生晚年萌生了口述自传的想法，但这要有一些花费，虽然为数不多，但对一个两袖清风的长者来说，也是一项额外的开支。这时有个朋友对我说，有一个李先生的崇拜者愿意提供资助，不要任何报偿。这个朋友50年前在新华社工作时，曾经奉命监督李先生劳动改造，虽然并没有过分为难李先生，但为此他一直心怀内疚，总想有所报偿，因此就这机会引来了邹先生。

记得那是在一个秋天的午后，从广州出差来的邹先生来到我家，丢下一万元托我转交，我说，李先生住处不远，我带你去见见他，他说不用了。我说：“那我代表李先生谢谢你。”他说：“不！你应该代我谢谢李先生，是他的文章使我看到了共产党的希望。”就这样，他连地址也没有留下。其实闻讯要予以资助的不止他一人，我的老同学复旦大学教授汤纲，多次提出他可以资助李先生出书，都被李先生拒绝了，唯有这素昧平生的邹先生，是我说服李先生收下的，因为他一句“谢谢李先生”，也使我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5年前，李先生去世后我写过一篇悼念文章《不是谢幕，是序幕》，发表后收到一些年青人的来信，我就其中一些共同性的问题作了回答，5年了，有些问题尚未过时，因此照录如下：

丹冰：

看到你的来信，就有一股想说些什么的冲动，这可能在我心底早有与隔代人相互沟通的愿望，虽然我每周上班都与年青人交谈和争论，但学术问题与两代人经历的体会并不一样。

怎么说哩！我与李先生相比是晚辈，但比起你们来就是前辈。我是处在上下两代人的中间地带，中间也是中介，所以我很想在老一辈革命者与新生代之间做个媒介和桥梁。这是因为我看到老一辈与新一代之间理解问题的差异，或者说我体会到老一代的苦闷、辛酸和无奈，这是不容易为年青人理解的，若能充分理解这种境遇和心态，才能真正了解我们所处的时代。

我这样说，是因为看到网上有人批评李慎之是圣人的说法，在这以前也看到对周总理的责难，这些都不无道理，但这都是在当今环境中的质疑。殊不知，在社会大变革之际，隔代如隔山啊！有一则传闻说，李敖对一个大陆的知识分子说：“我敢在总统府前骂李登辉，你敢在中南海门前骂毛泽东吗？”使他哑口无言的回答是：“我敢到台湾骂李登辉，你敢来北京骂毛泽东吗？”其实，毛泽东早已断言鲁迅若活在建国后的大陆，不是下牢狱就是沉默，不可能有第三种选择，鲁迅历来被认为最有硬骨头精神，连最有骨气的中国人只能不成功即成仁，又有谁能超越其外哩？

“圣人”是早已消逝的词汇，到21世纪又召回这一用语，只是用来表述此乃人中之杰，这样极品式的歌颂，只为一个非常简单的理由：敢于说真话。说真话算什么圣人？！这在哪国、哪代也只是普通的道德操守，任何一个教徒都要以说真话为虔诚的起码原则，可在这里竟然成为圣人，又有谁能理解呢？

是的，在中国说真话之难，难于上青天。这不单单是出于对严刑峻法的畏惧，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不怕死的中国人也不少见，重要的是有各种理论，消解你说真话的愿望和信念，一种可怕的精神慑服，使你自我瓦解。

人们往往从品节上评论中外人士的差别，比如说布鲁诺受到宗教裁判，宁死不屈，当他遭受

火刑时，仍然高呼：“你们烧死我，地球仍然在旋转！”在中国很难找到一个像布鲁诺那样，为追求知识而献身的勇士，但却可以找到很多为道义、民族而英勇就义的英雄豪杰，所以个人的品节不单是性格，更是一种信仰。

一般来说，宗教和科学容易开发出个体的超越性，因为上帝是凌驾人类之上的力量，不受人间约束；科学是探索未知的世界，它可能受到人类的干预，并不受人世的支配，自然规则远比社会规则更为深不可测，不是人类所能左右的，可人们为什么又去孜孜以求？靠的是信念。信念是比生死存亡更高的意识，具有此种情怀，才有不畏死的行为。传统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宗教和独立的科学精神。宗教是出世的，中国的佛教和道教都被儒家化了，他们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入世情结，为现实的人情世俗所左右。科学在古代中国主要表现在技术层次，靠的是经验积累，师徒传授，缺少独立自主的科学精神。在中国只有道义能超越生死，这道义是以伦理为本位，伦理又是以家、国、民族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家庭、国家和民族都是复数，是群体，个人只有附着家、国和民族，才是有价值的存在。个人附着群体，那群体就消解了个人的意识，以群体的价值为个人的价值。因此人与人的差异，除了背景、环境、生理不同外，大多是性格特征，在价值观念上不外乎儒、佛、道三家，佛、道很少进入主流的意识形态，儒家则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的最高境界，这种价值观主导中国数千年。持有这种人生信仰的，根本不可能出现为了说明地球绕太阳转而献身亡命的有志之士，这是古代中国不能产生布鲁诺的重要原因。关于这点我在《公私观念与人文启蒙》一文中就中国人缺少个体意识的传统，作了初步的分析。

在群体价值消解个体意识的土壤中，很容易滋长脱离实际和造假的作风，而且还以“义正词严”的姿态出现，包括撒谎者本人。有些不讲真话的人未必有品质问题，因为在政治运动中撒的谎，往往是受到党国利益的驱动，自己也可以原谅自己，诸如顾全大局；个人事小，国家事大；国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不要只看一个指头，要看到九个指头云云，只要持有这种理由，说了弥天大谎，也可以面不改色

心不跳，不必受到良心谴责，这种状态很难有个人的自悟，也没有诚信可言。所以中国不讲诚信是群体道德的缺失，是在“正义”掩盖下的非正义行为，这是制度的塑造，并不完全是个人责任。试想，当一个人的内心有这“道义”的驱使，周边有超强的压力诱导，其结果只能是彻里彻外的投降，而且还心甘情愿。

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有一部《欧阳海之歌》在中国发行三千万册，这是按真人真事写作的纪实小说，作者如实写出欧阳海出身贫困，哥哥被国民党拉了壮丁，本人当过乞丐的经历，可在审查后，传出江青的指示说，怎么能写他哥被拉壮丁？这不成了反动军人的家属！乞丐也不行，这是游民不是贫农！小说写他临终时对生命的依恋，也成了修正主义。接受这批示就不得不篡改历史，而且有理有据，振振有词。办雷锋展览也是如此，雷锋那件皮夹克，上了撤，撤了上，反反复复，不以事实为根据，一切按宣传需要而转移，为了表现他艰苦朴素，非撤不可。小事尚且如此，大事大谎者不知有多少。从上到下提倡这种风气？弄虚作假怎能不弥漫全社会。

说真话的是什么后果，有时是祸患无穷啊！我有个品学兼优的同班同学，安徽人，大跃进中回家探亲，发现他一家活活饿死了5个人，只剩下2个嗷嗷待哺的小孩，但他是纪律性很强的复员军人，回校后并未声张，只向组织作了汇报，并私下向同学要了一些粮票，就这些横遭批判，变成内控对象，毕业后发配到边远地区。六十年代中国近代史所有个出名的才子沈元，他在北大读书期间因为翻译了赫鲁晓夫报告被打成右派开除，摘帽后因为一篇出色的论文被调到研究所，在那个年代他是唯一在《人民日报》整版发表学术论文的青年学者，名气很大。文革期间遭了殃，被近代史所扫地出门，到街道又被赶走，投奔亲戚，没人敢收留，他无家可归，吃住无着，为了活命投奔苏联大使馆，被抓回，定成叛国罪，发回本所讨论，全所同仁一致通过给他以极刑，包括当初赏识他的黎澍。后来我到所后，私下打听，发现有许多同情者，但当时没有一个人敢为他说话，可见许多人是违避良心的。这怪他们吗？不！文革中我在信阳农村干校劳动，才知道三年困难时期这里饿死上百万人，有的全家死绝，到了易子

而食的地步，令人惊诧的是，事态发展到这一步居然没有发生动乱。事实并不如毛主席所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在极端的高压中，是无人反抗的，信阳也有不怕死的，至多也是准备到北京告状，但走不出县界，就作为反革命被处治。后来因为李先念回家乡蔡县探亲，发现邻县信阳的灾情，才被纠正。据官方统计在这时期全国饿死的有二千万人，民间统计有三千万，比八年抗战死的人还要多。

暴政猛如虎时百姓是噤若寒蝉的，这是中国的民族性，我起先认为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有关，并就这个问题请教过李先生，他的一句话真可谓言简意赅，他认为，是制度造就民族性，这是很有道理的。

在这种情况下，说真话怎能不成为道德的最高品节哩！这是中国的国情，不会为外国人理解，也不会为现代年青人理解。有一次朋友聚会，有一位年青作家当着许多学者的面指责说：“你们这一代人太没有骨气了，难道就不会辞职？”这句话问得我们是哭笑不得。

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可怕的是人的异化，其中最可怕的是自我异化。在1959年的交心运动中，人人都把最切忌的隐私全都晾出来交给党，比天主教徒向神父忏悔还彻底，因为宗教并不要求你说自己没有的东西，可交心运动，要把自己说得最坏、最丑，还要公示于众，才是对党的最忠心。因此你说你自己坏，我说的比你还要坏；坏得还不够，那就再添油加醋，要知道这不是对别人，是对自己，是自己给自己贴小字报、大字报，就这样在年青的大学生中展开了一场践踏自己的竞赛，弄得人人面目全非，最后连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我有一个同事甚至编造出在朦胧中想谋害毛主席的一闪念，把自己妖魔成罪大恶极的反革命来显示忠诚，发疯一样地扭曲自己，真是不可思议，后来我成为他专案组的成员，才弄清真相。自己坑害自己，人成为非人，后人又怎能理解这鞭入骨髓的精神戕害啊！

中国人为什么这样疯狂地践踏自己和同类，这也许是后人永远不理解的谜团。不进入这特定的历史境遇，感同身受这一代人的苦难和精神残缺，又怎能找到答案？

圣人不是天生的，李先生也是。他本名李忠，

参加革命时化名李慎之，名为心声，由此可见，他是以谨慎言行的自勉投奔共产党的，并没有天生的反骨。他也软弱过，被打成右派后，一度想自杀，有时他对着镜子伸出舌头，恨不得一剪子把这惹祸的舌头剪掉。这样的苦痛、惶惑、动摇，是由于全身心地献身他信仰的事业，而又被他追求的信仰无情地抛弃。所谓的“错误”是他遵循党的教导说了一点真话的结果，那足以使人遭受灭顶之灾的右派帽子也是他崇拜的毛主席一手钦定的，这怎能不为一颗赤子之心所痛苦。

众所周知，他的再次被贬，是因为说的一句话：“我不在刺刀下做官！”这时正当国家用人之际，他也不是没有晋升的可能，只要稍示悔意，完全可以再上青云，可他抛下这句话后就义无反顾，直至被封杀，依然为忧国忧民殚精竭虑，披肝沥胆。

他从五十年代的彷徨到九十年代的坚定不移，经过了信仰的动摇、幻灭和重新组合，以半个世纪的风霜刀剑，写就了这篇《风雨苍黄五十年》的传世之作，充分表明，他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有一件事，你也许不知道，他曾经是那样坚决表示“不在刺刀下做官”，这是非常难得可贵的，为此被罢了官。时过十年以后，有一次他对朋友表示，他对当局的断然措施也是有同情的，否则国家可能会大乱，改革也可能会毁掉。这似乎不像他说的话，他也从未在这问题上做过检讨，但这确是他的心里话，在高压的情况下不屈服的，为什么在疾风骤雨之后却作了这样的反思？其实李先生并不为过，彭德怀是个硬汉子，可他向毛泽东做检查是诚心的；顾准是自由主义的先行者，但他多次表白自己拥戴社会主义，以至有真假顾准之说；张志新难得可贵，她是以毛泽东思想批判文化大革命；不少老干部在文革中被整的死去活来，还口口声声拥护这是冲击灵魂的大革命，这就是中国特色的共产党员！党的兴亡盛衰已与他们的生命融为一体，不管当初有多么强烈的反叛精神，最终仍然以党的利益为重，党的利益一旦被高度抽象化，那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解释，最终也使党的利益异化，这种价值的悖论，经常报以党性强，识大体、顾大局的表彰，消解有可能发生的疑问，最终连怀疑也无从产生。

政治道义的言词不管说得多么美妙，如果没

有个体只有群体，那就有可能通向专制主义，所以忠于党的都有可能在不同程度，不同时段上接受专制主义。自我往往就在这泛化的道义中萎缩而至泯灭，这是共产党员的悲哀，也是民族的悲哀，因为从传统的公私观念到党的以大局为重，都是以公灭私，在这方面是一线相通。从这里可以理解不屈服于压力，不是共产党员的梁漱溟，晚年出的书却表示衷心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党，这是以群体为本位的中国社会，必然导致的结果。民主制度是以个人为本位，但有群己界限，有公民教育和公德，并以法律为保障，首先保护每个人不受侵犯，也不侵犯别人，这就保护了社会的整体性。整体利益是以个体利益为基础，立私为公也为私，奉公不克私，得到公私两利。晚年李先生说他要为个人主义翻案，这是他对这问题的新体察，有人指责李先生说过，三十年后还要加入共产党，反对你那个“共产党”。其实这才是李慎之的本色，真正的党内改革派。所以从这意义上说，李先生并不能说是自由主义的思想家，但可说是自由主义的首席发言人，是他首先在改革大潮中举起自由主义。在当代中国，自由主义尚无立足之地，所以自由主义者就以李先生为领军人物，这是时代造就的错位。

有的朋友对我的《思想者不老》颇有微词，认为刘大年学术思想是左的，也整过人，有什么值得称赞的。其实我主要是想写出老一代学者的治学精神，虽到垂暮之年仍然笔耕不辍，这种精神在当前尤为可贵。要知道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的时代，你整我，我整他，他又整你，整得人们团团转，又有哪个人前不整人，哪个人后不被人整？文革期间流传一首顺口溜说：“表不完的态，站不完的队，写不完的检查，流不完的泪。”真实地再现了一代知识分子的痛苦和无奈。然而，不管铺天盖地的运动是多么雨骤风狂，不管时代和境遇给知识分子留下多少创伤，他们都在学业上孜孜以求，在一个求知世界里忘情地跋涉，这就值得为后世留下他们的剪影。至于学术观点的分歧和差异，这不该是评价的标准。即使有人整过人，只要不是品质问题，都应该给予宽容和谅解。其实，若用现在的眼光看那个时代，会发现人人都标榜自己是左派，不论是大左、小左，在主观上大多数也是真诚的，这是传统观念和党

长期熏陶的结果，凡人常态又哪能超然物外。

在那种大张旗鼓地整人运动中，过后也有人留下内心的不安，但这也是在环境变化后的心情。改革开放后第一任中国检察院检察长关山复，文革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哲学社会科学部的第一把手，在干校中他对我们说过，土改时他是东北一方土改的负责人，杀了许多地主，现在想想，有的也不该杀，那时的情况就这样，抓到地主，召开群众大会，在会上一呼，该不该杀？大家喊杀，立即镇压，不用经过法律程序，就像李自成起义一样。从他的言谈神色中我感受到他的隐隐内疚，类似这种心情的也不在少数。

李慎之先生也说过一件事，他对郭沫若在文革中的表现不满，认为有些事不可原谅。可他听说，文革中郭老的儿子被抓，郭夫人要求郭老向周总理说情，郭老没有听从，可天天抄录他儿子的日记，直到他儿子被迫害致死，也没有说一句求情的话。李先生为此深有感触地说，他要用多大的毅力抄录儿子的日记来排解内心的苦闷，作为一个父亲，这是刻骨铭心的伤痛，由此他理解并原谅了郭沫若。对于郭老这种行为，你尽可以指责他愚昧、盲从、虚伪，可知道在他心目中有一个比他儿子更重要的党国利益压在他的身上，这并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也不是胆小怕事所能解释的。1999年姬鹏飞的儿子出卖国家利益，受贿二千多万，事发被判死刑，姬出面要求以自己的功劳减少儿子的罪责，被拒绝后自杀，这种行为又哪能与郭老相比，所以李先生原谅了郭老。

走近那个时代，设身处地为其人其事想一想，还能选择什么路，也许可以心平气和地理解他们。其实刘大年的内心也不平静，我听他女儿说，晚年的他经常陷在矛盾和烦恼中，我想这可能是他追求的信仰与现实的冲突而带来的痛苦。只不过中国没有忏悔的传统，制度也不允许他这样一名老干部擅自表态，一个人为了所谓顾全大局，宁可牺牲自己的儿子，像这样的老革命、大才子都这样，一般人又能怎样！只有理解他们竭尽真诚的心，才能感受这刻骨的痛苦和无奈。

我们有幸生在梦魇已逝的年代，但我们能理解这一代人旷古未有的悲哀吗？

善待这些无告而忠诚的一代人，这是我由衷的想法。（责任编辑 萧 徐）

走在艰难平反路上的一年

何方

(一) 要求平反我的案情

1978年，我是在艰难平反路上走过来的。平反什么呢？这就得稍微谈一下有关情况。

1959年庐山会议后，全国掀起声势和规模都超过1957年反右派的反右倾运动。由于我跟被毛主席在庐山封为“军事俱乐部”副帅的张闻天工作过十多年，所以经过批斗被定为外交部张闻天反党宗派主要成员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撤职、降级和留党察看处分，随即长期下放。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才从农村回到外交部，就被部党委作为重点抛出，交“群众专政”，接受批斗和从事打扫厕所等劳动。半年后，毛主席发动了批判“资反路线”（“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为了免得外面学生们冲击，周恩来总理、陈毅部长和部党委也支持外交部群众起来“造反”。于是由青年干部带头，很快就成立了一个二千多人的“造反联络站”，由毛主席、周总理授权他们“领导运动、监督业务”。本来只允许他们“火烧（限于批判）陈（毅）姬（鹏飞）乔（冠华）”，可他们在1967年“二月逆流”后竟自行提出“打倒陈姬乔”的口号。这些本来都与我这个专政对象无关，但我还是被运动卷了进去。联络站一要我“对”打倒陈姬乔“表态；二要我写揭发陈姬乔的材料，因为我当过党组秘书。经过两三个月，知道和领会到毛主席、周总理都反对“打倒陈姬乔”的口号后，立即改变态度，也再没写过揭发材料。等到1967年8月，在王力发表对外交部运动的谈话而被打倒，周总理宣布他对联络站的支持只到八月底，联络站也就随之垮台。部党委又收回了运动的领导权，并结合反对“打倒陈姬乔”的无革派、无产阶级革命派，以别于执掌运动领导权一年左右的造反派）群众组织，开始清算和镇压造反派以及与

之相关的人。这一来，对我的专政也更加重了。经过一年多的批斗，又押送干校，劳动改造九年，并在此期间被开除党籍和行政再降级。直到1978年春，我才自行离开干校回到北京，要求对我的问题重新审查，特别是恢复党籍。

外交部不谈平反

文化大革命中制造了那么多冤假错案（加上以前的就更多了），文革结束和揪出四人帮以后，对冤假错案进行平反应该是天经地义，全国从中央到地方也都是这样叫和这样做的。但外交部却显得特殊，把涉及到上千人的这一庞大的甄别平反工作给取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名称，叫做复查。为什么呢？因为直到1978年6月20日外交部在给中组部的报告中还肯定，“外交部没有发现冤、错案，不存在昭雪平反问题。”因为他们认为，文革中外交部所做的一切，都有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有周总理直接领导，哪能错呢？既然没错，还谈什么平反？这一基本认识还成了外交部一个长期传统。这就是外交部的甄别平反工作始终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拖的时间特别长的原因；也是对文革结束前的外交部干部一直要分站队正确还是错误，在干部使用上存在派性的原因。

正是由于这一特殊情况，使我多参加了两三年文革，住了九年五七干校，走了一段艰难的平反路，并长期受到负面影响。新任外交部政治部副主任的朱霖同志，在她的回忆录中就说，外交部领导在文革后对干部问题上的拨乱反正极不重视，1978年政治部成立了一个复查办公室，只有一间房子和两名刚调来的干部。后来由于形势所迫，复查办公室才加强了力量，工作人员增加到二百多人。

等待复查

1978年初我拒绝外交部领导的动员再回干校,就是为了争取平反,解决恢复党籍和分配工作问题。部领导虽然不得不准备对我进行复查,但是同我的想法却相差甚远。他们的作法,基本上还是传统的暗箱作业,没有什么变化。具体说来,就是复查工作不和本人见面,由他们安排几个人查阅档案,并按领导规定的框子写出复查结论。一般的都要比原结论减轻,例如原来是“五一六”分子,现在给你摘掉帽子,算成犯了严重错误;原来定为敌我矛盾,现在改为人民内部矛盾;原来开除了党籍,现在恢复党籍,只给予留党察看处分,等等。但绝不承认原来处理错了,而是说成党的宽大。照例要写上根据党一贯执行的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的精神和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教导,以及鉴于本人已有悔改表现,决定从宽处理。还有一种情况是,有的人不同意结论措辞甚至处分,专案组也可在不大变动领导意图的条件下,作一定的松动、缓和甚至改变。多年来这已变成一种办案八股,而且在多数场合还是有效的。它使受处分的人感到宽大,以至于产生感激之情,顶多也只是在签字时作点更正事实或表示心迹的说明,附在结论后面,这样就算结案了。作这类复查工作应该说并不困难,一般干部都可以胜任。

但是经过文化大革命,我个人的思想和态度却有了很大变化,就是一定要摆事实、讲道理,弄清是非,不再吃那老一套了。我曾跟人开玩笑说,经过文化大革命,我的一个重要收获就是多少学会了运用“斗争哲学”,不合理就斗,决不再逆来顺受,不想再受一些人的摆弄和欺侮。一句话,豁出去了。这也是形势逼出来的。

应该说,参加革命以后,我就心甘情愿做党的驯服工具,服从命令听指挥,对分配的工作一直是积极、认真、拼命干,在物质待遇和职务安排上从不向组织伸手,但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无端挨整。延安整风中硬被打成特务,最后上面不认错,反而说是由于本人思想意识有毛病。1959年受张闻天牵连,被毫无根据地定为反党宗派成员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对这一定性和处分,陈毅部长还让韩念龙部长助理找我和徐达深谈话,把这说成是党的宽大,否则无论按哪一条(不知指的是什么)都可开除党籍。好容易从下放农村和

饥饿线上挣扎过来,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又被领导上当作重点对象交付群众专政。怎么这革命老是往自己头上革?但我仍然抱定了逆来顺受的态度,接受一些人的欺侮和凌辱。不想1972年以姬鹏飞为首的部党组竟下令开除我的党籍。即使这样,我也没有灰心绝望,还是适应党内老一套作法,在表示不同意处分决定的同时,承认错误和提出留在党内的要求。此后又不断苦苦哀告,提出申诉,要求保留党籍,或将我的问题提交中央重新审理。这些书信和申诉,有写给部核心小组的,有写给党组转中央的,但是全都石沉大海。既然老一套作法根本没用,我就不能不采取新的做法,这就是,进行面对面的说理斗争。为此,1978年春就坚决留在北京,没再按部领导要求重回干校。不过呆在北京也没用,领导上还是坚持老一套暗箱作业的作法,由专案组(对外称复查办公室)背着本人在那里查档案改结论。

临时工作

等了好几个月也没动静,我只好三天两头地打电话给政治部主任也是我当年在办公厅的老同事林中,要求他自己或派人找我谈话。林中和政治部后来倒是没有再动员我回干校,但又一直借口工作忙。我虽然一家四口人在招待所十三平方米的小屋可以独成一统,但不解决党籍问题又没有工作,总觉得烦闷。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我就向政治部提出了“哀的美敦书”。我说,“如果你们总是借口忙,拖延不决,那就表示外交部不打算解决我的问题了。那我以后就不再找外交部,而去直接找中组部。”林中听后说,等他们商量一下,然后约我谈。下午就来电话,请我到政治部去一谈。我的“斗争哲学”算是初步见效了。去后,林中态度倒是挺友好,先寒暄了一阵。我请他有话直说。他表示,我的问题正在复查,总得要点时间。现在《世界知识》正在筹备复刊,还在招兵买马。我在这方面是轻车熟路,是否先到他们那里帮助工作,等复查完了再谈今后的安排。我听后一想,终究胳膊扭不过大腿,党内形成的这一套解决干部问题的暗箱作业,我只能遵守,无力改变,因此先去《世界知识》打工也行,一则总算有了工作,二则可以恢复一下业务。

所以当场就答应了。

(二) 复查的交锋——第一次交锋

在《世界知识》打工不到半年，专案组以中共外交部政治部的名义，于1978年7月24日给我写出了复查结论。外交部党组于同年8月25日批准。10月20日政治部负责复查工作的三位主要领导同志（两位政治部副主任和一位干部司副司长）约谈，拿出决议稿让我看，如果同意，就签字，有意见也可以提出来附在后面。态度还算温和。

我一看结论是新账老账一起算，总的精神还是以前的老框子。题目虽是《关于何方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错误的复查决定》，但内容却从延安抢救算起，说“何在1943年延安整风审干时，曾因受过组织审查而对党不满”，1959年“因犯严重错误而受到处分”，1962年甄别时又“乘机翻案”，由于“翻案企图未能得逞，因而耿耿于怀，对组织更加不满”，在文化大革命中又跳出来，“采取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手段”，“支持‘外联’头头打倒陈毅、姬鹏飞等同志，妄图混水摸鱼，借机翻案，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因此1972年给予开除党籍等处分。经复查，何“所犯错误属实，情节严重”，但考虑到“他受处分后，对所犯错误有一定的认识，本人又多次要求给予留在党内改正错误的机会。根据党的‘十一大’精神和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原则，决定对何方同志的错误从轻处理，将开除党籍的处分改为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留党察看的时间，自本复查结论之日算起；将行政处分改为由11级降为13级（已扣发的工资不再补发）”。

我也是有备而来，看完结论后表示完全不能接受。我说，先不谈旧账，就说给我定的文革中的错误吧，主要是支持联络站（外联）所提打倒陈姬乔的口号，和应联络站要求写了所谓揭发陈姬乔等同志的材料，时间在一两个月以内。我承认支持打倒陈姬乔的口号是错误的。但是第一，陈姬乔为什么可以完全错误地两次打倒我（一次是1959年，一次是文革一开始），而且后果极为严重，使我受了二十年的迫害，几乎送命，陈姬乔不

但没有受处分，而且可以不负责任，至今还被认为是正确的。我支持打倒陈姬乔，对他们毫发无损，不起半点作用，怎么就变成了严重罪行？我们不是经常说，在宪法面前，公民人人平等；在党章面前，党员人人平等。为什么外交部的党组织就“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第二，如果由于一时支持打倒陈姬乔的口号犯了错误，就受这么严重的处分，那么长期高喊打倒刘邓陶的口号，又当何论？这两个打倒究竟哪个更严重？我就亲自看到陈姬乔和包括你们在内的外交部各级领导不但喊打倒刘邓陶的口号，而且一直用它教育干部，进行工作，影响恐怕要比只在内部表态支持打倒陈姬乔严重千万倍。对这些人又应给什么处分？第三，外联得到毛主席、周总理和部党委的支持，并授权它领导运动。我同它的关系是一个专政对象和正式组织的关系。它要我开会和写材料，我只能服从。为什么周总理和部党委支持联络站就是应当的，不算错误，一到我这里就算犯了天条？第四，想不到外交部党组织怎么这样落后和保守。现在已经到了1978年10月，去年12月胡耀邦出任中组部长，开展了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中央也在酝酿为刘少奇（邓小平早已出来工作）、彭德怀平反，你们还坚持打倒刘邓陶和1959年反右倾的立场，难道就不怕犯错误？

她们三位听了倒没生气，只是提出要我把意见写出来由他们转交党组。我说，我知道这是你们结案的一种办法，把本人意见附在后面，决定就算生效了，因此我不会写一个字。只是请求你们把我的意见报告党组，如果党组坚持原有决定，那我就要求将我的问题提交中组部审理。

由于她们也不打算说服我，对我的问题又不十分清楚，所以双方没有辩论就结束了第一次谈话。

后来听张闻天夫人刘英说，也是她们三人于同一时间（1978年10月27日）去找她，要她对1959年的复查结论签字。刘一看结论上还留了一条“态度不好”的尾巴，就当即打了回去，表示根本不同意。接着，刘将这件事报告了时任中组部长的胡耀邦。胡表态说，“态度不好就是立场稳，做得对嘛！”过不久，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刘英当选中纪委委员。第二天又是这三位，登门拜访，转告刘英，党组决定她的问题完全平反，一

风吹了。

——“讨价还价”

在既要坚持原有观点,又不能不适应形势变化的条件下,外交部党组织对我采取了讨价还价、逐步后退的办法。1978年10月28日和11月6日,又由政治部三位领导同志两次找我谈话。详细经过和具体内容现在记不清楚了,但印象是结论修改得一次比一次宽,而且态度始终是友好的,用的是商量的口气。例如对错误的严重性就在不断降低,太勉强的提法也可去掉。例如第一次复查结论中说我严重泄密行为,在给外联写的材料中,从我“非法保存”的十七本工作笔记中摘抄了大量“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并为外联所扩散。我的答辩是,第一,我没有那么多笔记本,即使保存的那些笔记本也根据有关规定和过去教训,除必须记的工作安排和向下传达的事项外,不再记其他内部资料。加之我受处分后的工作处境,根本接触不到党和国家核心机密,因此谈不上什么严重泄密。说是“非法保存”,更是不讲道理的诬陷。第二,外联是中央和周总理承认和支持的领导运动的合法组织,我奉命写不涉及机密的内部材料,即周总理和部党委提倡的所谓小字报,因此谈不上泄密。何况中央和总理授权他们监督业务,插手当时的高度外交机密。与之相比,我写的材料对他们根本无秘密可言。这条罪状,在后来第二还是第三次复查决定的修改稿中,好像就给去掉了。

随着错误性质的下调,处分也一再减轻。第二次是把留党察看的时间换成了过去式,行政降级也有减少。第三次的稿子又把留党察看改成了严重警告,行政上不降级了。对这两次修改,我都作了说明和反驳,也决不接受他们的决定。三位女同志还是使用以前的策略,提出让我写出书面意见。当然又遭到我的婉言拒绝。我还最后提出,部党组批准对我的复查决定和这两次修改,说明外交部党组织在掌握党的原则和处理干部问题上也太不郑重、太不严肃了。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三变对一个干部的处分,难道党组真的竟为我的问题开了三次会?这当然是不会有人相信的。

第四次谈话是1979年1月26日。决定草案

提出,本人虽在文革中犯有严重错误,但基于党的宽大政策,决定取消1972年开除党籍和行政连降三级的处分。这就是说还要保留1959年因受张闻天牵连给我的处分。对这个草案我自然不能接受。因为第一,如果说我在文革中支持打倒陈姬乔,就算犯有严重错误的话,那全国应作为错误处理的当以千万计。想想看,从打倒彭罗陆杨起,全国有多少人参加了这些“打倒”行为。单是我参加的一些大会上直接听到中央和领导同志带头喊要打倒的就有:彭罗陆杨、刘邓陶、贺龙、谭震林、杨余傅等十多个。这些都是打倒错了的,算不算犯了严重错误?相比之下,我那点“打倒”实在算不了什么。第二,我不但不能接受给我安的文革中的错误性质和处分,而且还强烈要求对1959年给我的批判和处分迅速进行平反。我说,现在中央对那次庐山会议和反右倾运动的态度已经非常明确,希望外交部党组织不要老是落在形势后面,处于被动。

——《审改决定》

又过了一个多月,1979年3月1日,三位女同志又找我谈话。表示根据新的精神,文革中的问题就不算了,有关档案材料一律销毁。关于1959年的处分也决定取消,并且重新做一个审改决定,如果同意,就请签字,我的问题就算从此结束了。我拿过文件一看,题为《关于何方同志问题的审改决定》。除前面简历和以前的处理情况外,结论写道:

“经复查,我们认为,何方同志在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积极参与了张闻天在外交部的反党宗派活动’,并给予党纪和行政处分是不对的,应予纠正平反。1962年8月,虽对何方同志进行了甄别,但仍给予何方同志以党内严重警告和行政上降职的处分,也是不当的。现决定撤销中共外交部委员会1962年8月《关于何方同志的甄别结论》,取消给予何方同志党内严重警告和行政上降职的处分。

“有关何方同志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的材料(包括1962年的甄别结论),一律从其个人档案中撤出。

中国共产党外交部党组

1979年2月28日”

我看后，觉得对1959年的问题能写出这样由党组织承担责任的复查结论就相当不错了，能做到这点，当然不是外交部党组织认识的进步，而是由于不得不适应全国平反冤假错案的形势。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不再提，也是根据中央精神，特别是胡耀邦的指示和干预。虽然我对外交部的处理并不完全放心，但也认为自己的问题只能这样结束了。因此于3月20日签字“同意”后，交还了政治部。

我的不完全放心有两点。一是，外交部是否会根据中央统一规定全部销毁文革中有关我的材料，会不会留几件作为以后必要时用的把柄？例如中央规定应归还文革中查抄的本人的物品和资料，外交部政治部竟以“找不到了”为由，至今没有交回我一件。而这些东西是按组织系统收缴的，并不是红卫兵随便抄走的，怎么会丢个精光？二是外交部对我的那种处理显然是迫于形势，而不是出于思想认识的转变。否则，在那两三个月的时间里怎么可能会发生那样大踏步后退的变化？外交部由于坚持文革中是否站错队的派性观点，所以即使给你取消了处分，也还会控制使用，或像在湖南那样，事后给用人单位打招呼说此人有问题。我就看到不少有为的青年干部，只因参加了几个月造反派的活动，一直被控制使用到退休，不得提职，不得出国等等。其中许多人（包括被错误地当作外交部头号“五一六”分子批斗、关押的姚登山）就是一开始在外交部政治部那种表示“宽大”的结论上签了字，或者附上了保留意见和说明的。而这个结论也就放在本人档案袋中长期保存和跟着本人走一辈子。

根据我对外交部的估计和看法，事后不但在我，而且在许多人的身上，都证明了这种估计和看法并没有错，在问题得到平反后，我就已下决心离开外交部了。

（三）几点思考——历经三次甄别

在我参加革命后的短短40年中（1938-1978），已亲身经历过三次甄别。而且每次都是在“大运动”中挨整，又在“大运动”中甄别的。至

于甄别结果，有的得到平反，有的只是减轻处理。第一次是在延安整风抢救运动中被打成特务。当时延安的脱产干部约三万人，被打成特务的占一半。经过两年多的甄别，据说一个特务也没查出，包括许多带有特务嫌疑尾巴挂起来的，以至被当做特务枪毙了的如王实味等，最后也都查明并不是特务。那次给我作的甄别结论，不是说党组织搞错了，而是说由于本人思想意识有些毛病，所以受到审查，结果没有发现有政治问题。对这一推卸责任和极不实事求是的结论，我拒绝了签字。

第二次是在1959年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运动中，我被打成反党宗派主要成员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并受到党内和行政上的严肃处理。这次运动的打击面也极宽。据1962年中组部的统计，全国的批判重点和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的党员干部为365万人，而当时全国的党员也还只有2600万人。三年困难使得大跃进的牛皮破了产，全国饿死三四千万人，得浮肿病成为普遍现象。后来不得不对反右倾运动中被整的人进行甄别。但是从中央到各级领导，也都是不愿公开认错和作点自我批评的。所以这次甄别，地方上县级以上是被趁势基本上一风吹了，但到了省市特别是中央机关，进行起来就难得多，能拖就拖，能不平反就不平反。对我的甄别，由于外交部党组织的一拖再拖，直到1962年8月才作结论。而这时正是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大讲阶级斗争和大反“翻案风”的时候。在这种气氛下，外交部对我的处理既没有作实质性的改变，反而将我实事求是的申诉算成了翻案。于是文革一开始，又把我打成牛鬼蛇神交群众批斗。

文革后的平反也很不顺利。在经过十二年的专政和监管后，对我的复查还进行了几个月的讨价还价。我了解的外交部情况大都是这个样子。由于是领导和积极分子进行批判和处理错的，他们又不愿承担责任，所以都不愿给整错者完全平反，总要设法留个尾巴。如果处理公正，没有派性，胡耀邦也不会干预，外交部也不会改换专案组的人。所以我经历的这第三次甄别，虽然走了一段“艰难平反路”，但总算从“复查”走到了平反。如果没有当时的大气候，那对我的处理很可能是三位女同志第一次拿出的那个“复查结论”。

甚至连“复查”也都不会“多此一举”了。

经过三次挨整和三次甄别，特别是这最后一次“复查”，使我考虑了很多问题，涉及到党的性质和章程。我在党内生活只差一年就整七十年了，经过和看到的政治运动实在不少。每次运动都有大批人挨整，现在看来绝大部分都是整错了的。完全整错的就有延安的抢救运动、建国后的抓胡风分子、反右派、反右倾和文革中的抓“五一六”（抓了两三千万）。其他如解放初期的镇反、紧接着的三反五反，1955年后的肃反和文革前的“四清”，恐怕大部分人也是被整错了的，经不起全面的甄别和复查。但是非还是应该分清，而且是能够分清的。例如文革初期那半年左右的所谓资反路线，就是由中央和省部级党组织公开点名批判和逮捕了一大批干部群众，包括高级干部和知名人士如周扬、李达、田汉等，外交部也有孟用潜、王炳南、陈家康），派出工作组镇压迫害机关学校的大小知识分子。后来执行这一“路线”的中央和各级领导大部分被打倒了，还受到各种迫害。于是在作有关文革的决议时，这段历史就不算了。难道这称得上实事求是吗？从道理上讲，应该是各有各的账，不能用“宜粗不宜细”的办法把是非搅混，连文革初期那半年被整的成千上万的人，也笼而统之地归罪于林彪、四人帮。这说得通吗？

对于我们党这种先整一大堆人，然后搞甄别平反（还不算有好多没有得到平反），而且整人容易平反难，我在以前就有些想法，经过文革后的这次“复查”，更感到问题严重，所以也想在这里简单谈一下对其他几个相关问题的看法。

——整错了人要不要负责

过去的作法是，整错了人不但不会受到批评处分，而且还会受到表扬和重用，这就是保护政治运动中的积极分子的政策。要搞政治运动，没有积极分子不行，正像在农村搞土改需要勇敢分子一样。每次运动，在发出号召和进行动员后，一个首要工作就是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由他们首先响应号召，冲锋陷阵，才能把群众“发动”起来。其中有些确实是出于认识问题，但也有不少是基于个人利害得失的考虑，故意表现“左”和挟嫌报

复的。在运动中，组织上不但要相信和依靠积极分子，而且往往事后还要加以表扬和重用。于是一些积极分子也就越来越“积极”，出现逼供诱供和各种严重违法行为，直到草菅人命。到甄别阶段，党仍要坚持保护积极分子的政策。而被整错的人，除一小部分检讨“好”和表现“好”的外，一般都会留点尾巴，影响到此后的使用。因为你挨过整，总要怀疑你会对党有怨气。过去领导上对保护积极分子政策的解释是，如果批评和处分他们，下次运动谁还敢当积极分子？这一保护积极分子政策长期执行的结果是：第一，使历次政治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在党内的比重越来越大，地位越来越重要，成为各级的领导骨干；第二，使政治运动中总是犯极左错误，逼供信得到不断重复和发展，制造出大量冤假错案；第三，造成弄虚作假特别是说假话的风气。

因此，不但不应该无条件地保护积极分子，而且在批判和处理人的问题上应该实行一定的透明度和“问责制”。也就是对人的处理不能总是暗箱作业；凡是政治批判，事后证明错了的，批人者也应该检讨和认错。不能一些人老是批评者，而且一贯正确，批错了也不负责；另一些人老是挨批，即使被批错也得不到个说法。外交部1959年批斗张闻天的领导人和积极分子，至今没有一个人出来认错，而且还要表示一贯正确。所以张闻天的平反在外交部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好像平反和不平反一个样。这是很不合理的。过去由于整错了人不负责，所以不但整人不慎重，而且还夹杂派性和私心。因此，为了防止乱整人整错人，不光是要平反冤假错案，而且必须查清责任，找出冤假错案的制造者和积极追随者，该批评的批评，该处分的处分，该绳之以法的也不应例外。对高级领导人也应说清原委，不能由于为尊者讳连名字都不能提。只有这样，才能杜绝专门整人的运动，防止乱整人和乘机报复的现象。

——党内讲不讲平等

我们常说的“党章面前党员人人平等”，不但没做到，大概也没想做到。大的方面不去谈它，就说甄别平反吧。在我们党内实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时，好像有个分工，一些人是专门批评别人的，一

些人是一直受批评的，一搞起政治运动就被抛了出来。每次运动完了，照例是整错一大批，于是就要由整人者给被整者进行甄别平反。想想看，这能公平吗？

再就是处理问题有不同标准，不但分上下，而且分亲疏。例如我们上面说的，陈、姬、乔主持打倒我两次，事后证明他们打倒错了，可是他们连责任都不负，更谈不上受批评和处分了。我只是跟着摇旗呐喊，丝毫作用不起地打倒了一次陈姬乔，就算犯了必须开除党籍和行政降级的处分。又比如，最近看到胡乔木在文革末期揭发批判邓小平的全文，真可谓淋漓尽致，但没有听说有什么处分。我对陈姬乔受命写了一些所谓揭发材料，就罪不可赦。这也说明在党章面前只有尊卑之分，没有平等可言。再如文革后过了好久由党中央发动，有的领导同志再三强调不要手软，搞了五六年的“清查三种人”运动，所谓三种人是指“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对于文革初期在北京搞打砸抢很著名却因为有许多高干子弟参加的“联动”和“西纠”成员，就网开一面，还说指望这些人接班呢，因为他们起码不会挖祖坟。而受到清查的，主要却是文革初期响应号召起来反对所谓“资反路线”和冲击各级领导的造反派。主持清查的正是这些受过冲击的领导人和支持他们的积极分子。在外交部就是这样：违法乱纪、逼死好多人命的一些领导人和无革派，被说成一贯正确；既没有打砸抢，也没人命案子，但提出打倒陈姬乔口号的造反派，却永世不得翻身。

还有个话语权问题，也就是发言权和辩护权。这在党内，特别是在政治运动中更被弄到了蛮不讲理的程度。本来在平时，已经往往是领导人讲话，下级听话；领导人批评，下级检讨。驳领导人的话，一般是没有好下场的。根据我的体会，这种不民主、不平等的体制，大约从延安整风后就逐渐加强，经过后来的各种政治运动，更进一步完全巩固下来了，在运动中，不但挨整对象被剥夺了申辩权，稍作解释，还会被指责为态度不好。而且其他一些人也只能墙倒众人推，不准为挨整者作点辩解或说句公道话，不然轻则自己也变成批判对象，重则被打成挨整者的同伙，什么分子或某反党集团成员。这样就必然在党内建立

起严格的等级制、宗法制和专制主义。

——平反是否表示党的宽大

过去经常的说法和人们的理解都是：对你进行平反，这是党对你的宽大。一些长期受苦受难的挨整者，一旦得到平反，如同拨开云雾见青天，顿生感激之情，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认为，这是颠倒是非，带有浓厚的封建性。因为当年整错了你，那是党组织，具体讲，就是有关领导人和积极分子的错误。他们现在给你平反（往往还是出于不得已，为形势所迫），是改正自己的错误，是完全应该的，并不是出于宽大，更不是恩赐。由于他们的错误，使你受到委屈，应该是他们向你道歉和检讨（胡耀邦就是这样做的），而不是你感谢他们。过去那种把党说得很神秘，连个人的一切都是党给的，也属于封建传统，是颠倒了党员和党的关系。殊不知党是由党员组成的，没有党员哪来的党？党的一切都来之于党员的贡献（在党政不分和以党代政的情况下，非党员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也得作贡献）。至于贡献的大小，则取决于个人的能力、机遇和入党时间。一次社科院有位新领导，批评一个爱提意见、要求民主的老干部，说他吃着党的饭还对党不满，简直是忘本。这位老干部后来对人说，没有我们这些老家伙奋斗牺牲，他哪能当成什么领导？他吃的饭倒有我们大家的贡献在内。这也是对那种故意把党神秘化、便于以党压人的一种回答。

对整错了的人进行平反，不但不是宽大，实际上还缺少应有的补偿。这不仅是个工资和其他物质待遇问题，而且主要是精神和时间的损失。光是平反，这些能得到补偿吗？应该认识到，得不到相应补偿的平反，终究是不会公正的，是党组织对整错者欠的账。这里只谈点近年常听到的一件小事。据说中央领导为了照顾老干部制定了一项政策，规定文革后的司局级干部，凡文革前为正局级的都可享受医疗上的某种优待。这对文革后才得到平反的人就有点不公平了。难道得到平反的那几百万正局级以下的干部，都是水平低、能力差，不会有人在二十多年中得到提升？可见，制定这种以文革前的任职设槛的政策本身就带有歧视性。（责任编辑 萧 徐）

恳请不任内蒙古区党委书记

孙奇



1980年代，孙奇在地方考察工作

1987年，我在任中共辽宁省委常委副书记期间，曾有一件对我后半生有重大影响的事儿。

当时党中央决定调我去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这对我是重用，是提升，金榜提名。人生之大幸，上可光宗耀祖，下可荫及子孙。

我经过慎重考虑，自知文化知识水平有限，担此重任，唯恐有误内蒙古2000万人民，恳请中央不任命我内蒙古区党委书记职务。

往事转眼20年，现离休在家，翻阅当年工作日记，感慨颇多，故整理成文，以飨当年很多曾经关心过此事的同志和朋友。

1987年7月13日，星期一。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校，共同在锦州市召开地方党校职称改革会议，中组部副部长刘泽澎同志到锦参加会议。我时任中共辽宁省委常委副书记兼省委党校校长，前去锦州看望与会同志。

午后我陪刘泽澎同志到笔架山参观，休息时他告知我说：“中央干部小组已讨论决定，调你去内蒙古区党委任书记，接替张曙光同志。”我听后一怔，是不是我听错了？他接着说：“中央要找全树仁同志去北京先谈，即做他工作，辽宁省再调出一个干部，也让他先和你谈谈。”听到这个消息，令我十分惊喜。惊的是，我脑海里从没想到这么快又要提拔我，我1983年春从朝阳地委调至辽宁省人民政府做副省长，1985年10月又到中共辽宁省委任常务副书记，这才一年半多时间，又要提拔我到内蒙古区党委任书记？！喜的是，我从基层一步步成长至今，经过文化大革命九死一生，又经过朝阳地区八年艰苦工作与磨难，终于得到组织上了解和认知，这是我精神上的最大安慰和鼓励。

7月15日，星期三。我从锦州返回沈阳。当晚，全树仁同志找我说：“我刚从北京回来，紫阳、宋平同志找我去谈：中央干部小组已讨论，调你去内蒙古任区党委书记，征求辽宁省委意见并让我做你本人工作。”我问：“你怎么说的？”全树仁说：“我向中央两位领导谈了，不赞同再从辽宁调人了，这几年辽宁人事变动很大，再调也不利于辽宁工作；再者内蒙那里也较复杂，孙奇

去那里要搞好也有困难……”全又说：“宋平同志让我先和你谈谈，听听你本人意见，并给中组部回话。”我说：“你已经代表省委谈了，不同意调我走，我自己也不大愿意离开辽宁，那就最好不调我了。”

要调我去内蒙古自治区任党委书记的消息很快在省直机关传开，一些关心的同志在询问，有的同志支持鼓励去内蒙工作；也有知道一些内蒙情况的同志说，那里人际关系比较复杂，前几任书记不太愉快地离开那里，能不去就不去……这促使我认真思考去不去内蒙工作的事。那几天真有些心潮起伏、翻来覆去。回想自己从小孤儿，贫困家庭出身，靠哥哥抚养长大，靠共产党培养当了干部，从来未敢想当“大官”，现在已经是副省级干部，“官”已经不小了；自己小时只念了六年书，这些年虽在工作中努力学习，但已深感知识不足，再挑重担，唯恐难以胜任；自己升迁事小，内蒙古二千万人民事大。人应有自知之明，回忆我从政多年，在县、地都担任过要职，“文革”中险些人亡家破，任地委书记期间也遭诬陷。除客观原因外，就个人性格来说，自认刚毅，但柔韧不足，不善于处理官场里复杂的人际关系。再三思考结果，能不去内蒙任书记就不去了。但同时也查阅了一些与内蒙古有关的资料，了解一些那里的情况，一旦中央不改变原意，就要服从决定，愉快的去工作。

8月6日，星期四。刚上班，中办秘书局北戴河值班室王景中同志电话：“中央通知，孙奇明天到北戴河，宋平同志找谈话。”

8月7日，星期五。我乘12次快车到北戴河，中央机关事务管理局服务处杨德信同志接站，住在北戴河中央机关事务管理局招待所。原定8月8日宋平同志找谈话，后因他8日有其它事，改为9日再谈。8日上午中办服务处王德军同志陪同福建省胡平同志和我，一同去山海关游览，参观“老龙头”、“天下第一关”、“孟姜女庙”等名胜古迹。

8月9日，星期日。宋平同志找我谈话。他开门见山地说：“已找全树仁同志谈过，准备让你去内蒙古自治区任党委书记。中央领导已经议过几次，内蒙那里急需解决人选，张曙光同志急于退下来，认为你去比较合适。你在东北工作多年，与

内蒙相连，还了解一些民族工作，不会很难。蒙古族很憨厚，好合作，要多和他们接触，多谈心。你去后，先把班子建设好，团结好。现在相互间有些疙疙瘩瘩，存在一些矛盾，一是蒙汉干部间，因为是民族自治区，同样条件要优先选用蒙族干部，有些汉族干部有才能，但当不了正职，有些人不大安心；蒙族干部内部也有矛盾，主要是东部和西部之间，认为东部干部在上层领导里少……那里地域广阔，资源丰富，很有发展前途，你去把这副重担挑起来……”他又介绍了那里主要干部的情况，鼓励我把那里工作做好。宋平同志谈了大约一个多小时，后问我有什么想法？

我说，中央调我去内蒙任书记，对我个人是莫大的信任。我深感担子很重，责任重大，由于本人能力知识有限，恐难胜任，怕辜负党的重托。来北戴河之前，曾反复考虑过想法，向宋平同志如实的汇报了。我诚恳请求，请中央考虑，最好不让我去内蒙任书记。宋平同志又鼓励、动员我接受去内蒙的重任。我说，我讲的个人思想，是经过再三考虑、发自肺腑之言，当然中央决定不变，我会服从组织决定，去内蒙尽力工作。

8月10日，星期一。上午，中组部副部长孟令琨同志，又继续找我谈话，除动员我去内蒙古工作外，并较详细地介绍了内蒙区党委11名常委每个人的情况，并概括的介绍了自治区政府5位副主席、自治区人大7位正副主任、自治区政协9位正副主席的情况。我把向宋平同志讲的个人要求，也向他做了汇报。他说，宋平同志跟我说了，还是动员你去内蒙工作，你要做好去的准备。他说，准备把辽宁省委及你个人意见，再向中央报告一次，最后再定。

午后，我从北戴河乘火车返回沈阳。照常进行工作并进一步查阅一些有关内蒙古自治区的有关资料。

8月14日，星期五。夜晚，宋平同志亲自从北戴河把电话打到家里告诉我说：“我们把辽宁省委意见和你本人要求，又向中央人事小组做了汇报，中央经过研究就不再调你了，决定调湖北省委副书记王群同志去内蒙任党委书记。”我说：“谢谢宋部长。”

回忆往事，心境坦然，无怨无悔。

(责任编辑 萧 徐)

胡耀邦谈 “反对精神污染”

魏久明

“反对精神污染”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当时无论在党内或党外对“精神污染”具体内涵和如何“反对”、“清除”的做法都有不同的看法。听说时任党的总书记的胡耀邦在这个问题上受到“非议”。1983年，反对“精神污染”的那一年，我亲自听到胡耀邦同志就这个问题的一次讲话。他全面、清晰和针对性很强的论述，在我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多年来难以忘怀。最近我找到笔记，并和当时一道听讲话的同志核对了记录。现记述下来，以飨读者。

“精神污染”的概念

1983年10月11日至12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党的十二届二次全会。会上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邓小平同志在这次会议上作了题为《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的讲话。他着重讲了整党工作要防止走过场和思想战线、主要是理论战线和文艺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要加强思想战线领导的问题。他说：“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他指出：无论在理论界或文艺界，主流还是好的或比较好的，搞精神污染的人只是少数，问题是对这少数人的错误言行缺乏有力的批评和必要的制止措施。精神污染的危害很大，足以祸国殃民。十二届二中全会后，各地迅速地传达贯彻了会议精神。在层层动员开展整党工作的同时，“清除”精神污染“它在人民群众中间混淆是非界限，造成消极涣散、离心离德的情绪，腐蚀

人们的灵魂和意志，助长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思潮泛滥，助长一部分人当中怀疑以致否定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的思潮”。当时“清除精神污染”的声势很大，报刊上发表了 many 有关言论、评论、文章和“清除”的消息。人们的思想很紧张，过去多年来搞政治运动的影响使很多人心有余悸。

团中央于十月十九日发出了《关于认真贯彻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精神的通知》，团中央第一书记发表谈话，号召团员、青年积极抵制和清除精神污染。各地共青团的组织在正面向团员、青年进行“三热爱”教育的同时，也在青年中搞“清除精神污染”活动。本来，邓小平同志是“针对理论界、文艺界存在的相当严重的混乱，特别是存在精神污染的现象，强调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的，但是，一旦把“清除精神污染”搞到群众里面去，不少地方就针对青年日常思想、生活中一些“看不惯”的穿戴、或者“标新立异”的现象进行“清除”。比如当时流传：“反对打扮、穿花服；剪掉长发、喇叭裤；不准烫发、抹口红；活动不能搞跳舞。”把这些当成“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来加以反对。这些做法，引起很多青年和群众的不满。

胡耀邦的两次谈话

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结束后不久，胡耀邦同志在抓传达贯彻中央全会精神的同时，关注各地开展反对精神污染的情况。这年11月10日晚，耀邦同志在中南海勤政殿和团中央几位干部谈话。这几位同志向他反映了反对精神污染的情况和问题。耀邦听了以后认为：反对精神污染问题，需要正确引导，及时指明方向。他说：小平同志本

来是说“不能搞”精神污染，而且是指思想战线、理论战线、文艺战线，中央发文件时有人把“不能搞”改写成了“清除”；我审稿时没有把好关，文件发出后，各地纷纷表态，把大家吓了一跳。他接着说：我就担心这个，不要一说反对精神污染，就不让人家穿花衣服、搽香水，不要把美化生活搞掉了。当时他对在场的中国青年报社社长余世光同志说：你们《中国青年报》写一篇评论员文章，题目就是《污染要清除，生活要美化》，先在青年报上发表，然后请《人民日报》转载。一个星期后，11月17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污染须清除，生活要美化》。文章指出：“把青年美化生活的正当愿望不加分析地当作‘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精神污染’来反对，这样做是有害的。第一，它会引起青年的反感，从而影响他们生产、工作和学习的积极性。第二，它会在人们中混淆是非界限，甚至可能过去某些‘左’的做法重又出现。第三，它也会妨碍人们特别是青年对真正的精神污染的斗争。”由于这篇文章切中时弊，《人民日报》和全国各地报纸都很快加以转载。

这年的12月8日至12日，团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二中全会。会上传达学习和贯彻了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精神。会后，团中央专门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团委书记会议，进一步讨论安排共青团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清除精神污染中的工作问题。13日，胡耀邦同志在中南海接见了与会同志。

在一个小会议室里，耀邦同志热情地和大家握手。与会同志围他而坐，面对面交谈。耀邦同志以他常有的对人真诚的微笑问大家：“你们的会开得好吗？”有几位团省委书记回答：“我们的会开得很好。听了中央精神传达很受教育，回去我们一定把工作做好。”耀邦同志满意地点点头，又说：“你们看还有什么问题、困难需要帮助解决的？”大家看到耀邦同志坐椅边放着笔和纸，想听取大家意见，这样有多位团省委书记依次讲了本省对青年进行反对精神污染教育的情况。他们谈了各地团组织通过多种形式对青年进行理想、信念教育，帮助青年把个人的前途和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振兴联系在一起，积极投身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去的情况。也讲到不少地方“清除精神污染”工作中某些过头的做法和扩大化的偏

向。比如有的工厂工人上班时，要进行衣冠检查，有的青工蓄了长头发、穿喇叭裤的，必须剪成短发、剪掉喇叭裤腿才能进工厂，等等。耀邦同志对大家谈的情况和问题，不时地作了记录。他见大家讲得差不多了，就即席讲话。

他首先问：“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你们学习了没有？”这时团中央第一书记回答：“我们传达了，大家都认真学习讨论了。”

耀邦同志说：“小平同志关于反对精神污染的讲话很好，很重要，是中央同志都同意的了，都拥护他这个讲话。”

耀邦同志接着说：“什么叫精神污染，精神污染指的是什么范围，小平同志这篇讲话讲得非常清楚的。”他加重语气说：“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反对精神污染，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件事情我们是要坚决做到底的。”

他针对与会同志汇报中所反映的问题，他说：“小平同志讲了以后，在执行中，有的地方走了样子，就是说没有按照小平同志讲话去做。小平同志明明讲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但是许多地方搞到普通群众中去了，小平同志明明讲主要是理论战线和文艺战线，许多地方搞到经济战线的政策上去了，甚至搞到人民群众生活方式中的纯属个人兴趣爱好上面去了。这就不好闹。如果不注意，照这个样子走下去，我们就可能发生偏差，要走偏方向，引起思想混乱，使我们的工作受到损失。”他分析：“为什么会走样？走样子的实质在什么地方？就是用‘左’的东西或者用守旧的观点，用封建主义的观点，去对待反对精神污染。这是万里同志提出来的，我觉得他提得很对。一个‘左’的东西，一个封建主义的东西。在前天书记处会议上，尚昆同志说，我们许多东西一做起来就采用了‘文化大革命’那个破‘四旧’的办法。破‘四旧’造成了多少损失，把文物古迹都扫光了。‘文化大革命’后，经过拨乱反正，已经过了五年，怎么还搞‘左’的东西？还有封建主义的东西。封建思想的东西，对现代世界各国文明的东西看不惯，还要把社会生活拖到一百多年以前去，拖

到封建的秩序方面去。六、七十年前男的都梳辫子，辛亥革命后就开始剪辫子。男的留长发当然我们不提倡，但是，人家要留点长发有什么关系？我看没有什么关系，你管人家的头发干什么嘛！”

讲到这里，他突然笑了，想起过去一件事，他说：“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我到河南登封县。当时他们看到团中央第一书记来了，中央委员来了，把七、八个女孩的头发剪得很短。我说你们把头发剪了像个什么女孩子，你们

两个月内把头发蓄起来好不好？一搞名堂就从头发上做文章，从头上革命呀，头发遭殃。鲁迅写过的，你们从鲁迅全集上找。清除精神污染，先搞头发，这不是落后嘛！”

胡耀邦同志针对会议和各地开展“清除精神污染”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接着讲了要注意的八个问题。

他说：“第一条是服装问题，穿衣服的问题。现在穿的衣服情况是好还是不好？我看不好，包括你们今天穿的。现在我们的衣着还不行，一个花色，一个品种，着衣并不好。什么奇装异服，这个话不好。外国人看我们的女同志总是穿长裤子，也认为是奇装异服。日本女的穿和服，我们看来有点像奇装异服。现在我们穿短袖子衣服，不是很好吗！两千多年前，你们看我们先人衣服的袖子那么大，长袍马褂。战国时期，有个赵武灵王，提倡穿短衣紧裤的骑服，这样好射箭、好打仗。服装也是要发展的嘛。我觉得在可能条件下，衣着搞好点是应该的。衣着搞干净、整洁、式样多一点，适当提倡一下是必要的。至少规定一条，不许干涉人家穿什么衣服。

现在我们的布积压大概是五十亿米吧！今年我们生产的棉花是八千万担，就是四百万吨，是世界第一。美国是三百一十万吨，苏联大概是三百三十万吨。美国没有我们多，苏联也没有我们



胡耀邦

多。化纤我们也多了。所以适当提倡穿着，也就是适当刺激人们的消费，是我们推动生产不可缺少的措施。要弄清楚生产和消费的辩证关系，消费可以推动生产。同时，人们看我们的面貌，第一是环境卫生好不好，第二是衣着好不好，所以适当提倡一下注意衣着是关系我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问题，当然精神文明建设主要还不在衣着上闹。

第二个问题是歌曲。允许唱什么歌曲，允许听什么歌曲，现在搞得很严闭！我前天看了你们青年报星期天版登的《前进吧，青年》这首歌，萧华作的词。我看词做得不错，曲子是不是稍差一点？第一要适当提倡唱一点革命歌曲，包括好的进行曲和抒情曲；第二不要禁止那些无害的歌；第三，要禁止唱的歌只是极少数、极个别的，应该有一个单位来审查批准。让各个单位自己决定，那还行？第四要鼓励作曲家、歌唱家创作一些好的歌曲。时代在不断前进，歌曲也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增加新的内容。比如，延安时代的八路军进行曲，当时你不要他唱他也唱，那是时代的需要。现在唱延安时代的八路军进行曲、纺线线，那就没有多少人唱了。青年都是爱唱歌的，应该让青年放声地唱。歌曲这个问题是一大政策。

第三个问题是文艺作品。前天书记处讨论，所有中国的、世界著名的、称得上是文艺作品的

都不能禁止。哪怕它里面有恋爱的情节,有一些男女关系的描写。比如《红楼梦》,还有《被开垦的处女地》、《静静的顿河》等作品,你禁止它干什么?国内国外公认的著名的作品,不能禁止青年阅读。有些没有文艺价值的作品不叫文艺作品,就是现在人们讲的“手抄本”,什么《少女之心》之类,这样一些书对青少年危害特别大,对青少年要进行教育引导。

第四个问题是绘画、雕塑。也要适当划点界限。中国古代女人穿的衣服手指头都不露,就像嫦娥奔月,脚也不露出来。我出国不多。在日本看到裸体雕塑、裸体绘画并不是很多的。但是欧洲的传统,裸体像就很多。流行了几百年,大人小孩,天天接触,习以为常,司空见惯,没有什么神秘感。我们现在还没有开放到那一步。我们总有一天,也许二十一世纪下半世纪,要更多开放一点。我觉得对人体结构的绘画、雕塑,究竟要禁到什么程度,必须研究清楚。适合中国的情况,可以在多少年之内稍微比外国搞紧一些,但如果完全禁得死死的,说女人的裸体像不能画,这就不恰当了。我觉得根据我们国家的国情,这个问题慢慢开放好一些。

第五个问题,电影、电视也要规定几条。第一,要多创作一些好的电影、电视片;第二,要提倡多放映一些好的,能够鼓舞人民、青年革命精神,干四化的影片;第三,一般没有什么害处的,我看也不要禁止。一部电影片里面插一点爱情故事、接吻,这个怕什么?”耀邦同志讲到这里,有的同志插话说:一阵儿是八个样板戏,不能有爱情的内容,一阵儿是无爱不成书,电影和文学作品里好像没有爱情不行。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耀邦同志听了点点头,说:“这个要注意啊!”他说:“有的同志说,有的地方随便禁止电影,这是犯法呀。我前几天看了《不该发生的故事》、《被控告的背后》这两部片子,小平同志都看过了的,是称赞的。他的警卫参谋通知我看,我看了觉得好得很嘛,为什么禁呀?”耀邦同志讲到这里,有的同志插话说:有的地方,原来排好了节目,舞台上一个管灯光道具的工人,说是精神污染不能演,这个节目就删掉了。谁都有否决权,这怎么行呀?

耀邦同志接着说:“第六个问题是跳舞。在

节、假日里,要允许青年人、特别是少数民族同志跳集体舞。我们只禁止那些伤风败俗的所谓舞蹈。对少数民族可要注意哟,汉族没有什么舞蹈,把少数民族的舞蹈一禁,就糟糕得很了。我说的是节日、假期允许。用‘允许’两个字嘛。

第七个问题关于清查、禁止淫秽品。淫秽物品限制到什么范围,也要把它搞清楚。采取什么办法禁止?光靠收缴,你怎么收缴得到吗?他不交给你,怕交了,你把他记录在案,也不解决问题。我看要号召人家自己毁掉。不许抄家,也不要限令收缴。开个团支部会、党支部会,让人家自己毁掉嘛!淫秽物品也要规定范围。前几天,余秋里主任讲,有的单位收缴淫秽照片,有的战士把他姐姐、妹妹、未婚妻的照片也交了。人家穿得好一点嘛!不许搜查哟,搜查就乱套了。对一些所谓淫秽品,人家愿交就交,不愿交就让人家自己毁掉。”这时有人插话说:流氓团伙犯罪那是另外一回事。

耀邦同志说:“第八个问题是从高中开始,要有计划地讲点人体结构、生理卫生方面的知识,破除人们对生理卫生知识的无知、愚昧和封建思想。生理卫生、人体结构,讲开了就没有什么神秘了。这是关系到民族的健康问题。”

胡耀邦同志讲完八条后,作了小结式的讲话。“我讲了八条。总而言之,反对精神污染决不许在小平同志讲的范围之外去任意扩大。反对精神污染的问题,小平同志讲得很清楚,是散布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形形色色的腐朽思想,散布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不信任情绪。重点又是党的干部。我们这一代人要有一个好的精神状态,建设起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青年中要提倡生活上丰富多彩,可不能把生活上的丰富多彩搞掉了。我们建设社会主义,不能建设一个穷的、贫困的、苦行僧式的社会主义。如果那样就糟了。工作(包括劳动、读书)紧张认真,生活丰富多彩。要明确地提出这个要求来。我主张,青年团要搞正面教育,少搞清除呀、斗争呀,多搞点文体活动。青年人应如何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搞得热气腾腾?比如夏天游泳,冬天滑冰,体育方面的、文艺方面的、科学方面的,要搞群众性的、小型的、多样化的、生动活泼的活动。”耀邦同志进一步强调:“你们少搞一点这里清理什么东西,那里斗争什么东

西。用积极的东西去代替那些不好的东西嘛！把社会搞得凄凄惨惨、冷冷清清，这不好。青年团明年准备一年，后年开个会，主要解决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问题，找出一套办法。”最后，耀邦同志说：“党的二中全会上，小平同志的讲话是很正确的，但我们不能用‘左’的东西，用封建主义的东西去反对精神污染。我们要防止出现‘左’的偏差，可能有的人又会说‘清除精神污染又要收了’，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大家一面聚精会神地聆听，一面紧张地作记录。当时耀邦同志的深入浅出、针对性、指导性很强的讲话，使很多同志对“清除精神污染”的紧张、担心和困惑的心情，突感茅塞顿开，对今后如何进一步开展工作心里更托底和有信心了。当耀邦同志讲话一结束，大家热烈地鼓掌。耀邦同志多次举起双手，示意大家不要鼓掌，微笑地问：“还有什么问题吗？”大家继续鼓掌，表示没有问题了。

二十多年后的反思

会议结束以后，我连夜把记录整理出来，回到单位向干部作了传达，并按照耀邦同志讲话精神，调整了编撰和宣传计划。

会议结束后一些日子，我参加中直一个工作会议。在开会前，一些同志正在议论开展的“清除精神污染”情况和问题，其中好像也提到胡耀邦同志在一个什么会上的讲话。我以为就是胡耀邦同志在团省、市、自治区委书记会上的讲话，于是我把他讲话的要点、主要是八条内容讲了。有些同志听了兴奋地说：耀邦同志讲得好呀！他强调反对精神污染要坚决按照小平同志讲的要求去做，同时又强调要注意政策界限，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当时有的同志要我重述八条内容的要点，他们作了记录。但是，也有的同志怀疑说，你讲的不对吧！听说耀邦同志讲的与中央精神不一致。此言一出，在场的人都目瞪口呆，大家想总书记讲话还能“与中央精神不一致”吗，难以置信。我连忙说：耀邦同志讲话除我以外，还有三四十人在场听了，不会听错的。那位同志欲说而没有再说，这样大家也就不作声了。此后我一直为此事感到茫然。

现在事隔二十多年了。那时发生的事不过是历史的一个浪潮，或者是浪花。现在我们再看看当年胡耀邦同志讲话的内容，他讲的依然是正确的。其中有很多观点、论述以及对待具体问题的政策界限，现在大都是这样做的，不成什么问题了，但是当年却属于“思想解放”的范畴，或者是“讲过头了”、反对“反精神污染”的言论。

2005年11月18日，我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党中央举行的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九十周年座谈会。我看到许多熟悉的脸孔，和曾经在一起工作的战友。那种亲切的情感，好像我们昨天还在一起工作，现在不同的是两鬓斑白了，已经老了。纪念座谈会举行着，中央有关部委的领导同志和胡耀邦同志家乡的代表依次讲话，畅叙胡耀邦同志的历史功绩和崇高品德。我边听边时而回顾往事，茫然的心境依然笼罩着心头。当曾庆红同志代表党中央讲话，说到胡耀邦同志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的一生是光辉的。倡导要学习他忠于党的事业、鞠躬尽瘁的献身精神，学习他锐意改革、勇于创新的思想境界，学习他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的优良作风，学习他顾全大局、光明磊落的高尚道德。这些话深深地印在与会同志的脑海里，在当时庄严的氛围中，大家虽然没有什么明显的表情，但内心却响起了掌声。

（此稿写于2007年3月30日）

注：

（一）陪同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接见团中央及各省、市、自治区团委书记会议的有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文中插话人为胡启立。

（二）参加胡耀邦这次接见会议的有团中央第一书记王兆国，团中央常务书记胡锦涛，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延东、李海峰、克尤木·巴吾东、李源潮、宋德福，候补书记张宝顺、李克强等。

（三）主持这次接见会的是团中央第一书记王兆国。

（四）1983年12月23日中宣部的《宣传动态》上，刊登了胡耀邦同志这次讲话不准确的摘要。文中引叙讲话的内容，基本上是胡耀邦同志讲话的全文。

（责任编辑 萧 徐）

《译林》事件始末

施 亮

原译林出版社社长李景端先生是先父的挚友，父亲病逝后他还与我家保持了亲密联系。他曾经赠我两本书《波涛上的足迹》和《如沐清风》，书中回顾了他编辑生涯数十年见闻感受，尤其《译林》创刊伊始，因一封告状信引起的风波，颇能反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外国文学特别是西方通俗小说出版的几经波折历程。这也表明了，改革开放过程实质也是思想不断解放的过程。我得到他同意，对此事件一些资料经过编辑整理，概述其始末。

《译林》创刊

《译林》创办于1979年。时任江苏省出版局的局长高斯说，那时由于文革灾难而造成了全社会的“书荒”局面。江苏的出版事业刚恢复，为应急重印了一批中外文学名著，文化部出版局决定的外国文学图书目录中，依然仅限于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狄更斯等名家作品。但是，这些名著毕竟只反映的是历史社会生活，与现实有一定距离。可广大读者经过长期文化禁锢，迫切需要打开窗口，了解当今世界。于是，江苏省出版局审时度势，决定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创办两种大型文学期刊，一是刊登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钟山》，再是介绍外国文学翻译作品的《译林》。

筹办《译林》的任务，交给了李景端。他原在学的是外贸和俄语，1975年才进入出版界，与外国文学界可称是隔行如隔山。但是，他凭着满腔工作热情，白手起家，团结一大批外国文学翻译界的专家学者，创办起了后来在海内外文化界有着巨大声誉的《译林》杂志。一次，李景端从报纸上看到著名翻译家戈宝权是江苏人，便给戈

老去了一封信，说明江苏正筹划创办《译林》外国文学杂志，希望能得到戈老的指教和帮助。不久，戈老复信表示积极支持，寄去6首罗马尼亚爱明内斯库的译诗，供创刊号刊用，信末还表示如有困难尽可以去找他。戈老后来在文章里自豪地说：“在外文所里，可以说我是第一个支持《译林》的人。”《译林》受到挫折时，戈老在第二期写了一篇文章《把“窗口”打开得更大些吧》，结果有人嘲讽他说：“窗口再开大，蚊子、苍蝇就全进来了。”可见得，当时对改革开放的态度，在知识分子中也是看法不一致的，有人欣喜欢呼，也有人徘徊疑虑。李景端在戈老的帮助下，还聘请一批著名外国文学翻译家担任编委，帮《译林》出点子。其中有钱钟书、杨绛夫妇和杨周翰、周煦良等人，都是他费尽周折，再三“蘑菇”，好不容易才请来的。这些专家学者以后都真诚地关心与支持《译林》，在李景端的《如沐清风》一书中就刊有数十封他与钱钟书、杨绛夫妇及萧乾、黄宗英等人的通信，可以见证他们与《译林》的亲密友情。

当时，北京已有《世界文学》，上海也有《外国文艺》，《译林》在外国文学界将如何定位？他们经过一番征询调查，为了有别上述两本刊物，《译林》决定以“打开窗口，了解世界”为宗旨，以介绍外国当代文学、特别是健康的通俗文学为重点。1978年夏天，全国影院正放映英国侦探影片《尼罗河上的惨案》，受到广大观众们欢迎。李景端灵机一动，若把该片小说原著译出，就能使观众们更进一步了解影片疏漏的许多细节。于是，他很快约请了上海外语学院的3位英语教师翻译，赶在《译林》创刊号上全文登载。1979年11月，《译林》第一期推出了，首先以本刊编辑部发表文章《打开“窗口”，了解世界》，明确指出：“创办《译

林》外国文学丛刊，就是为读者多开辟一个了解和研究世界的‘窗口’。同期发表了著名学者范存忠、陈嘉、袁可嘉等人的文章，尤其在这期登载了《尼罗河上的惨案》的全文后，使得长期受到文化专制禁锢、多年未读西方当代小说的广大读者们引起不小震动，初版 20 万册，很快售完，立即又加印了 20 万册。据邮局的人说，南京邮局每天外地邮购的汇款单要用大邮袋装，汇款员们因工作量顿时增加好几倍而叫苦不迭。甚至，还出现一个有趣的小插曲，《译林》的原定价 1 元 2 角，而黑市小贩卖一本则要 2 元，还外加两张香烟票。这说明广大读者是渴望了解外部世界的，是欢迎《译林》的。《译林》第一期出刊后，就收到了读者来信 1 万封。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昌同志还在一次大会上推荐了《译林》刊载的作品，此外广东省徐闻县勇士农场林伟等 6 名青年，及黑龙江涤纶厂与贵州凯山 467 信箱的一部分青年，还自动组织了读评《译林》的活动。

读者们的反映如此强烈，使《译林》编辑部的人们既感到欣喜，也感到意外。但是，更出乎意料之外的是接踵而来了一场风波。

一封告状信引起的风波

1980 年 4 月中旬，主持《译林》编辑部工作的李景端听说，北京有某位领导人的讲话传单，上面点了《译林》的名。那时有不少小道消息，多是通过这种油印传单先传出来的。李景端打电话向消息比较灵通的《钟山》一位编辑打听，那位编辑说是有这么回事儿，是中央负责意识形态方面的领导人胡乔木在一次讲话中点了《译林》的名，说是“现在有些杂志只顾赚钱，南京《译林》就是这样的杂志”等等。这使编辑部的人们有些不安，他们怎么也猜不到，一本刚出刊的《译林》，究竟犯了什么错误，竟会惊动了这么高的领导人？

直到 4 月下旬，才进一步明了情况。原来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所长冯至先生，在 1980 年 4 月 7 日给胡乔木同志写了一封长信，对江苏的《译林》刊登了《尼罗河上的惨案》和浙江出版了《飘》表示不满，信中说：

“目前有关翻译出版外国文学作品的某些情况，觉得与左联革命传统距离太远了。近年来有

个别出版社有片面追求利润的倾向，当前我国印刷和纸张都很紧张，他们却翻译出版了些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作品。如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外国文学丛刊’《译林》一九七九年第一期，用将及全刊一半的篇幅登载了英国侦探小说女作家克里斯蒂的《尼罗河上的惨案》，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同一作家的《东方快车上的谋杀案》，这些书刊被一部分读者争相购阅，广为‘流传’，印数达到数十万册以上。

侦探小说也有优秀的、启人深思的作品，但是大多数都没有什么教育意义，有时还能造成坏的影响，根本谈不上对于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学、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有任何好处。

克里斯蒂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已开始写作，三十年代已大量生产，我见闻有限，过去却很少听人提到过她，为什么现在忽然这样‘时兴’？从这点看来，我们读书界的思想境界和趣味，真使人有‘倒退’之感。

我国自从‘五四’以来，翻译介绍外国文学，对于新文学的建设和革命事业是起过积极作用的。回想三十年代，我国进步的出版界，出了许多进步书刊，为革命事业做出不能磨灭的贡献。现在为什么有的出版社置自己的责任于不顾，出那些‘惨案’、‘谋杀案’之类的书籍而沾沾自喜？自‘五四’以来，我国的出版界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堕落过。

去年八月，美国文学研究会在山东烟台开会，江苏人民出版社在会上散发了三种他们新出版的美国小说：按：指《钱商》、《珍妮的肖像》、《医生》。一位美国专家说，这样的小说，在美国都是供人在旅途上消遣，看完就抛掉的书。据我所知，就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比较正派的出版社和书店，也很少出版出售红红绿绿只供人旅途上消遣的书籍，想不到我们社会主义的中国，在党的领导下的出版社，却有人对那样的书趋之若鹜，这真有失我国文化界的体面。还听说，浙江人民出版社把解放前傅东华翻译的《飘》印了几十万册，大为倾销。既不问《飘》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意义，也不问翻译质量如何，这种行动，除去为了赚钱以外，我得不到任何别的解释，可是‘社会主义’不知随风‘飘’到哪里去了。

当前出版界和读书界之所以有这样混乱现

象,可以说是对十多年极‘左’路线广设禁区的一种惩罚。希望出版界多出些好书,不要趋‘时’媚‘世’,多想一想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版者应负的责任,把不良的风气扭转过来。

以上只是个人的感想,可能很不恰当,但我感到有向你陈述的必要,请你指教。”

冯至先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著名诗人,也是享有盛誉的学者。他当时还担任学部委员,出版过《杜甫传》和《歌德论述》等多种著作。但今天看来,他的这封长信显然带着那个时代的痕迹,有些观点看法是有着局限性和偏见的。这是由于一些老知识分子受到长期以来文化禁锢政策的影响,被那些教条主义的僵化观念所束缚,对改革开放初期的纷繁文学现象存有某种疑虑。其实,这正充分说明了人们的思想解放确实是一个逐步渐进的过程,也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胡乔木同志收到冯至先生这封信后,很快加批语转发给中共江苏省委和浙江省委研究处理。以后,李景端心有余悸地说,此事倘若发生在文革期间或在这之前,像这样一种由中央负责同志批转给省委“研究处理”的文件,少不了要当成一桩“案子”对待,甚至会将刊物停刊整顿,主持工作的李景端也难免隔离审查。幸好,此事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内民主空气浓厚起来,因此,江苏省委对此事处理采取了十分慎重的态度,当时的省委负责人在来信上做了大意如下的批示:……《译林》还是应该办下去,但选稿应当坚持党的文艺方针,要办得更好,要认真做到为社会主义四化服务,这方面建议认真总结改进。还应开展文艺评论工作。接着,江苏省委政策研究室在《调查与研究》上转发了胡乔木同志批转冯至先生的长信,并加了语气缓和的按语,认为“对一些可资借鉴而内容不怎样健康的作品,可内部发行,主要供文艺工作者参考,而对于广大群众,则应当努力提供有益于心身的精神食粮。”并对《译林》提出期望,希望能够通过这封信,总结自己的工作,进一步把刊物办好。

在接到了省委转下来的上述文件后,江苏省委出版局党组也进行了多次讨论。时任局长和党组书记的高斯同志态度鲜明,他认为在电影公映《尼罗河上的惨案》之后,《译林》将其原著加以翻译出版,更有助于使读者全面地认识这部作

品,这不是什么错误。如果要算是“大错误”的话,我作为局党组书记,当然应负其责,撤职、党纪处分我都接受,但是,我还是要提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局党组经过一番严肃认真的讨论,尽管个别同志也有不同意见,但最终大家还是赞同高斯局长的观点,强调对《译林》应该实事求是,不要轻率地采取组织处理措施。随即江苏省出版局党组责成《译林》编辑部对照党的文艺方针,认真全面进行自查,并向省委写出自查报告。

《译林》编辑部在自查报告中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认为《译林》的办刊编辑方针还是正确的,得到广大读者和翻译工作者赞同和支持。《尼罗河上的惨案》既不诲淫,也不诲盗,《译林》登它没有错。唯一缺点是,在当时纸张紧张的情况下,印数多一些。对于冯至先生在信中批评的“三种美国小说”,《钱商》、《医生》和《珍妮的肖像》,也都是比较健康的文学作品。外国著名作家及国内外外国文学专家其中一部分人认为,那些叙述故事情节为主的畅销小说、推理小说、科幻小说,甚至



1991年,冯至在家中

民间神话,都是属于通俗文学,不值得加以介绍。但也有很多,包括一些著名翻译家则认为,“通俗文学”是文学中的一种体裁,也是外国现实社会的某种反映,具有题材广泛,情节生动,通俗易懂等特点,能够吸引更多的读者,因此,有选择地介绍一些外国比较好的“通俗文学”作品,也是符合党的“双百方针”的。对外国“通俗文学”有不同看法,是一个有待探讨的学术问题,可以展开讨论,但以此就说《译林》“追求利润”,“倒退”,“堕落”,“有失体面”,“趋时媚世”,甚至把外国人抛掉的东西也捡来翻译等等,这些指责是不是之词,他们难以接受。

这份自查报告上报以后,《译林》编辑部仍然处于等待处理的状态,虽然编辑工作未受到很大影响,也颇有些忐忑不安。如高斯同志所说,“在内部,有关人员遭到不同意见者的追究;在外部,则传闻很多,指责纷来,甚至外省市有人散布江苏《译林》犯了路线性错误的说法。内外交迫,压力很大。幸好,《译林》的创办是取得省委负责人同意的,这是一个‘底’;李景端等办刊同志工作认真,殚精竭虑,保证了刊物的品位与质量,有刊为证,又是一个‘底’;这时候,敢说真话、直话的人更多了,尤其是许多德高望重的翻译家对这场风波做了公正的评判,给《译林》以有力的支持,发表了要全面看待外国通俗文学的正确意见,也是一个‘底’。”他们心中有“底”,决定坚持自己的原则立场来反映真情,同时也向左右上下做好解释及化解工作,以期使刚创刊的《译林》渡过难关。

中宣部做出了结论

冯至先生写信的一月之后,1980年5月上旬,中国作协在北京召开全国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译林》作为刚创刊的新刊物,也被指名邀请参加。江苏省出版局决定派副局长陈立人和《译林》编辑部副主任李景端出席这个会议。他俩报到后领取文件,发现每人文件袋里都有一份冯至先生所写的长信,听说会议日程中还准备安排他在大会上发言。他俩都预感到了《译林》仿佛成了会议中的热门话题,颇有“备受关注”的某种压力。但是,经过认真的自查,他们又确信自己没有

什么问题。有了这样的“底”,陈立人与李景端商量好,头两天他俩注意倾听与会者们的意见,态度冷静谦虚,只听不说。到该说的时候,也要理直气壮地表明他们的观点。

会议中,外国文学研究所的一位代表,先在分组中做了发言,他也认为当时全国各刊物和出版社,介绍外国通俗文学尤其是侦探小说太多了,已形成一种倾向。他还认为群众并不懂得艺术,年轻人欣赏能力低,前一阵报刊上宣传“文艺的最后评定者是群众”,这个提法不妥。但是,与会的许多文艺界人士在发言中,并不同意冯至先生长信中对外国文学出版工作的看法,也不赞成介绍侦探小说太多“已形成一种倾向”的估计。著名学者作家冯亦代、陈登科、于浩成、黄伟经等,更直率地针对那封信的观点发表自己的见解。时任《读书》副主编的冯亦代说,他是研究英美文学的,去年他参加过烟台召开的美国文学研究会议,也看到江苏出版社送请代表们提意见的3本美国小说,这些书的作者是严肃的,书的内容也反映了当前美国社会现实。这几本书都是我国著名翻译家推荐的,译文质量也是好的,把它们介绍过来是好事,为什么要借一个美国人的话,来指责这些书是“红红绿绿”的、“随手抛掉”呢?他还说,《读书》杂志下一期就要登一篇怎样看待外国侦探小说的文章,大家争鸣嘛。在会上,还有人半开玩笑地说,浙江出了一本《飘》,难道就能把社会主义“飘”掉吗?

在活跃与民主的会议气氛感染下,李景端也做了一个坦诚的发言,认为估量当前外国文学翻译出版工作的形势要实事求是,不能因为出了一两本有争议的书,就认为出现了什么倾向,更不能因此把出版界、读书界都说成是“倒退”。有人对外国通俗文学、侦探小说有不同看法,这是学术问题,应当提倡争鸣和讨论,不要简单地下个“堕落”的断语。此外,他还说,“左联”时期的革命精神要发扬,但时代已经变化了,今天介绍外国文学的视野,应当比50年前更有发展,这正是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需要。李景端还在会议上澄清了《译林》是否惟利是图的问题,并介绍了编辑部自查的结果。

参加会议的新华社记者听了李景端的发言后,认为这方面实际情况与冯至先生长信中反映

的不一样，觉得有必要让更多的领导同志了解。于是，散会后记者又约李景端专访，并连夜编发了一篇专稿，刊登于新华社1980年5月8日的《国内动态》上。这篇专稿的题目是《江苏省译林编辑部副主任李景端谈当前出版外国文学作品的状况和意见》，文中介绍了李景端在会议上发言的那些观点，首先他认为当时外国文学作品出版得不是太滥，而是远远还不够，已经介绍的不过是“九牛一毛”；其次，他解释了出版那些外国文学作品和创办《译林》并不是单纯为了赚钱；紧接着，他对发扬文艺民主，繁荣艺术和学术，鲜明提出自己的看法：“文艺现象十分复杂，尤其是外国文学更加复杂，经过‘四人帮’的长期的禁锢，可以说我们所知还有限。因此，更有必要允许不同意见、不同做法的交流和讨论，实事求是地来提高大家的鉴别能力和欣赏水平。即使社会上出现了一些不该提倡的现象，光靠‘堵’恐怕不是唯一的办法，更重要的是引导，要用更好的东西去代替它，战胜它。”他还充满感慨地说，“我们很赞成耀邦同志讲的，对文艺问题不能性急，要慢慢来。要允许不同的实践，实际上，有些问题只要领导在一定范围打个招呼，点一点，下面就会注意的，最好不要轻易用行政命令的办法来处理。”

会议上多数人发言所形成的基本共识，会议主持者也感受到了，后来通知，原定冯至先生的大会发言不讲了。那位来自外国文学研究所的代表，也主动地找陈立人和李景端诚恳交换意见，说他们在北京呆久了，对下面的实际情况不够了解。那封信只是冯至先生的个人意见，他年纪大了，难免有片面性等等。这时，陈立人和李景端已经隐约感觉到，会议刚开始他们所面对的压力有所减轻，领导人的看法也在发生改变。到了5月9日下午大会闭幕，时任中宣部部长王任重同志做了大会总结报告，他在讲到不能认为党委领导同志过问文艺界的问题就说是粗暴干涉时，特别举出了《译林》做例子。他讲了冯至先生给胡乔木同志写信，后来批转给了江苏省委，以及江苏省委非常慎重予以处理的经过情况后，特别指出：“这些信和江苏省委转发时的按语，我和耀邦同志都看了。耀邦同志要我说一下，这件事就这样处理，就到此结束。同志们，这样的态度，这样的处理方法，对不对呢？《尼罗河上的惨案》印得多

了一点，这一件事，要追究责任？要进一步处分？不会嘛！及时指出工作中的某些缺点，是为了引起同志们的注意，以便今后改进工作，这叫做打棍子吗？不能叫打棍子。至于冯至同志的信，这位老同志七十多岁了，他的用心是好的，是为了文艺事业搞得更好，信中有些话可能说得过于尖锐一点，个别论断不够适当，但出发点是好的。我们认为，江苏省委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是妥当的。”

至此，关于《译林》创刊号所登载的《尼罗河上的惨案》而引发的告状信风波，算是画上了句号。李景端后来回忆此事说，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耀邦同志，中宣部，江苏省委对这一次风波采取了实事求是和关心爱护的态度，对学术问题切实坚持了“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揪辫子”的三不政策，既允许冯至先生有批评权，也允许我们《译林》有辩护权，还允许其他人有反批评权；而且把对学术的不同看法，与对刊物和人的处理严格区分。这样，才使新创刊的《译林》被保护下来，在文艺界的知名度还大大提高了。这样的处理方法，不仅未使《译林》与冯至先生之间产生了严重的隔阂与矛盾，还促使了他们互相间的谅解和团结。会议结束当天，冯至先生特意派车接陈立人和李景端去他家做客，时任上海译文出版社副总编、《外国文艺》主编汤永宽也随车同往。进门寒暄之后，冯至先生首先对陈立人与李景端说，“由于我的那封信，给你们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对此向你们表示歉意。信里有些地方是有片面性，有些提法不太妥当。”见这位享有盛誉的文学界老前辈开门见山即做自我批评，不禁引起了大家对他的敬意。陈立人说，有些情况由于不沟通，难免有些误会，不过这次中央、省委处理这件事的方法非常好，这对我们今后的工作也是一种促进。李景端向来直爽，有话在心里憋不住，他还是用较委婉的口气对冯至先生说：“您是外国文学研究界的老前辈，如果您对《译林》有什么意见，写信批评我们，甚至把我们叫来，当面训斥一顿，我们都会诚心接受。只是用向中央负责同志写信，并批转省委处理这种方式，似乎太严重了一点。以后我会按期把《译林》寄给您，您有什么意见，只管直接向我们提。”这样一聊开了，谈话的气氛更加融洽亲切了。冯至先生还向在座人们提出很好的建议，希望北京、上海、南京三家外国文学刊

物更好地分工:《世界文学》主要介绍名家名作,《外国文艺》主要介绍外国流派,《译林》可以多介绍一些有社会意义的外国通俗文学;他还主张,适当时候可以在江苏召开一次外国通俗文学讨论会。以后,《译林》与冯至先生也建立起日益增强的友好关系。冯至先生家的地址变更,他主动给李景端去信,要求按新的地址仍然给他寄赠《译林》。冯至先生1987年亲自主编一套“德语文学丛书”,指名要李景端牵头负责与其它几家出版社合作出版事宜。当这套丛书的第一本书由译林出版社率先出版后,他非常高兴,特地写了一篇书评文章,发表在《译林》杂志。接着,又将冯至先生撰写的这套丛书总序也发表在《译林》上。冯至先生逝世后,听说他女儿打算出版冯至先生的文集,李景端当即表示,译林出版社决定接受出版。后来因为冯至先生是河北人,遂由河北教育出版社来出版。

1981年5月1日至4日在扬州召开了《译林》的首次扩大的编委会,大约有著名作家和学者40余人参加。著名翻译家王佐良和戈宝权寄去了书面发言。钱钟书、杨绛夫妇也特地向会议写来一封见解精辟、饱含深情的贺信,信中说:“《译林》这一年来不断改进,在我们接触的青年人里,有很好的‘口碑’。”与会的著名专家学者也纷纷赞扬《译林》这一年的成就,实现了“打开窗户,了解世界”的办刊宗旨,他们祝愿这个刊物办得更有特色。

回顾与思考

《译林》杂志渡过了这一场难关后,在广大读者和翻译界的影响日益扩大,发行量一直居同类刊物的首位。但是,它在发展过程中仍然不免历经坎坷。1983年,在宣传舆论中提出在文艺战线要“清除精神污染”的口号。但是,就像以往多次发生过的那样,总有某些领导人喜欢接过这些堂而皇之的口号,来诠释其属于教条主义的僵化观念。因此,《译林》又得经受种种压力了。那些看《译林》不顺眼的人,又把它划入“精神污染源”,进行横加挑剔与肆意指责了。李景端回忆道,当时曾在西安召开的一次外国文学会议上,有人指名批评《译林》是主要传播西方商业化的小说,发

行量又那么大,对读者是很大的精神污染。还有人在那时组织了省研究机构的几个人,对《译林》创刊以来的各期,逐篇逐句进行审查。也许未查出问题,最后不了了之。可是,有人却向他们打招呼说:“《我的茉莉花》那篇日本短篇小说,讲了妓女的身世,最好不登或者删掉。”甚至连一篇作品提到妓女的身世都看成是精神污染,也真是“左”的可以了。可能当年轻人很难理解这一段历史。《译林》因此而无缘无故受到排挤和冷遇,他们曾在当时与翻译界的一个组织提议联合举办几项活动,却都遭到了谢绝。事隔多年后才得知,这个组织一位负责人,曾经指示不要同《译林》合办活动,要同《译林》保持距离。

在上世纪80年代初,也就是改革开放伊始,大家对外国通俗文学的不同看法,既是学术问题之争,其实也有一个对改革开放的态度问题,也就是要不要“打开窗户,了解世界”,要不要打破教条主义僵化的封闭观念,要不要解放思想的问题,这才是争论的实质。当时,负责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胡乔木同志是存有保守偏见的,从最初对“《译林》事件”发生后的态度,以至于后来对外国文学界及整个文艺界的干预,他都起到了某种消极、负面的作用。2005年,我曾拜访过著名翻译家傅惟慈先生,他说在80年代初曾经为某出版社编选一套外国现代惊险小说,第一卷已经打出了校样,但也是在那种社会气氛的影响下,加上出版社又更换一位思想比较僵化的领导,斥此书为“不良倾向”,竟然与他毁了约。傅先生不忿,找到另一家出版社又签订合同,同时还给周扬同志写了一封信,此事才得到圆满解决。由这些事情即可看出,在改革开放初期,要想真正打开窗户有多么不易!

我还记得,也是上世纪80年代初,文艺界思想活跃,作家们开始注目欧美的现代派文学,彼此的一些通信还发表在报刊上。这些作家认为,应该借鉴现代派文学的某些技巧,吸收精华,扬弃糟粕,丰富自己。但是,也有些理论家秉承那位意识形态大总管的意思,对现代派文学横加批判,认为这是资产阶级思想腐朽没落的表现,是以形形色色个人主义世界观来歪曲现实,是精神污染,要警惕对其盲目吹捧,注意批判抵制云云。有一次,我与先父施咸荣闲谈,问他对这场争论

持怎样看法？父亲对我说，这些思想明显都是从胡乔木那里来的。所以，这不是一场学术争论，而是又一场大批判。你发现没有？讨论的是外国文学研究的问题，却很少有外国文学的专家参加。现在批判现代派的那些理论全是苏联文学界教条主义的老一套。50年代时，苏联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日丹诺夫就说过，西方现代派文学是资产阶级的一堆破烂，采取的态度是一概打杀。父亲生气地说，这种粗暴态度哪里是文学批评，简直是村妇骂街。现在实际上又恢复教条主义的那一套，根本不是学术讨论。他一直认为，西方现代派文学是一种错综复杂的文艺现象。对意识流、黑色幽默、荒诞派等，许多学者将它们视为文学流派，而他却认为只是一种写作技巧，它们在思想上既有左翼的，也有右翼的。有些人忘记了，苏联十月革命后的“拉普派”，其中很多左翼作家就信奉现代派，例如布洛克的长诗《十二个》，就是采用象征派手法；还有被公认是无产阶级诗人的

马雅可夫斯基，其作品是采用未来派手法；那些现象又如何解释呢？总之，对西方现代派文学应该具体作品具体分析。我问他，这些观点挺新鲜也挺深刻呀，为什么不写成文章发表呢？父亲摇头苦笑说，写文章势必卷入那场争论，人家现在是搞大批判，我何必去纠缠不清呢！我倒不如脚踏实地多翻译些作品。当时他告诉我，他正准备将《麦田里的守望者》的黄皮书译本修改出版。此书先在漓江出版社印行，以后又转到了译林出版社，如今已印近百万册了。

抚今追昔，回忆起外国文学出版的那些曲折经历，实际上也是人们思想解放充满了反复却又逐步渐进的历程。可以说没有开放，也就没有改革。而没有思想解放，要打开窗户也是不可能的。从《尼罗河上的惨案》引发的波折，再看以后的那些艰难坎坷，从这些事物的对比中，也照射出我国改革开放前进的历史步伐。

(责任编辑 赵友慈)

“冶方杯——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征文启事

2008年，是举世瞩目的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也是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诞辰100周年。在左祸深重的年代，孙冶方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曾不惜身陷囹圄达7年之久。改革开放大幕拉开，孙冶方又以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无畏探索，得到国人的高度崇敬。回顾改革开放30年的历程，既是对改革开放的最好纪念，也是对孙冶方的最好怀念。为此，“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公共政策研究基金”、《炎黄春秋》杂志、《纵横》杂志联合发起“冶方杯·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征文活动。本次活动由新浪网独家网络支持。

一、征文内容：

改革开放30年历史的进步，一方面可以从中央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台来诠释，另一方面可用亿万百姓所身临其中的每一步印记来展现。本次征文以这两方面为主。要求：1、以“亲历、亲为、亲闻”一件事情为题，突出“小事件，大历史”的主题；2、以纪事本末体讲述30年来的一个历史事

件或历史人物的作为，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历程。

二、时间：2008年4月1日至9月30日。

三、评奖及颁奖

本次征文的优秀文章，将陆续在《炎黄春秋》和《纵横》发表，并付稿酬。征文结束后，由大赛组委会评选出获奖文章，颁发奖金和奖牌。颁奖仪式于10月孙冶方诞辰100周年时在“冶方书院”举行。

投稿邮箱

xqq0825@vip.sina.com(《炎黄春秋》杂志)；

yun9008@163.com(《纵横》杂志)

投稿邮箱：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炎黄春秋》杂志社 邮政编码：100045)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3号全国政协《纵横》杂志社 邮政编码：100811)

(请在信封注明“冶方杯征文”字样)

集体世袭与“权力场”

杨继绳

当今,那些父兄是高官的人,进入官场,就会飞黄腾达;进入商场,就会财源涌进。政府机关,外国公司,大型的国有和私有企业,也争先恐后地吸收高干子弟,并给予高位高薪。有人说,当今,高干子弟是集体世袭。

平心而论,“集体世袭”的说法有点以偏概全。高干子弟千差万别、良莠不齐,有依赖父兄权力的纨绔子弟,有出类拔萃的优秀人才。就是已进入高位的,也不全是靠父兄权力的荫护。高干子弟向上流动的机会超过平民子弟,也是任何社会难以避免的现象。不过,在民主国家,家庭背景只给他一个起点,他的上升是依法的,是按程序的。小布什能当总统,与他的家庭背景不能没有关系,但显然不是出于“让我们的子女接班,不会挖祖坟”的意愿。他是按程序选举上来的,不是老布什或老布什的朋友提拔的。

领导干部不可能不让自己的子弟当官、经商。高干子弟也是独立的公民,他也有自由选择职业的权利。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当官、经商,是不是借助了父兄掌握的公共权力。不能限制高干子弟进入市场和官场,但必须限制公共权力进入市场。一旦公共权力进入了市场,借助权力升官发财就不可避免,高干子弟就有近水楼台之便利。

在公共权力不受制约的条件下搞市场经济,权力就会进入市场交换领域。两千多年的专制社会,在中国形成了权力至上的传统。在权力崇拜的社会,权力一旦进入市场,就会成为极其昂贵的商品。我是主张搞市场经济的,但我反对公共权力进入市场。在中国将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目标的时候,我发表了一篇评论:《权力不能进入市场》(载《经济参考报》1993年2月11日),我写道:

搞市场经济并不是什么都能进入市场的。权力就绝对不能进入交换领域。我这里说的是公共权力。公共权力应当在更高的层次上体现大多数人的利益,它应当公正地对各种利益个体进行管理,监督,协调,不能参与到利益个体之中。权力一旦进入了市场,它就失去了公正,也就失去了管理社会的合法性,社会就会出现极大的混乱。设想一下,如果球场上的裁判员一边吹着口哨一边踢球,球场会乱成个什么样子?权力进入市场以后,权钱交换,权权交换,权色交换,必定腐败丛生,民怨沸腾,这还能搞什么市场经济?

很不幸,我国现实的发展和我的期待不一样,进入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权力真的进入了市场。经济市场化了,公共权力的运作方式还基本保持计划经济时的状态。权力高度集中,政企不分,大量的经济活动需要官员们审批。办公司,申请营业执照得审批;向银行贷款要审批;进口商品要审批;地皮需要审批。审批的权力掌握在官员手中。对经营者来说,需要审批的是发财机会。得到了批文就得到了财富。所以,手中有审批权的官员如果没有高尚的情操和坚强的意志,就无法抗拒“糖衣炮弹”的进攻。何况,我们的审批有相当大的随意性,他可以批给这个人,也可以批给另一个人。这样,没有认真改革的政治权力,在市场上可以兑换成大量的黄金白银。市场化的过程是利用政治权力聚敛财富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在这种情况下,与高官有关系的人,是接近审批权的通道,他们成了一种极为宝贵重要资源。有了他们的帮助,就有了贷款,就有了订单,就有了地皮。高干子弟最接近权力。高干子弟亲自出马经商,很快就成亿万富翁。商人们有高干子弟参加他们的商业活动,也会日进斗金。经济

权力部门在权钱交易中获得了实惠，党政权力部门也不能“守着大饼挨饿”，官员任免权也随之进入了市场，成为高度垄断性的“商品”，卖官鬻爵频频发生。高干子弟不需要花钱买官，人家会送给他官帽子。今天我送给他官帽子，明天他父兄会给我更大的官帽子。给高干子弟送官帽子是风险最小，收益最大的买卖。

因此，只要权力参与市场交易，只要干部选拔缺乏民主制度，高干子弟即使老老实实在家里，也会有人千方百计地找上门来。于是，高干子弟依靠权力升官发财就有了一种利益机制：公共权力参与市场交易——要升官发财必须亲近权力——拉拢高干子弟，让高干子弟升官发财——让高干子弟升官发财者，自己升更大的官发更大的财。20多年前，身居高位的一位老人曾经有过“让我们自己的子女接班，不会挖祖坟”的说法，这一说法对世袭当然会起作用。但是，如果仅有这句话，没有利益机制作为动力，世袭现象不会普遍、持久。有了这种动力机制，不仅是高干子弟，连高干的跟班、司机、情人，也有了升官发财的机会。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社会出现了不公平问题。社会不公平的主要表现是，对改革成本的承担和对改革的收益分享不对称。获益最大的是各级掌权者及其亲属和朋友，收益较小的是工人和农民和中下层职员。而对改革的成本的付出，工农和中下层职员比官员大得多。产生不公平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市场交易不公平。交易不公平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权力参与交易。我曾提出过“权力场”的概念。像“物理场”一样，“权力场”也是一个能量场。在这个“场”的每一点的能量都是不一样的。每个人都生活在“权力场”的某个位置。中国的改革还没有破除计划经济时代的“权力场”。在原有的“权力场”的基础上建立了经济市场。这样，处在“权力场”高能位置的人与低能位置的人进行交易，必然是前者胜，后者败。不公平的交易就是这样发生的。一个有趣的例子，有一项技术成果多年无人问津，某公司得到这个技术之后，声称这是某公子的专利技术，结果订单如潮。为什么能产生这样的效果？因为这家公司把这一商品从“权力场”的低能位置移到了高能位置。与这商品搭上关系的

买主，就有可能和某公子搭上关系，就有可能接近公共权力的高端。

我曾写过一篇文章批评“红顶商人”（《市场经济不需要“红顶商人”》，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7年第2期）。我说的“红顶商人”是指用行政权力发财的商人。他们有的没有“红顶”，而是与“红顶”有亲密关系。“红顶商人”是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和不完善的市场交易的怪胎，是权力和金钱的私生子。在这篇文章中我提出，要防止“红顶商人”破坏市场经济，必须改革上层建筑，使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即尽快建立民主政治体制。没有民主政治的市场经济会发展成为“权力市场经济”。

1998年，印尼苏哈托下台，当时的报道说，苏哈托家族在全国1247家公司中拥有重大股权，这些公司分属20个财团。苏哈托的三子三女、女婿、儿媳、孙子、异母弟弟及其它亲属都各有财团，业务遍布全国，涉及公用事业、金融、地产、通讯、交通运输、石油化工、建筑、传媒、超级市场，等等。苏哈托家族在许多外国公司中也拥有股权。苏哈托家族带头，印尼“廉洁官员凤毛麟角，要找一个手脚干净的官员难似大海捞针。”苏哈托政府自身不干净，怎么能站出来清除腐败？退一步讲，即使印尼中央有廉洁的人站出来反腐，下面谁来执行？法不责众，腐败就成了常态。这些腐败官商们还是国家商业活动的主体，打击他们，商业活动就要停顿，经济就要遭受损失，没有人敢下这样的决心。想清除腐败，还要涉及到很多外国投资公司。在苏哈托家族聚敛财富的过程中，外资公司起了不少作用。苏哈托家族在这些外资公司中拥有大量股权。没收苏哈托家族财产，就要影响这些外国公司的利益，外资就可能退出。苏哈托家族的公司有一些是上市公司。如果将这些上市公司清盘，就要涉及一大批小股民的利益。这也为反腐败增加了难度。

我借苏哈托下台的机会，发表了一篇题为《权力市场经济的教训》的文章（载《方法》1998年第8期）。我写道：

苏哈托家族聚敛财富的手段主要不是贪污，而是利用权力经商。他们的公司可以享受种种优惠政策，可以取得政府合同，可以取得某些紧俏商品的进口权。印尼经济市场化了，但政治并没

有民主化。苏哈托搞的还是铁血政治。在情况下的市场经济只能是扭曲的市场经济，即权力市场经济。权力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权力进入市场，权力可以转换成金钱，金钱可以买到权力。权力大的人不仅自己很容易成大富翁，他的亲属也可以分享权力之惠。

还应当说，苏哈托执政时期，印尼经济发展还是比较快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966年的70美元增加到1996年的1160美元。谁是经济发展的最大受惠者？是各级大大小小的掌权者，其中以苏哈托家族为最。随着经济的发展，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社会矛盾也越来越尖锐。老百姓生活比原来是提高了，但不满情绪也增加了。亚洲金融危机引起社会矛盾总爆发，老百姓的怒火烧毁了苏哈托的王冠，也烧毁了她的金权王国的漂亮外部装饰，把一切丑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印尼表面上是法治的。苏哈托下台的权力过渡，虽然是在群众风暴中进行的，权力交接却还按照法律程序。但是，印尼民主化程度低。权力不受制衡。看来，没有民主的法制只不过是掌权者的程序游戏。民主和法治，二者不可分，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只有有了民主，才有真正的法治。

时间又过去了10年，被腐败官司缠绕的苏哈托逝世。只要靠他升官发财的人还有势力，他的官司肯定是打不清的，为他举行国葬也不会出人意料。此时中国改革进入了第30个年头。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国民经济的蛋糕已经做大。与此同时，一方面市场化加速，一方面原有的权力体系没有大的改革，甚至更加强化。在权力政治加市场经济的格局下，权力和金钱往往私下结盟，权贵资本急剧膨胀。结果，改革中造就的既得利益群体形成了强势，强势群体不仅占有了蛋糕中最甜美的部分，还吞噬了改革前劳动者创造的、以国有名义存在的大量财富。他们还企图利用这种强势左右改革的政策，企图在改革中得到更多的利益。“改革目标部门化，部门利益政策化”，就是既得利益者们扭曲改革的一种形式。党和政府一些有损既得利益者的改革，出台都是困难的；而有利于既得利益者的改革，出台就相当快。以公车改革难为例。上世纪90年代后期有一个统计数字：当时

有350万辆公务用车，每年耗费3000亿人民币，这些公车消耗高于当时国家财政对国防、科研、农业、公共卫生、教育等方面的投入。而这些公务轿车只有1/3用于公务，1/3被官员家庭私用，1/3被司机私用。所以，党和政府1996年就提出了公车改革的问题。1998年国家正式启动公车改革。但是，公车改革喊了十年，试验了近十年，没有进展，到新世纪，公车继续大量增加，2005年我国公车轿车保有量超过了500多万辆，每年为此消耗6000多亿元。而据国家统计局数字，2005年“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为6104亿元，“社会保障补助支出”为716亿元，国防费用为1817亿元。为什么政府推动的公车改革这么难？主要是触动了乘车官员的利益。公车改不动是因为“公权”没有改革。住房改革又是一例。住房商品化是中国住房改革的目标。1996年政府硬性规定，到1998年7月1日止，停止福利性分房。但是，到了截止日期，不少单位还没有吃完“最后的晚餐”，新世纪过去了几年，福利性分房还在进行。1998年以后，按每平方米1480元出售给个人（北京价格，当时市场价格平均6000元左右）。2007年，北京市盖了一批档次很高的住宅，市场价格在15000元左右，却以“经济适用房”的名义，以4000元的低价卖给中直机关的高级干部。“经济适用房”本来是照顾穷人的，买“经济适用房”必须对其家庭收入经过严格的审查。人们无奈地说，说房改是“吃不完的最后晚餐”。

邓小平以后，强人政治转化为常人政治。进入中国高层领导的是普通人。他们能走上高层是因为机遇、性格、能力和人品。常人政治的一个特点是，他不能按照自己的既定的理念行事，只能按照社会现实需要行事；他不能凭借自有的政治强力来推行某些主张，他只能在各种政治力量合力的推动下作为。而在社会合力中，强势群体的力量有着更大的权重，它常常左右着社会合力的方向。如果按这个社会合力的方向走下去，社会就更加不公平，社会危机就更加深重。常人政治既不能违抗社会合力，又要防止强势群体左右中国的发展方向。这是常人政治的困境。常人政治的领导人要走出这个困境，必须建立宪政民主制度，用民主来制衡强势群体。

（责任编辑 杜晋）

能反省历史的民族才有光明的未来

资中筠

有一则消息称英国电视台近日对 3000 名观众进行了一项关于历史名人的调查，有 23% 的受访者竟认为丘吉尔是虚构人物，却有 58% 的人认为福尔摩斯确有其人。还有其他一些历史人物如甘地等也有不少人以为是虚构的。读到这一消息当然令人惊讶。我已见到我国不止一家报刊以不同的方式刊载此事，语气调侃者有之，生发感慨者有之，上海《文汇报》刊登一篇短文提到“忘记历史就是背叛”，还举一反三联系到日本人不知道“东京审判”，我国《三国演义》掩盖了正史《三国志》等等。并提出要引起教育界的反思。

英国人不知道丘吉尔固然出人意外，只是这受调查的 3000 人是什么年龄段，什么文化背景，有无代表性，我们不得而知。在讥笑他人，或联系国人的古代历史知识之余，不妨反思一下我国当代人对当代史的了解或态度如何？在我脑海中立即浮现出一件近事：

就在几个月前，著名的北京师大附中（实验中学）大张旗鼓举行 90 周年校庆，竟然把“文革”中最初起来造反的红极一时的红卫兵头头宋彬彬作为“知名校友”奉为上宾，甚至还把当年毛泽东接见她的那张照片，与被她们残酷虐杀的卞仲耘校长的照片同时展出。为此，卞校长还健在的丈夫写了致在任校长的公开信，提出抗议。可以想见，这种抗议照例是没有下文的，而且也是无法公然见诸媒体的。此事可不同于一家电台普通的随机调查，而是北京名牌学校正式的、大张旗鼓的行动。所涉及之事的性质也不可同日语。这家中学的这场校庆组织者是无知还是有意？宋彬彬女士后来有什么杰出贡献，因何现在成为母校为之骄傲的“知名校友”，我不得而知。对国人而言，宋彬彬最“知名”的就是那张领袖接见的照片，以及钦赐名字“要武”。从此，“要文斗不要武斗”只是一句空话，全国掀起人格污辱、肉体折磨乃至武力虐杀

“批斗”对象的狂潮。不但打死卞仲耘校长之事无形中得到默许，又不知多少校长、教师死于他们曾经精心教育、呵护的学生之手。当然“文革”的冤魂决不止于教育界。

尽管可以说，当时的“红卫兵”千千万，在“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鼓励下，做出丧失理性之事何止一人，这是特殊历史背景的产物，不必苛求个人责任，特别是少不更事的青少年。但是当年北京师大附中的特殊性就在于卞仲耘校长是全国第一个被本校红卫兵群殴至死的校长，那第一拨兴起的红卫兵是以“血统论”为基础的。他们之所以成为“好汉”就因为老子是“英雄”。宋彬彬本人当时是否直接参与，我本人没有考证，也无意讨论她的个人责任，应该说她本人及其同伴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受害者。但是她是该校红卫兵的领袖，当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更重要的是她在此以后得到了领袖的接见和鼓励。宋彬彬女士个人的心路历程我无从知晓。她后来放弃了“要武”之名，看来并不以此为荣。作为个人，在那以后的道路各自有所不同，但参与残害无辜的经历终归是一段耻辱，无法以后来的任何“光辉业绩”抹杀。稍有良知的人总会良心不安。至于这批人中有些后来又经过曲折的命运然后再飞黄腾达，那是高层政治斗争的结果，与千百万被剥夺健康成长的机会的同代知青属于两个世界。个人的良心道德千差万别，无法强求。这不是本文的主题，如果没有今之校庆事件，宋彬彬其人也不会进入公众视野。问题是师大附中（今之“实验中学”），几十年来总该培养出一些在各个方面有成就、对社会做出有益贡献的人才，为什么非要在此次隆重校庆中抬出这样一位“知名”校友？是趋炎附势，还是另有背景？如果此人确实在以后的年月中有正面的、特殊成就，为什么不突出那些成就而“哪壶不开提哪壶”，要高调突出其“文革”经历，展出那张象征性的照片？今天的校领导

对自己校史中那鲜血淋漓的一页,对被污辱、被残害致死的卞仲耘老校长,大而至于对整个中华民族所遭受的那场浩劫是如何对待的呢?

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尽管得了诺贝尔奖,最后还是以某种形式披露了早年不光彩的历史。对他最后的坦白,公众可以有不同的反应,或谴责其隐瞒太久,或欢迎其良心未泯,或原谅其年少无知,但没有人会认为那是值得宣扬的光荣事迹。德国曾出现过祸害人类的法西斯,但是德意志民族仍是有希望的优秀民族,正因为其从上到下有自省和忏悔精神,能从灾难的废墟中获得新生。

对于毛泽东的全面历史功过可以有不同评价,恐怕要争论一百年。但是对他发动的“文革”,党中央早已做出否定的结论,其祸国殃民,特别是对青少年灵魂的摧残,现在尚健在的五十岁以上的人都有切身体会。那张著名的照片,以及“赐名”之事,正是有象征意义的见证。联系到长期以来,在不论是宣传还是教育中对“文革”的历史多所回避,而或隐或现为“文革”翻案之风却此伏彼起,最近甚至有人点名要为“四人帮”翻案,鼓吹需要再来一次“文革”。这些立论的根据一部分是谎言,掩盖或歪曲历史事实;一部分是利用当前存在的社会弊病,完全否定改革开放,因而对无知青年和普通百姓有相当的欺骗性。众所周知,昔之北京师大附中今之实验中学在北京享有特殊地位,师资、设备、生源都是一流的,一方面集中了高素质的优秀生,一方面也是权贵、富商子弟云集之处,其毕业生以后变成“知名”校友的机会也较大。正是这样一间学校,如此蔑视历史,挑战良知,不论校领导的主观意图如何,这次校庆所发生的事件客观上起了与为“文革”翻案风相配合的作用,因此不能等闲视之。如果一代高智商的青少年对于在他们父母师长辈身上所发生的历史真相都全然无知,被传授的都是谎言和颠倒的荣辱是非观,我国教育将走向何方?

最近又见消息称:教育部规定在九年义务教育的音乐课程中增加京剧以弘扬国粹,先在少数学校试点,然后准备全国铺开。而选定的15个剧目中有近一半是“文革”样板戏“选段。姑不论强制全国青少年学京剧之不足取,这八个“样板戏”恰好是当年新老文化传统一概被铲除,文化专制导致文化荒芜的象征。对我们说来全国人民被迫

学唱样板戏与语录歌的记忆犹新,那是怎样的灾难岁月?记得一位老文化人说过,他们一听样板戏就联想起“文革”中挨斗受辱,备受摧残的经历,为之不寒而栗。以此来弘扬传统文化岂不是南辕北辙?如今选剧目者在如此丰富的京剧艺术中偏偏对“样板戏”情有独钟,更加令人忧虑,不知方今掌握文化教育权力的当政者自己对中国文化有多少知识,对当代历史如何认识,让青少年接受什么样的熏陶?

小至个人,大至整个民族,只有能正视历史,有反省的勇气,才有光明的前途。因此面对这事件和这股歪风,我心有所忧,心有所危,为下一代,也为民族前途。了解历史,更应了解当代史。

与其讪笑他人癖疥之疾,不如关注自己心腹之患。
(鼠年初一于芳古园陋室)



2008年第5期目录

书屋讲坛	为民族唤魂 改革的而立之年	任剑涛 曹东勃
学界新论	迷失在主义的丛林中 ——知识分子们如何相互误解 自由派的门槛 ——和秦晖先生商榷	郭宇宽 周泽雄
灯下随笔	人间笔记(一) 幽默与药 每周工作四小时	王溢嘉 李静 艾华
说长论短	救人手段爱人心 始作俑与始料不及	刘诚龙 范若丁
流年碎影	谁唱江南断肠曲 当时只受声名累 ——龚芝麓与顾媚	山谷 王鹤
人物春秋	权贵资本的鼻祖 市井有谁知国士 1949年日记中的叶圣陶	柳士同 黄波 王涛
书屋品茗	阳春几曲和亦难 文坛俊杰亦师友 ——文讲所学习生活琐忆 杜拉斯之后,我们该读什么?——“兄弟文化”总编辑 周实与法国当代女性作家的对话	云风扬 王成启 周实等
裁书刀下	关于《庄子奥义》引起的巨大争议	张远山
思史佚篇	与“偏房”共天下 卡廷:一个永恒的历史伤痛	吴钧 哈米

邮发代号: 42-150 月刊 每月6日出版 定价: 5.00元
地址: 长沙市韶山北路443号《书屋》杂志 邮编: 410007
电话: 0731-5791300 5486812 传真: 0731-5790197
邮箱: nlh5314@263.net

继承北大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的遗产

李忠 叶向忠 马旬 杨卫和

2008年1月11日是蔡元培先生诞辰140周年,5月4日是北京大学校庆110周年。在两个纪念日之际,我们建国前在北京大学就读的许多老校友,缅怀蔡校长对北京大学的丰功伟绩。今天,我们要把北京大学建设成为国内外一流大学,应当发扬蔡元培先生倡导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蔡元培出掌北大

1916年9月,北京黎元洪政府的教育总长范源濂给在法国考察欧洲教育的蔡元培先生发电报,请蔡先生回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是前清翰林,留学欧洲,富有学术修养和民主精神,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的骨干会员,参加辛亥革命,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建立时,曾任教育总长,对旧制度教育进行过改革。蔡先生接到电报后对是否回国就任曾有两种考虑,一方面顾虑在北洋军阀统治下,改革北大困难重重;另一方面考虑,北京正需要传播民主革命思想,培养人才。在孙中山先生劝导之下,他毅然决定回国就任。1916年12月回国,1917年1月就任校长,首先对大学定性,他给大学下了定义“大学也者,研究学问之机关”;“大学生,当以研究学识为天责,不应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的阶梯”。蔡先生认为:“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他赞成《礼记》、《中庸》说:“万物并育并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鲜明地提出了“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主张,对不同学派实行百家争鸣。北大改革千头万绪,文科改革摆在首位,文科学长

期缺人,需要一位有学识、在思想教育界有威望的人士来担任。为了聘请一位思想新颖的文科学长,他请教汤尔和先生和沈尹默教授,两人都推荐陈独秀,并以陈独秀在上海编辑出版的十本《新青年》相赠,称赞陈独秀是在“青年中最有影响的指导者”。陈独秀参加过辛亥革命、反袁世凯的“二次革命”,是一位激进的民主革命者,1915年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一年之后改为《新青年》,以民主、科学为旗帜,向传统的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宣战。蔡元培认识他,很快接受了汤、沈的建议,亲自三次到前门外一家旅馆登门拜会,聘请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同时聘请李大钊为北大图书馆长,不久又聘请了胡适、刘半农、周作人、马叙伦、陈垣、鲁迅等到北大任教,汇同原已在北大任教的钱玄同、沈尹默、王星拱等,文科教师焕然一新。在法科、理科,聘请了马寅初、陶孟和、王世杰、周鲠生、夏元栗、李四光、丁燮林、何杰、翁文颢、丁文江、朱家骅、李书华等名流,一时名师荟萃,人才济济。对校内领导体制、系科设置、课程内容各方面进行了改革,推行教授治校和教授会制度,实行思想、学术、言论、出版、结社自由,支持师生组织社团、出版刊物、探讨真理。当时建立的著名社团有哲学研究会、新闻研究会、道德会、地质研究会、少年中国学会、平民教育讲演团等。在这种教育方针指导之下,北大很快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一扫过去暮气沉沉、万马齐喑的旧局面,出现了名流云集、学派林立、人才辈出、鸢飞鱼跃,蓬蓬勃勃,生气盎然的新景象。

在蔡校长支持下,随着陈独秀来北大,《新青年》编辑部也迁到北大,它的编辑、作者群体主要



出自北大师生。陈独秀、李大钊、张申府在 1918 年创办了《每周评论》。邓中夏、许德珩、周炳霖创办《国民》。傅斯年、罗家伦创办了《新潮》。他们大力宣传新文化，使北京大学很快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新文化运动提出两大口号：民主和科学。它提倡民主，反对独裁；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盲从；提倡个性解放，反对封建礼教；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实行文学革命。胡适首先提出《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接着提出《文学革命论》，蔡元培赞成推广白话文运动，撰文称：“白话派一定占优胜”。他们推广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成为中国语文的主要表达方式，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受惠于广大人民的深远影响，对在广大人民中普及文化和新思想起到了巨大作用。

新文化运动对中国封建传统文化进行了坚定、勇猛的冲击，有力地打击和动摇了中国两千多年以来封建思想的正统地位，对广大中国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和青年进行了一次民主和科学的洗礼，打开了新思想、新文化的大门，形成了中国一场空前未有的思想启蒙运动，是一场空前深刻、生气勃勃的思想解放运动。

蔡元培在五四运动中

1919 年 5 月，以北京大学师生为先锋的北京青年学生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五四爱国运动。

1919 年上半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协约国召开了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在会上提出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撤走外国在中国的军队和巡警，归还租界，撤销中日签订的“二十一条”及换文等正义要求。这些要求在和会上都遭到拒绝。在讨

论德国殖民地问题时，中国代表提出战前德国在山东攫取的各项特殊利益均应归还中国，而日本竟然提出它在大战期间强占德国在胶州湾的租界地、胶济铁路以及德国在山东的其他权益应该无条件地让给日本，英、法、美三国竟完全支持日本的无理要求，出席会议的中方代表提出抗议，而北洋军阀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壓力，竟准备在这个丧权辱国的和约上签字。

5 月 2 日，蔡元培校长将这一消息告诉北大学生许德珩、罗家伦、段锡朋、傅斯年等。消息传来，引起各阶层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强烈愤怒。5 月 3 日晚，北大一千多名学生和北京十几所学校的学生代表，在北大三院法科礼堂开会，商讨进行抗议的活动。当场决定联合各界一致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行径，通电巴黎和谈代表坚持不要在和约上签字，通电各省市在 5 月 7 日举行游行示威，定于 5 月 4 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推傅斯年、许德珩等 20 人组织。5 月 4 日下午，北京大学十三所大中专学校的学生三千多人到天安门前集会，傅斯年是游行总指挥，许德珩在大会上宣读宣言。散发了由罗家伦起草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集会群众高呼“外争国权，内除国贼”、“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诛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輿”，强烈要求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接着，游行前往

东交民巷日本驻华使馆抗议，被军警阻挠，游行队伍转奔东单赵家楼胡同的曹汝霖住宅，在愤怒之下冲入曹宅，没有找到曹汝霖，痛打了正在曹家的章宗祥，火烧了曹宅。游行队伍遭受到军警镇压，北大许德珩等 32 位学生被捕。5 月 5 日，北京市大中专学生 25000 人实行罢课。5 月 6 日北京市中等以上学校联合会成立，要求释放被捕学生。

5 月 6 日蔡元培校长亲自到教育部、警察所，对被捕学生保释营救。北京的爱国运动迅速得到全国各地学生的声援和社会舆论的支持。5 月 7 日被捕学生被放，蔡元培校长率领北大教职员、学生在沙滩广场集会迎接。北洋军阀虽然释放了被捕学生，但对学生的正义要求却置之不理，而且逼迫爱护学生的北大校长蔡元培离校，下令禁止学生干预政治，扬言要严厉镇压学生的爱国行动。5 月 19 日，北京学联发动总罢课，6 月 1 日，北洋军阀政府连下两道命令，一是表彰被学生斥为卖国贼的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另一道是取缔学生的一切爱国行动，这更加激起学生的愤怒，在北京学联领导和号召下，6 月 3 日、4 日、5 日，几千名大中学生走向街头演讲抗议，有 870 名学生被捕。在高压之下，学生不屈服，继续坚强斗争，6 月 6 日有多达 5000 人上街抗议。

北京的爱国学生运动一直受北京各大学爱国教授，特别是北大的爱国教授的支持和鼓励，陈独秀、李大钊等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同许多社团组织和进步学生密切联系，积极指导、推动运动的发展，成为五四运动的著名领袖人物。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报告称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在斗争的关键时刻，6 月 11 日，陈独秀、高一涵到前门外新世界游艺场，向市民散发他们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声称：“中国民族乃酷爱和平之民族，今虽备受内外不可忍受之压迫，仍本斯旨于政府提出最后最低之要求如下：一、对日外交不抛弃山东经济上之权利，并取消民国四年、七年两次密约；二、免除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六人官职，并驱逐出京；三、取消步兵统领及警备司令两机关；四、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五、市民须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我市民仍希望和平方法达此目的，倘政府不顾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

学生商人劳工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特此宣告，敬求内外人士谅解斯旨。”会场上立刻轰动，群情激愤。陈独秀被逮捕，监禁了三个月。

上海工人从 6 月 5 日起举行罢工，全国工人相继支持。迫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压力，特别是工人的罢工压力，北洋军阀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于 6 月上旬释放被捕学生，宣布罢免曹、章、陆等。在巴黎和约签字的前一天，6 月 27 日，旅法华工、留学生、华侨数百人找到中国和谈总代表陆征祥，要求拒签和约。第二天，中国代表没有出席巴黎和约的签字仪式，爱国五四运动的要求获得了胜利。

北大成为传播马列主义和中共建立的根据地

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和蔡元培先生的支持下，北大成为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根据地。

李大钊是最早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先行者，他主张向俄国十月革命学习。1918 年，他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阐述了俄国十月革命与法国 1789 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本质区别，强调俄罗斯十月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之革命，是世界新文明的曙光。接着又发表《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 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赞扬十月革命是世界历史的潮流。1919 年 10 和 11 月，李大钊分两期在《新青年》上刊登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在此期间，《新青年》、《每周评论》、《民国日报》、《建设》等期刊共发表了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章达 200 多篇，其中很大部分是马克思、恩格斯论著的译文，掀起了介绍社会主义新思想的高潮。陈独秀在《新青年》第 9 卷第 3 号《社会主义批判》一文中，回答了为什么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走哪种社会主义道路。他说：“在生产方面废除了资本私有和生产过剩，在分配方面废除了剩余价值，才可以救济现代经济的危机和社会不安的状况。这就是我们所以要讲社会主义之动机。”“中国不但有讲社会主义的可能，而且有急于讲社会主义的必

要”。

在北京最早建立的马克思主义学术团体是李大钊倡导的。他于1920年3月在北大建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开始是秘密组织,为了扩大影响,1921年10月决定公开。经蔡元培校长批准,1921年11月17日在《北大日刊》上刊登了成立启事,发起人是北大学生邓中夏、罗章龙、高君宇、何孟雄、朱务善等19人。蔡校长批准在西斋拨给他们二间房作为活动场所,成立之日并亲自到会致词祝贺。成立后报名参加者很踊跃,1922年2月达到63人,后来发展到近200人。

毛泽东1918年从长沙到了北京,渴望在北京大学边学习,边工作。蔡元培从杨昌济、李大钊处得到信息,知道毛泽东是一位有见识、好学的青年和他的处境。毛泽东原来只想谋一个校工,蔡元培亲自安排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满足了毛泽东的愿望,不但解决了他的生活问题,还给他提供了一个结识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著名教授,在北大旁听,参加北大社团活动的机会。这为他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回到湖南长沙建立新民学会,筹建共产党组织奠定了思想基础。毛泽东在回忆中对蔡元培的这一帮助终身不忘;对陈独秀、李大钊对他的影响铭记在心中。

1920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8月在上海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李大钊听到这一消息后,先派张申府,后派张国焘到上海同陈独秀商议在北京建党的问题,得到陈的同意。张国焘在上海还向蔡元培校长报告了筹备在北京建党的情况,蔡元培明确表示赞成,蔡讲:“看来,中国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主义者要有作为,就应该赶快组织起来。”张申府、张国焘在八月底回京后,将情况向李大钊汇报,三人在9月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北京小组,11月改称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

上海、北京建立党组织之后,在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前,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在武汉,毛泽东、何叔衡在长沙、王烬美、邓恩铭在济南,谭平山、谭植棠在广州,都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张申府在北京入党后到巴黎,在巴黎建立旅欧支部。王效廷、黄文一在《北大校史上光辉的一页》一文中讲:“中共一大

前,在8个地方建立了党组织,共有党员53人。其中6个地方党组织中的负责人都是北大的老师和校友,53名党员中有北大21人(包括当时在校入党的师生11人和在北大学习、工作过已离校的校友10人),约占党员总数的40%。参加中共一大代表12人,有北大的学生和校友4人,占1/3。加上陈独秀指派的一名代表包惠僧共13人中,有北大的学生和校友5人,占代表总数的38.5%。从这几个数字可以看出北大在建党时期的重要地位和重大作用。北大在建党过程中作出了突出贡献。(《战斗的足迹——北大地下党有关史料简编》第632页)。

蔡元培的教育思想泽被后世

从以上对北大校史的简要回顾中可以看出,蔡元培先生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对北京大学的发展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他在北京大学推行的教育方针最重要的是贯彻兼容并包、思想自由。蔡元培主张大学应当是独立和自主的,应当具有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而这种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需要有相应的自由的社会政治环境,这是他总结了国内外大学的办学经验得出的正确结论。(见蔡元培1919年6月15日《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

1929年6月北京大学正式复校之后,蒋梦麟先生任北大校长。蒋先生继续贯彻蔡元培先生倡导的教育思想和方针,聘请李四光、江泽涵、丁文江、汤用彤、钱端升、周炳琳、马叙伦等一批著名教授,并聘请年轻教师傅斯年、许德珩、侯外庐、千家驹到北大讲课。蒋先生贯彻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实行学术民主,提倡爱国、民主、科学,亲自规定马克思的《资本论》是经济系的必修课,提倡和实行校内的思想、言论、结社、出版的自由,支持师生的爱国抗日救亡运动,使北大在1937年“七七事变”前成为全国文、理、法的著名学府和一二·九爱国民主学运动的坚强阵地,并为党和国家培养了一批杰出骨干。

抗日战争爆发后,北京大学同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迁到长沙,后移到昆明,建立了西南联合大学。蒋梦麟先生为三个主任委员之一,同梅贻

琦、张伯苓先生共同商定继续坚持蔡元培先生的办学方针，坚持学术独立、思想民主、对不同学派兼容并包，校方不干预师生的政治思想，支持师生的抗日爱国民主活动。在这一方针的贯彻下，作为大后方的最高学府，集中了全国文、理、法、工的许多著名教授，为国家培养了闻名世界和国内的著名科学家——杨振宁、李政道、邓稼先、朱光亚等。为国家



造就了一大批科技尖端人才。据 1995 年统计，西南联大师生被评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共有 153 人。在社会科学方面，1955 年选出的 54 名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中，联大教授就有 11 名。西南联大发扬了五四、一二·九爱国民主学生运动的优良传统，高举民主、科学的大旗，坚持爱国、民主、抗日，成为大后方的“民主堡垒”。冯友兰教授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中赞称：“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楷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

1946 年 6 月西南联大结束，三校迁回平津复校。北京大学迁回北平复校，由胡适担任校长。当时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在美国的支持下，实行独裁、内战，叫嚣“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公然撕毁政协决议，向解放区发动全面内战。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这种倒行逆施，受到了要求独立、民主、和平的广大青年和人民的反对，为了控制北京大学师生的爱国民主活动，蒋介石派国民党青年部长陈雪屏到北京大学当训导长，在校内组建国民党区党部、三青团、进行各种阴谋活动，挑拨学生团结，阻挠学生的爱国民主活动。具有五四、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光荣传统，长期受蔡元培、蒋梦麟倡导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熏陶，富有民主、科学精神的北大师生当然不能不奋起斗

争，保卫思想、学术、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保卫师生的民主权利。1946 年 11 月一开学，许德珩教授在《社会学》开讲时，就大声疾呼：“我是蔡元培先生的学生，坚决保卫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传统。我是五四运动的参加者，我继续高举民主、科学的大旗，反对蒋介石的独裁、内战。”五四运动的老战士、国民党著名人士钱端升、周炳琳教授多次在集会中声言：北大师生一定要高举民主科学大旗，发扬北大蔡元培先生的光荣传统，捍卫思想自由、政治民主。在广大北大师生的斗争下，胡适校长一再重申，坚持蔡元培校长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延请了不同学派的教授自由开课，保障校内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阻止军警到校内捕人。由于北大师生的坚决斗争，保卫了北大的光荣传统，不同学派的教授自由讲课，允许校外自由旁听，校园里呈现了蔡元培当校长时期的情景：进步社团纷纷建立，壁报贴满校园，课堂内外讨论、辩论，师生共同斥责内战、专制、独裁、贪污、腐化，追求民主，探讨真理的欣欣向荣的景象，使北大成为解放战争时期全国爱国民主运动的坚强阵地。1946 年底，北大校园里喊出了“驻华美军滚出中国去”，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抗议美军暴行的全国大游行。1947 年 5 月 20 日，北大同北平、上海、南京、天津等大城市的学生一起举行了“反内战、反饥饿”全国大游行，开辟了第二条战线，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

促进了全国革命形势的高涨,迎接了北平的解放和新中国的诞生。

思想文化是一定的社会经济形态的产物,有相对的独立性,有它自身的产生、发展、消亡的自然过程。世界上有 180 多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不同;在一个国家内、民族、地区不同,因此文化意识形态是多元的。文化、艺术、学术、不同学派,相互争论,相互渗透,正确的发展,错误的淘汰,其发展有一个复杂的扬弃过程。历史上凡是以权势压制,以行政命令禁止、打击取缔学派者,都是不成功的。这种错误作法,不利于文化、艺术、思想理论的发展。

苏俄共产党执政后,由于没有实行言论、出版的自由,以权势、行政命令禁止、取缔不同的学派,不仅障碍理论、学术的发展,而且最后落到共产党丢权,苏联解体。我们在建国的头二十多年,效法苏联共产党,同样没有实行言论、出版自由,以权势压制不同学派,以行政命令取缔了社会学、政治学,发生过胡风案、反右派、反右倾、吴晗案、文化大革命等严重错误,究其原因,都是没有正确对待意识形态问题,没有平等地按照意识形态的发展规律办事,犯了左倾的严重错误。这是沉痛的历史教训。国内外的历史实践证明,蔡元培主张对文化思想采取学术民主、百家争鸣、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是正确的。

实践证明,没有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不可能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曾经担任过多年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陆定一同志在平反之后的晚年,在 20 世纪 80 年代,总结了苏联和我们的经验教训,赞成蔡元培先生倡导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一个好方针,认真执行将使我国受益无穷,不执行就会吃亏。听了李四光的地质学说,我国由无油国变成了有油国,不用马寅初对人口的意见吃了亏,都是例证。”他讲:“争取人类的自由解放,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个核心价值部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其革命和建设的最终目标,就是要实现人的自由和社会及自然的和谐发展。共产主义社会的本质,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这是在《共产党宣言》中早已被界定了的。”社会主义,是在一切社会的、科学技术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会。我们应该吸

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对社会发展,对人类文明,应当继承发展。这个继承,是在兼收并容基础上批判地吸收和继承;这个发展,是在人类文明的基础上的创新和发展。(见陆德:《陆定一晚年的几点反思》刊登在《炎黄春秋》2007 第 4 期)从陆定一上述讲话,可以看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不仅是繁荣文化、科学的方针,而且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方针。

温家宝总理 2006 年 11 月 13 日在《同文学家艺术家谈心》第二部分讲:繁荣文学艺术要解放思想,贯彻双百方针。他强调双百方针是党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和文艺事业发展的基本方针。贯彻这一方针,对于建设和谐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进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实行双百方针,“就是要保障学术自由和创作自由,鼓励解放思想、提倡兼收并蓄,尊重客观规律,为探索真理,勇于创新,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和学术土壤。他总结国内外历史经验,指出:“判断学术上是非得失和艺术的优劣高下,都不能靠行政命令,而要靠艰苦的学术探索,艺术实践和民主讨论,最终由实践、历史和人民来检验和批判。实行双百方针就是要鼓励创新。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也是社会发展的源泉和动力。创新与解放思想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思想解放是因,创新是果。创新的源泉和本质是独立思维、解放思想。离开解放思想就不可能创新。倡导创新,就必须首先解放思想。人类的思想史、科技史、文化史、艺术史以至整个社会发展史早已充分证明,一切新的思想、新的理论、新的发明、新的创造,它的产生、发展和完善,都需要思想解放作为必要条件。”

2007 年 4 月 28 日,北大许智宏校长在北大校友会上作了报告,介绍近几年北大的巨大发展,要开展多项工作,迎接北大建校 110 周年。他强调把北京大学办成世界一流大学,应当贯彻和发扬蔡元培老校长倡导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在场的三百多老校友热烈鼓掌,表示支持和赞成。我们许多北大老校友相信在蔡元培先生倡导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指导下,在广大师生努力下,北京大学一定会与时俱进,越办越好,早日把北京大学建设成为站在国内外前列的世界一流大学。(责任编辑 赵友慈)

怀念爸爸李斌

李静

沧海桑田，世事如烟。我们亲爱的爸爸——李斌离开人世已经整整四十一年了。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他在一个男人一生中智慧最充沛，经验最丰富，最应该生活得自如，事业大有作为的年华，却在倏忽间成了党内斗争的牺牲品。为了不陷害同志，不制造混乱，不连累家人和对得起良心，他在混沌的1967年初春，断然以结束自己年仅51岁的生命为代价，退出了那个混沌的政治舞台。假如他还活着，如今应该是九十多岁的幸福老者，他会看到中国的发展与强盛，而这正是他作为新中国经济界第一代领导人呕心沥血，孜孜以求的目标。亲爱的爸爸，要是您活到今天，那该有多好啊。

投笔从戎的高才生

爸爸李斌原名李绶宝，安徽合肥市人。1938年2月，在燃遍全国的抗日烽火中，爸爸不顾南京金陵大学对他这名机电系高材生三番五次的挽留，毅然投笔从戎奔赴皖西，以国民党皖西地区货物检查处长身份作掩护，秘密为新四军筹集军费，机智地从过手的税款中抽取一部分送到新四军部队。被国民党察觉后，他逃脱通缉追捕，将所有在管的货款全部带回新四军江北指挥部。1939年3月爸爸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0年春，日军向淮南津浦路东地区大肆“扫荡”。爸爸奉新四军二师罗炳辉师长的命令赶赴被日寇四面包围的淮阴、淮安、宝应一带建立



李斌

抗日政权和武装力量。如今的淮宝县就是由那时成立的抗日联防办事处而来，爸爸是办事处主任，也就是县长。淮宝县东临宝邳湖，西靠洪泽湖，南濒淮河，境内小河纵横，稻田密布，盛产稻米，是淮北“粮仓”。开辟淮宝地区就打通了华北八路军与华中新四军的汇合之路，扫清了八路军主力向苏北进军的障碍。爸爸领导群众减租减息，筹集军粮，团结争取开明的村绅乡贤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迅速发展和壮大了抗日根据地。1941年初，日军对淮北进行了连续33天的大扫荡，爸爸领导抗日武装和群众反扫荡。他有勇有谋，在分析了淮宝

地区处于日伪军几部分敌人的接合部是个薄弱环节后他果断出击，率县独立团成功伏击了高良涧出动之敌，然后乘胜追击，全歼闯入岔河的日伪军，成功保卫了根据地。此时的爸爸已经从一介书生迅速成长为英姿飒爽的抗日将领。爸爸的这些故事在淮安地区党史和中共党史中都可以找得到。

由于爸爸是从南京金陵大学走出来的高才生，新四军非常缺乏这样的知识人才。虽然他所学专业是机电，却并不妨碍他为了党的需要而将金融、经济和财贸类专业从头学起，并迅速成为内行。从抗日战争开始，党就委派他做经济和财政工作，为大军筹集粮食、药品、武器和金钱。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岁月里，爸爸担任过皖东北行署粮食局局长、淮宝县县长、苏皖地区工商局局长等职务，为党和党的武装提供了尽可能好

的物资保障。上了年纪的人应该还记得当时风靡中国的电影《南征北战》、《51号兵站》和《东进序曲》，里边就有爸爸和他的同志们的身影。

1946年，爸爸担任华中财经干校校长。这一年国民党撕毁国共协定，大举进攻解放区。为了保住解放区宝贵的经济人才，爸爸受命率领大批财经干部从苏北撤到山东。不料国民党又向山东解放区猖狂进攻，特别是在胶东施行了残酷的梳篦政策，以十路纵队的密集队形，由西向东扫荡。爸爸在威海和烟台之间组织船只，护送这批干部向旅顺和大连转移。这时威海已经被国民党军队四面合围，爸爸随时都可能牺牲。他临危不惧，镇定指挥，直到所有人员都撤退到了东海边的石岛，他才在敌人的四面夹击下趁夜突围与大部队汇合。

奋战在经济战线上

淮海战役打响后，爸爸受华东局委派任豫苏皖边区七专署专员，参与解放战争中规模空前巨大的后勤保障工作。他日以继夜地辛劳，组织运输队和担架队，紧紧跟随突击前进的部队，送弹药，送给养，出色完成了支前任务。1949年4月南京解放，爸爸在刘伯承任主任的南京市军管会班子里担任金融贸易部部长。他深入调查研究，多次邀请地下党的同志和工商界人士开座谈会，摸清南京工商业的情况且留意从中总结和提出一些方针政策性的意见，为接管和改造国民党政府的银行和商业机构，掌握粮食、药品、布匹棉纱等重要物资，打击投机倒把和囤积居奇，筹建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支机构等工作中殚精竭虑，废寝忘食，几次因疲劳过度昏倒在办公室里。

建国以后，爸爸历任西南财经委员会秘书长、国家计委城市建设计划局局长、国家建委副主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等建设新中国的重要职位，担负城市基本建设的重任。1953年我国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开始了。城市基本建设在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上艰难起步。经验缺乏，装备陈旧，技术人员严重不足，建筑材料品种少产能低，现代工业基本上就是一张白纸……面对山一般重重的困难，爸爸和他的同志们一腔报国和建国的热血澎湃。在这一群年轻的领导者面前，困难反倒

成了他们接受挑战的巨大动力。爸爸日以继夜地工作，一面深入实际调查，一面刻苦钻研业务。我们只记得那时的爸爸和他身边的伯伯叔叔们虽然每天都非常辛劳，却个个干劲十足，兴致盎然，就连对我们小孩子都常常谈笑风生。等长大了我们才懂得，这就叫做为理想而工作，这才是真正的身心舒畅。

那时不少基建单位对占用农田和拆迁民房毫不在乎，爸爸几次陪同邓小平同志视察西北数省时都察觉了这一情况。根据邓小平指示，从我们国家人多地少，一穷二白的实际情况出发，爸爸提出“节约用电、少拆民房，标准不要过高，定额不要太大”的建设性意见，受到中央重视并被采纳。这也许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征地和拆迁提出的战略性意见。

1958年中央机关抽调精兵强将支援地方。爸爸被调任四川省副省长、西南协作区副主任。虽然此时我们全家已在北京百万庄申区中央机关舒适的大院里安家了多年，但爸爸二话不说就带着全家去了四川。西南局成立后，爸爸任经委主任、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委员。就这样爸爸在国家的经济和金融领导岗位上兢兢业业地埋头苦干了30多年，要不是那场所谓的“史无前例”，爸爸一定会在这个他擅长并热爱的岗位上痛痛快快地干到再也干不动为止。对他来说那将是多么辉煌的人生！

“你们要永远记住，你们的爸爸决不是反革命”

然而命运是无法抗拒的。1966年夏，那场极为荒诞的“文化革命”开始了。8月，一群身穿绿军装的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趾高气扬地跑到西南局大院来“革命串联”，气势汹汹要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西南局的高级干部会上，他们手举“红宝书”，大喊大叫地朝台上的爸爸冲去。这帮在别处都“全无敌”的年轻人没想到在这里碰到了对手。没有人号召也没有人组织，西南局机关的干部们迅速而沉默地手挽起手肩靠起肩，一道厚厚的人墙刹那间就立了起来。他们将爸爸死死围在中间，坚决不允许有人侵犯他们的李主任。后来还是爸爸说服了干部们，自己走出

圈外。那些蛮横的后生们看到众怒难犯，撇下“走资派”自己倒先撤了。

因为造反派把西南局所有的办公室都占领了，正常的经济工作根本无法开展。但是再革命也得吃饭，生产的事总得有人来管。爸爸就在这样的环境中，不得不经常把干部们叫到自己家里开会，研究生产计划。有一次，大姐李昭从学校回到家，一推门迎面是一大屋子人，那是爸爸的又一次工作会议。大姐因为刚在学校被人骂做“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狗崽子”，正气不打一处来，头脑一热就冲着爸爸大喊大叫“你都被打倒了，还在这里开什么破会……！”从来是最宠爱大姐的爸爸脸色陡变，用从未有过的愤怒指着大姐怒吼：“你给我滚出去！这是我的工作！滚出去!!!”现在已经60多岁的大姐每当回忆起这一幕都禁不住愧悔的泪水。

如果只是文革初期的混乱，爸爸还是有足够的能力和经验来对付的。然而命运在他50岁上开了一个荒唐苦涩不堪的玩笑。文革一开始爸爸就被指定为西南局文化革命委员会领导小组副组长，所有来到成都，来到西南局串联，造反，外调，揪斗的团体、帮派、个人都由爸爸去面对，去应付。在这个艰难而荒诞的位置上，像很多知识分子出身的高级干部一样，他很快就在这场既无谓又肮脏的所谓“文化革命”中迷失了，然而高度的党性又使他不能不硬着头皮工作，很快他就陷入了对运动的怀疑和对党的高度忠诚这个极度冲突的漩涡中无法自拔。1966年11月，例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爸爸作为唯一的西南局负责人到会。会上林彪代表中央向全体到会人员宣布当时任西南局书记的李井泉为三反分子。但紧接着又说“这句话只在这个会议上说，不要传达，这句话消灭了。”爸爸完全蒙了，这样的事情中央岂能开这么大的玩笑？回到四川他非常苦恼，百思不得其解。他问妈妈怎么理解？怎么办？如果传达，整个四川省以至西南地区必定大乱，既违背了林彪“不传达”的指示又因为还没有给李井泉同志通气而陷入不仁不义的境地；如果不传达，红卫兵很快也会知道这种事情在当时太多了，中央再绝密的会第二天会议内容就上大字报了），那可就是李斌封锁党中央的声音，欺上瞒下，和三反分子李井泉同流合污。爸爸没有参

加过延安整风之类的党内政治斗争，不知道在这样的政治是非场中每分钟都会出现变数。他忐忑不安，身心俱疲。终于，“李井泉就是三反分子，是李斌封锁了党中央的声音”的滔天罪名两个月后还是落在了他的头上，接下来就是我们永远都不愿意再回忆起来的批斗会，爸爸那与生俱来，高贵的，作为人的尊严在泥淖中被践踏。在理想和现实，良心和潮流的残酷碰撞中爸爸累极了，也惶恐极了。这个可以和日寇血拼，可以和国民党肉搏的战士，当他面对的都是同志时却傻了。像中国历史上许许多多骨子里还是文人的将领一样，他们可以在真正的战场上纵横驰骋，叱咤风云，却往往在和平时期残酷的政治厮杀中成了弱者。在清白与肮脏，抗争与苟且之间，他们常常选择前者，而这是需要以付出生命为代价的。我们勇敢的爸爸，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没有传达那个似是而非的所谓“中央精神”，他对妈妈说的最后的话，其中有一句就是——“看来我和李井泉是划不清界限了”；我们可怜的爸爸，这个金陵大学的高才生，他什么都懂却不懂变通，不懂作假，不懂推诿，不懂陷害……这些政治场上的惯技他统统不会。这个只知道“整工作”，不知道“整人”的人，这个只知道工作和困难会“整”他，不知道还有“自己的同志”也要“整”他的人，爸爸，爸爸，你怎么挣扎得出来？

1967年3月17日，这是我们全家刻骨铭心的凶日。爸爸就在这一天永远的走了。在这短短的4个月里，他承受了多大的压力，遭遇了多大的恐惧，忍受了多大的屈辱，凡是过来人都知道，那是怎么形容都不会过分的。

爸爸的死是我们五姐弟终身难忘的痛。四十一年前那个痛彻心腑的夜晚更是我永远的噩梦。1967年2月，爸爸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整晚整晚睡不着觉。我就要返校，去向他告别。爸爸一而再再而三地拉住我的手，想让我“再坐五分钟”，“再坐五分钟”。一贯粗心的我，此时也看到了爸爸眼里盈盈的泪光。我至今一个字也不曾忘掉爸爸说的最后几句话：“我过去做了许多好事，也犯过不少错误，现在造反派说我是反革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们要永远记住，你们的爸爸决不是反革命！共产党我是跟定了，毛主席我也跟定了。要我，我跟，不要我，我爬也爬在后

面跟。”我跨进列车的一刹那，心脏好像突然被一只巨手猛击了一拳，疼出了一身冷汗。我难受得要命，只想呕吐，突然就痛哭起来。一个列车员好心地上前询问，我却浑身颤抖说不出一个字来。我预感到怕是再也见不到爸爸了。果然，20天后预感成了现实，那封晴天霹雳般的电报至今还被保留着，却从来不敢拿出来再看。我们都相信就在我在火车上痛哭的同时爸爸的心也在痛哭。他那时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他是在向亲爱的孩子做最后的诀别啊。爸爸！

爸爸的外号叫“问不倒”

爸爸爱读书，和很多党内外高级知识分子是好朋友。孙冶方伯伯、李人俊叔叔都是他最好的朋友。爸爸的头脑里随时装着各种数据，不论是上级、同事还是我们小孩子，谁问到什么问题，他都能用数字清晰地回答，大家因此给他取了个外号叫“问不倒”。爸爸从不耍小聪明，总是那么勤奋，那么努力。他说头脑身体都不能偷懒，否则就会聪明反被聪明误了。1956年，中央提出在民用建筑的设计上要提倡经济而实用，在可能的条件下尽量讲求美观。爸爸当时分管城市基本建设。他翻阅大量的建筑书籍，对具体的设计方案进行反复的研究和修改，力争做到实用、美观又节约。对设计人员他总是悄悄地鼓励：“别怕，尽管放手干，我支持你。”在“一五”期间，为了节约木材，国家决定推广混凝土轨枕。爸爸深入基层，研究和寻求木枕、防腐木枕和混凝土轨枕的大量数据作为分析对比的科学依据。他广泛地宣传推广，终于实现了西南数省枕木混凝土化。爸爸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有一个解放初期从美国回来的化学家对人说：“我从美国回来，一点也不了解共产党，我接触的第一个共产党高级干部就是李副部长，他平易近人，尊重知识，我就是从他身上开始认识共产党的。”1960年中央决定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由四川省生产印刷用纸供应数省的需要。当时的造纸原料尤其是化工原料十分紧张。爸爸组织力量回收大量的废纸，在那个天灾人祸最剧烈的年代不仅超额完成了任务，还从此建立起了一整套“节约资源，变废为宝”的机构和制度，有些甚至沿用至今。就在这段时期爸

爸敏锐地发现四川的经济已经严重比例失调，钢铁和煤炭指标都定得过高，农业受到轻视。爸爸提出必须有科学的经济观，农轻重，积累和消费，必须按比例发展，注重平衡。在编制1959年计划时，爸爸和计委的同志们熬更守夜，亲自计算和整理出大量资料作为依据。他坚决主张降低钢铁和煤炭指标，缩短基本建设战线，搞好综合平衡。他再三说要实事求是，不平衡就是不平衡，比例失调就是比例失调，我们不能回避问题。有的人有顾虑，不敢讲老实话，怕犯“右倾错误”，怕当“算账派”。爸爸却说做经济工作就必须按经济规律办事，否则就会给国家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他一笔一笔的给干部们算细账，用数据说话，使大家真正从思想上认识了“三高五风（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和‘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的危害。在参与《工业七十条》的制定和试行时，爸爸特别留意工矿企业的管理制度。他到重庆水轮机厂、重庆钢铁厂、花果山煤矿、重庆杨家坪机器厂蹲点，常常是会议一结束便直接回工厂而不是去机关。他从不凭听来的第二、三手材料向中央和西南局汇报，而是凭着坚实的数据说话。他严谨细致，对信口开河深恶痛绝，特别讨厌“大概、可能、差不多”这类模棱两可，不负责任的汇报。爸爸一直认为干部要懂技术，熟悉生产流程，掌握生产规律，他在大会小会上都不断地强调这一点。爸爸的书架上堆满了各种专业书籍，《统计学》、《车工知识》、《电焊入门》、《建筑工程预算定额》，五花八门什么都有，他甚至一直跑到车间和工人们一起干活以了解工艺流程。爸爸一直认为外行领导不了内行，要尽快变外行为内行才谈得上领导生产。这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是多么的不容易啊。

那时孙冶方伯伯，李人俊叔叔也在北京，他们都在新中国经济建设的第一线，孙伯伯是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李叔叔是石油工业部副部长，爸爸是国家经委副主任。他们三个人都正当壮年，对新中国充满信心，大家又志同道合，聚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爸爸常常对人说孙冶方是共产党的大学问家。孙伯伯在50年代就提出了利润理论，是中国最早提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家。为坚持自己的观点，他不惜丢官被斗，文革中曾在秦城监狱坐牢7年。在孙冶方（下转74页）

托派老人刘平梅

段跃

一位气质高贵的老人

2007年11月9日傍晚，我接到黄先生从香港打来的长途，他告诉我，刘平梅老人在昨天的晚上故去了。黄先生是刘平梅的女婿，消息不会有错；而一年多以前我已得知，刘平梅患上老年痴呆症，记忆全失，生活不能自理，恐怕不久于人世了。对他的过世，应该说我有心理准备。然而，那一天，电话中传来的消息依然令我感到意外，面对电话，竟无语。

我第一次听到刘平梅这个名字，是在2000年采访上海的托派老人熊安东时。从熊安东老人口述中，我获知关于刘平梅的三个信息。

首先，他是信仰托洛茨基主义的中国人中，在1952年以后被处以无期徒刑者之一。第二，他是少数坚持不认罪、态度强硬者之一。第三，他在被释放后曾经从银行里取出他在上海青浦劳改农场7年的积蓄，但没有取走利息，理由是，利息是剥削来的，分文不能取。三件事联系起来，足以使我对这位老人产生好奇，我设法去采访他。

熊老先生说他已多年没和刘平梅联系了，他推荐我去找上海的另一位托派老人周履锵。不久周履锵老人给我回信，说刘平梅同意接受我的采访，并随信寄来一张便条，是刘平梅亲手画的地图。为了减少我的寻找之累，刘平梅把他家的住址以及乘车路线一一绘出、标明，地图画得非常仔细，字迹清秀，位置明确。虽未见面，我已感受到老人的慈祥与细腻了。

2006年4月，我终于来到广州，依图索骥，在一条老街上找到了刘平梅的住处。他给我开门的时候，动作有些缓慢，我可以透过防盗门近距离观察到他：满头白发，面部轮廓清晰，神情平

和，动作从容；一袭浅色居家便装，整洁朴素。观察所得，我对这位老人的第一个印象是：超凡脱俗，气质高贵。

在以后7天的采访中，每天我都和他谈4个小时左右。像以往的采访一样，谈话以他为主，我只是倾听，偶尔提些问题，或确认他提到的人名、地名。口述时，他使用普通话，语速缓慢，时而夹带出广东口音。与我所采访的其他托派老人一样，他出口成章，思路清楚。可以想象，他在风华正茂之年，曾经才华出众。

托派路线忠实的奉行者

刘平梅1920年出生，他的祖籍在广东中山，其家族是当地一个破落的地主。父亲很早就到上海去做生意，所以他是在上海出生的。出生一年后即回到广东。学龄期曾在上海读过一年小学，此后，他的生命故事几乎都发生在广东一带。

他加入中国托派组织的时候正在读高中师范。他在初中时已读过很多书，先是无政府主义的文学作品，然后是马克思和托洛茨基的著作。他在回忆参加托派的过程时说：“一天我的老师高擎宇对我说：‘我已参加了共产主义同盟，为中国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他问我是否愿意参加。我回答，‘这样的大事，让我考虑三天后答复你’。三天后，当我把决定告知高擎宇后，高擎宇带我去见黄静波。黄静波向我讲述了共产主义同盟的历史，组织系统，及党员应该遵守的纪律。我表示愿意参加组织，服从组织纪律。自此我就成为共产主义同盟的党员。那时我还不知道共产主义同盟是托洛茨基派，也不知道托派和共产党有什么不同。后来我逐渐知道了托派的革命路线、政策、战略与策略。自此，我就忠实地奉行托派的革命

路线。”

那一年是1938年，刘平梅18岁，自此一直到底，他没有放弃过这个信仰。

刘平梅加入托派后更加热情地投入到广东中山县青年战时服务团的抗战工作中。1937年他就和他的老师、同学们一起成立了服务团，其主要工作是，向民众宣传抗日，抵制日货，帮助前线士兵写家书，组织战场救护等活动。一年多后青年服务团被当地政府强行解散，他和同志们散发了一份“告中山民众书”，提出：“人民有集会结社自由，抗日自由，反对镇压抗日的群众团体。”为此他遭到政府通缉，东躲西藏，潜行于广东、澳门与香港之间。期间他冒着危险继续在青年学生与工人中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他也经历了托派组织内部的分裂和整顿。1941年初，他总算把工作稳定在香港一家印钞票的工厂里。

1941年12月8日，日军攻占香港九龙，18日从湾仔到筲箕湾分4个地方向香港岛登陆。刘平梅一家及工友们避难的茅屋遭到登陆日军的搜查，老弱病残被放走，青壮年男工被留下，他亲眼看到一些人被捆起来带走，一些人当场被砍死。他也没有逃脱砍头的厄运，他说：“日军举起刀就向我砍来，我用左手一挡，刀把我左手砍伤，我站不稳，倒在地上，日军用指挥刀从我颈后插进去，刀在颈骨上发出沙、沙的声音，血涌流出来，淋到我脸上，血是暖暖的，我还没有感到疼痛就昏过去了。”他醒来后，日军已经退去，他被当作死人丢在一片死寂中。在历尽一系列生命的冒险之后，他终于从屠刀下捡回一条性命。他说，他的头几乎被砍下来，刀入最深处离颈动脉只有一指之遥，如果再多用一点力，脑袋就掉了。

我用相机拍下了他的伤痕：臂上一处，颈上两处，刀痕深深凹陷。

抗日战争胜利后，刘平梅拖着伤病的身体在广东、广西一带做工、教书，同时宣传托洛茨基主义思想。期间经常因国民党政府的通缉、追捕颠沛流离，生活贫困不堪。

“我不是反革命，托派不是反革命”

1949年新政权建立前夕，广州托派组织几乎瘫痪，他出面主持这个时期广州托派的工作。

他在生活艰难、政治环境紧张的压力下，设法维持广州托派组织的活动。当时的所谓组织活动，无非是在青年学生和工人中恢复读书会，讨论形势，学习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著作。刘平梅的想法是，“在组织处于低潮的时候应该有人出面担当责任”。他说，“从那时开始，我做好了准备，早晚有一天我会被捕”。

1952年12月22日，他回家吃过冬至饭，然后返回学校宿舍。那天晚上他在学校宿舍被捕了。刘平梅的前妻也是托派，我采访她时，她讲述了那天晚上家里发生的事情：她正在家中带孩子睡觉，孩子当时还不足三个月。有人敲门，她打开门，几个公安人员闯进门，用枪对着她说，你被捕了。她问：孩子怎么办？回答：抱着，一起走。刘平梅回忆：“几天后，我在牢房里听到婴儿的哭声，我听出那是我女儿的哭声”。“这时我明白了，我的妻子和女儿也在这里”。

在采访的第三天，刘平梅拿出一份判决书来。判决书共两页，是那种印有红色竖格的、很软、很薄的纸，纸已经发黄，字是用蓝色钢笔手写的，很多字迹已经模糊。抬头写着：“广州市人民法院判决书，市字第476号”。判决书简要地历数了刘平梅的三个罪状。末尾处写道：托匪刘平梅“捕后无悔改表现应予严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特此判决罪犯刘平梅无期徒刑”。落款处印有广州市人民法院的大红印。时间是1954年。据刘平梅回忆，他收到这份判决书的时间已是1956年。

老人向我一一说明了三个罪状的不实之处。他回忆，审判期间没有经过任何取证、申诉、辩护等法律程序，只是在收到判决书后，公安人员曾对他说：如果你不服此判决，可以继续上诉。刘平梅没有上诉，他说“我心中已经明白，这个罪不是针对我一个人的，是对整个托派的。”从被捕那天起，不论是审判还是谈话，刘平梅都没有认过罪，他反复重申一句话：“我不是反革命，托派不是反革命。”

从1952年到1979年的27年中，他因为认罪态度不好，思想顽固，受过刑具之痛、重刑关押之苦。他的妻子也因此被判刑10年，他的妻子告诉我：“出狱后我看到孩子生活得太困难了，我提出离婚”。刘平梅说：对于离婚，就像当年等待被



2006年4月刘平梅在家中

捕一样，我早有思想准备。

文革期间，他又作为不思悔改的典型，在监狱中被批斗。根据熊安东和王国龙老人的回忆，文革中监狱里有三个托派被拉出来批斗，郑超麟、蒋振东和刘平梅。蒋振东被强迫跪在地上，刘平梅也被强迫下跪过。

1972年，监狱在押的托派们暂时被安置在上海郊区的劳改农场管制。据说毛泽东开恩下了指示，要对这批人宽大释放，因为尚在文革中，社会秩序混乱，即做此处理。就在那一次，别人都走了，唯独把刘平梅一个人丢在监狱。他被送到上海郊区青浦劳改农场的的时间比别人晚了很长时间。原因是他不认罪，态度强硬。

1979年，在劳改农场管制的托派们被正式释放，每人收到一份裁定书。刘平梅的裁定书全文如下：

“刘平梅，男，五十九岁，广东省中山县人。因反革命罪，于一九五四年被广州市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在服刑期间，有悔改表现，已于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三十日宽大释放，现决定给予公民权。”

时间，一九七九年六月五日，
印章，“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刘平梅回忆，当他接到裁定书后即找到管理人员，他说：“你们有没有搞错？我不是反革命，托派不是反革命，我没有认罪，没有悔改。你们可要想好，如果一定要认罪才释放我，我宁愿回到监

狱。”大概管理人员把他的态度向上级做了汇报。第二天答复他说：上级的意思是“不论态度如何，一律释放”。

刘平梅的女儿回忆道：“1979年，公安局的几个人找到我，动员我把父亲接回来，我想，既然政府都给他出路，我怎么能不给他出路呢？”

从出生三个月，女儿就离开了父亲，12岁之前她曾和祖母一起探监见过父亲两次，以后父女俩再没有见过面。她对父亲的记忆除了因反革命家属而备受社会歧视，生活异常艰辛外，就是听奶奶说：“你的爸爸是个好人。”1979年，她已28岁，她拿不准自己是否能够认出父亲。她是带着公安局提供的一张照片去上海接父亲的。

“我不会因为中国共产党的胜利而改变我的信仰”

回到广州后，刘平梅开始了他对中国托派史的研究工作，在他的房间，几只高大的书柜，排满书籍。他说，那几年他的生活费除了吃饭都买书了。我浏览一番，书约在千册以上。可分为三类，一类是马恩列和托洛茨基的原著；一类是中共党史、俄共党史、国际共运史；另一类是有关托派的理论、历史资料，包括六十年代出版的供批判用的内部读物灰皮书。我问他，那些灰皮书很珍贵，怎么搞到的？他说，都是在旧书摊上一点一点淘来的。

在他的晚年，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研究中国革命史。2003年，他的《中国托派史》在香港出版。他说：“唐宝林先生的《中国托派史》，我们是不满意的。我想，不满意不如自己也写一本，用我们所掌握的事实说话。”在我结束采访的几个月后，他把这本书寄给了我。客观地说，这部《中国托派史》作为史书，还有许多缺陷，其学术价值也有待商榷，但是作为非专业学者，能做到此，谈何容易！何况这部《中国托派史》在一些史料和史实的掌握发掘上也有新的进展，对研究中共党史和托派史具有参考价值。

他在总结自己人生经历时说：“我决不后悔，在信仰问题上，我的思想一直是稳定的。”

我问他：“据说中共胜利后，中国托派在思想上发生了混乱，你当时有什么想法？”他说：“这个事情，主要在香港，而不是在大陆。大陆的托派，在当时的最大问题是生存，是怎样在新政权下立足；香港的托派确实比较集中地思考托派本身的问题。”就个人而言“我不会因为中国共产党的胜利而改变我的信仰。”

我又问：“判无期徒刑时，怕吗？”他说：“不怕！这个准备早就有了，加入托派的时候就准备好要为革命牺牲。”我问：“当时的革命目标是推翻国民党政权，现在推翻了，而逮捕你的，不是国民党是共产党。”他笑了一下说：“是呀，没想到，最终，我坐了共产党的牢，这一点我没有想到，想错了，没有想到会是共产党。”

我问他：“苏联的解体，是否意味着社会主义理想的破灭？你的信仰没有因此而动摇吗？”他说：“没有，这是托洛茨基早就料到的。苏联问题的主要教训是党的专制，党本身变质了。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不是一两次革命能够成功的，要有多次的斗争，要不断革命。”

我问他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看法，他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对的，但中国实行的无产阶级专政是错的。因为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都是自己同志之间斗，是群众斗群众，方向错了。无产阶级专政应该是对敌人的专政。但在中国成了党内的派系斗争，成了文革的武斗。”

结束采访的那一天，我在街上买来一大捧鲜花送给他，他看到花，脸上绽开童稚般的笑容，那个笑容令人感动，我不由地想起他对自己名字的解释：“刘平梅这个名字，是我参加托派后自己改

的，我喜欢梅花，因为它高傲、耐寒，有坚强的品格；最初我想用‘铁梅’二字，又觉‘铁’字太硬，就改为‘平梅’了，取‘和平’、‘平和’之意。”

我和刘平梅老人相处的时间虽然只有7天，我却和他一起穿行于他85年生命的往事中，受益匪浅。我有幸与这样一位陌生而传奇的老人相识，记录他生命的轨迹，被感动，并产生深深的敬意。

我相信，老人走的时候，一定是带着遗憾的。因为，在我们中国，法制还没有足够强大的力量来维护个人，尤其是持不同政见者的信仰自由、思想自由；我们的政治文明还迟迟不得前行，所以在老人活着的日子里，听不到一个郑重的声音：“托派不是反革命，你们不是反革命！”

我相信，老人走的时候，一定是从容而坦荡的。因为就个人良心而言，他不会留下明末清初士大夫吴梅村式的万古惭愧。在他从1952年至今的55年中，不论遭遇怎样的处境，他都没有停止过作为一个生命的申辩：“我不是反革命，托派不是反革命！”

思其人，悲其遇，感其志。尽管我和刘平梅老人之间的信仰不同，政见不一，作为生命，他永远值得我去尊重。如果抛开特定历史环境，对刘平梅老人选择信仰和坚持信仰的方式还有重新审视的空间，但万变不离其宗的是：尊重个人的信仰，确保个人思想的自由，却是我们永远要坚守，要捍卫的原则，我期待着那个时刻的到来。

作者近期从老人女儿处获悉，根据刘平梅生前遗嘱，他的遗体已捐献给广州市中山医科大学，用于教学。（责任编辑 萧 徐）

（上接76页）他的鼻子走向悬崖。这就突显出一个重大课题，在政治改革中，一把手更需要制衡和分权，更需要“灌水”和“拍砖”，这不是对谁的不敬，而正是其尊严所在。

人们常说，监督难就难在上级太远、同级太软、下级不敢，但就白刚而言，作为省纪检委书记，监督起一把手来来既不远、也不软，但面对一把手平哲种种悖逆原则的行为，曾在国民党监狱和右派改造流放地誓死不屈的白刚，竟囿于长期缺乏党内民主的僵硬框框，在斗争中难以放开手脚，似乎有许多明规则和潜规则捆绑着他，动作失据就会授人以柄、自我倾覆，起码会被

认为是“破坏团结”。他的监督意志难以到位，内心十分痛苦，包括那位年事已高、世事洞明的徐书记，明知不对也只能“圆通”行事，不见锋芒。读这本书没有廉价的快乐，但体会人生的艰难。本书令人看到政治体制改革开步的必要性、紧迫性和起步的艰难性。作者白石虽已年届八旬，但笔力纵横。由于他在省纪检委书记岗位上博弈多年，积累深厚，在他笔下的高官们，语态、心计各有鲜明个性，在文学创作中最难摆布的会议场面，也写得色彩纷呈、活灵活现。读罢掩卷沉思，如是种种，在现实生活里不都似曾相识吗？

（责任编辑 赵友慈）

“带病提拔”症结何在

谷 翔

“带病提拔”这个词，是近些年才出现的一个新词汇。它的意思并不是说提拔了身体不健康的人，而是指提拔了在德才方面都有问题，甚至有严重问题的人。比如，对一些贪腐分子(即有病患者)不仅未能按党纪国法予以查处，反而提拔升迁，予以重用了。“带病提拔”这个词好像几年前首先出现在中共中央组织部一份关于对干部提拔任用的管理条例的文件中。这是因为近些年来，随着党内和社会上贪污腐败风气的蔓延发展，“买官”“卖官”的市场也在党内党外出现了。这种市场，对我党一贯以来“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和“德才兼备”的选拔干部的标准，产生了极大冲击。许多地方或许多单位，在对任用干部的选拔上虽也履行了考察、调查、公示乃至民意测评等程序，但几乎成了形式，只是作作样子。而真正起决定作用的并非被考察者的“德”或“才”条件如何，而是他们能给对提拔有直接或间接有决定权的人，提供多少钞票或多大经济利益！这就是“买官”和“卖官”。这样一来，想当官或想升官者，不论他们的德和才的条件是否够格，甚至是个严重的贪腐分子，即患有严重的“疾病”者，往往也会照常被任用，被提拔，甚至破格重用！因此，近些年来，党中央、中组部在许多会议上，在许多文件中，都把杜绝和严防“带病重用”，作为一个必须严肃对待的重大原则问题提出来了。

令人意外的恶性蔓延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尽管近些年来，党中央、中组部以及国家人事部门，对严防“带病提拔”问题，下了很大决心，三令五申，而“带病提拔”的现象，不仅没有减少，却反而发展得更严重了；不仅基层有，上层乃至高层也有；不仅企事业

单位有，党政机关也有；不仅经济或文化系统有，司法、纪检系统也有。

笔者近十年中走得比较多的一个省，有人提供了该省的一个不完整的数字，近十年来，这个省先后被提拔的地(市)和厅局以上领导干部近三百名，其中有经济问题、有生活作风问题(主要是包二奶)的竟占到一半以上！其中，由于为省上大官(包括其亲属子女)牟私利作出过贡献并还在继续作贡献的就有近百人！还有一个特征是：不论是一个地区还是一个单位，只要主要领导(特别是一把手)是个贪官或是个掌握人事大权的贪官，那这个单位选拔任用干部的实际标准就是贪腐能力如何，是对他牟私利的虔诚度如何，等等。凡是这些地区或单位的贪官不是成“伙”就是成“窝”；凡是这些地区或单位的纪检监察部门、组织人事部门的职能也变了：由对贪腐行为的监督变成了庇护，变成了保护伞。我所熟悉的那个省在前几年的情况就是这样，省委的组织纪检部门，宣传系统的省报、广播电视单位，省司法系统的公安、检察、法院等单位，以及信访部门等等，几乎多数被省的“一把手”的亲信所掌控，以致于这位“一把手”十年来在这个省所做的大量严重违法乱纪的行为，被封锁得几乎滴水不漏，难以向上反映，以致于这位“一把手”敢于在调离该省前夕，同他的一位也将调离的“志同道合”的组织部长一起，私自突击提拔了40多名德才条件差而能效忠他们的人，成为厅局级的“高干”。此事虽在该省引起公愤，但由于通往北京的信息渠道，皆被“一把手”的亲信所把持，无法向上反映。而且，在被这些贪官把持的地区，经他们多年经营，不仅腐败者互相利用互相保护的机制已经形成，而且党风社会风气也向着有利于贪腐势力阶层转变。诸如：“贪官有能耐有本事”、“举报者是

傻子”、“被打击报复是自找的”等等这类混淆是非的流言蜚语，在这个省的许多地方颇为流行。就在这个省的一个省辖市，原来的一个前任市长后是市委书记的人，受到该市一位副局级的共产党员的举报，虽由于得到中央一位领导同志的支持，而受到省纪检委的调查，发现该市委书记的问题确实严重，正准备采取进一步审查措施时，该省的一把手竟公然出面阻挡，把这个面目真相已暴露的贪官，搞成省一级的领导干部！于是，这个贪官又继续把那位举报者的官职免了。然而，这位铁骨铮铮的共产党员，继续坚持举报，终于中纪委出面调查，现已把这个贪官送交司法机关。按道理，原市委书记的贪腐罪责被查处后，因举报而被错误撤职的副局长的职务应该恢复，却迟迟无人过问，直到中纪委有人出面说话了，才勉强同意恢复。可是却不想让他回原单位，提出的理由竟然是“爱举报的人是不安定因素”；更令人可气又可笑的是，这位举报者官复原职后即送市委党校学习，学员们一致推选他当学习班长，可是党校领导竟不敢同意，理由是“不敢重用爱举报的人”。

透过窗口看究竟

这个窗口，就是那个省的一个城市。这个城市，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到今年初的十几年时间里，出现了一位“从小贪到大贪，从小官到大官”的被“带病提拔”的著名人物：他是从中央机关的一个副处长的岗位上，下放到这个城市中心的一个区当区委书记的。他在这次下放后的工作安排中，初显了他善于钻营的能耐。不长的时间，他就与当地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八大金刚”结为团伙，滥用职权，以“国企改革”的名义把国有资产无偿交给那帮团伙去糟蹋，自己也私吞了四百多万巨资。就在这位区委书记贪腐“政绩”堪称显赫的时候，却被晋升为市委常委、副市长了。就在他晋升后不久，他当区委书记时一手提拔的一个区检察长的杀妻案发生了，而且还进一步暴露了这个区检察长的官位是花15万元向这位贪官买来的。就在这位人物贪贿嫖赌等新问题不断暴露的同时，还暴露了一起令人发指的事件：还在他当区委书记期间，区法院一司法人员向省上写信

举报区法院院长和区委书记贪赃枉法的问题，他竟然勒令区公检法机关把写举报信者打入冤狱，对此新闻媒体通过调查，在公开和内部报道中都先后揭露曝光了，中央领导也要求对事件主要责任人“严肃查处”，可是“查处”的结果，他却又被晋升为市长、市委书记！

这位贪腐分子的“带病提拔”并未到此为止。就在这个贪官从小贪到大贪，其官位也随之从区委书记到副市长、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之后，手中权力愈来愈大了，胡作非为的胆量也愈来愈大了：他不但要求全市各县区各部门必须以高薪聘用他的老婆当法律顾问（年收入达数百万元），而且他还可以不顾企业职工的死活，强行把一个又一个好端端的可以持续生产的工厂，让他的“八大金刚”和他的老婆，勾结开发商，拆厂建房搞房地产；他甚至还把价值近两亿的一个区的党政机关的房产和数十亩土地，仅以五千来万元的低价“转让”给中央一位部级官员的儿子搞开发，转手就让那位公子赚到过亿巨资。也许就是这些堪称已是大贪官的“新政绩”，又让他的官位晋升了一大步：在全国各省换届前，他竟成了那个省的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候选人！此消息一传出，那个省就像发生了大地震！反对声、责骂声响彻全省。尽管如此，这位大贪官，只是到了另一个省，还是当上了省高级人民法院的院长！

这样一个可以说已经“病入膏肓”的贪腐分子，不仅是一般的“带病提拔”，而是“病”愈重，提拔得愈快，“病”愈大，晋升的官位愈高，为什么？问题究竟在哪里？还是透过这个窗口来看看吧！

中国工人出版社不久前出版了一本《检察官手册》，是一位资深检察官长期从事反贪腐斗争经验的总结和论述。他在这本著作中提出了我国近些年来虽然反贪腐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但有一些地区由于权力失控，由于对权力的监督体制失效，使贪腐势力得到恶性发展，从而变成了贪污腐败的灾区或重灾区。而在这些灾区或重灾区，一个突出的象征就是“买官”“卖官”的市场几乎公开化了，“带病提拔”比比皆是。这些现象在我长期考察的那个省和那个城市，几乎全都存在。不过最突出的有以下几点：其一，上层领导大权为“一把手”为首的贪官团伙所把持；其二，对权力的监督体制已基本失效或失灵；其三，贪腐

势力互相保护互相支持的网络机制也已基本形成。在这里,不仅“带病提拔”比比皆是,而且到了“无病难提”、“无钱难上”的严重地步。

具体分析这个城市那个区委书记“小贪变大贪”的案例,有这样几个直接原因:一是,当事者善于钻营,他从北京某高级机关下放前,就巴结上了一个亲如父子式的高官,他正是依靠这个高官,在自己因犯错而下放的情况下,谋得了一个区委书记的好官位;而且还靠这位高官疏通了同省上“一把手”的关系。二是,对省上“一把手”的拉拢卓有成效:他一面抓住与“一把手”的“老校友”关系作文章,一面滥用职权,利用城市财政的资金、人力、技术等资源,到“一把手”的家乡,为“一把手”的弟弟搞项目,办企业。三是,他又利用北京那个高官,为庇护“一把手”及其团伙的违法乱纪的贪腐行为出力服务;四是,不断滥用手中的权力,把过亿的国有资产奉送给北京高官的儿子,让那个高官也分享了他的贪腐成果;这样,这个贪官,就把北京高官和省上的“一把手”拉上自己的船,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了。这样,这位贪官,就给自己打造了两把特别有力的保护伞:一把是对官位有决定晋升大权的“当地的一把手”,另一把是北京高官。正是在这两把“保护伞”的保护下,这个贪官,才能在小贪变大贪的同时,也由小官成了大官,由一个县处级的区委书记,仅仅十年左右时间,就成了亿万富翁,同时也成了一个副省级的省高级人民法院的院长了。

失去监督的权力真可怕

应该说,不论党内党外,大多数党员和干部群众,对包括“带病提拔”在内的贪污腐败行为是恨之入骨的。也应该说,近若干年来,我们党领导的反腐败斗争也取得了很大成就,像成克杰、胡长清、田凤山、王武龙等“带病提拔”起来的大贪官,一个一个受到党纪国法的严厉查处之后,最近,那个显赫一时的上海大贪官陈良宇,在当区长、秘书长、副市长直到市长、市委书记时期的贪腐行为都按党纪国法清算查处了。但是也不得不面对的是,眼下,我们党内外的贪污腐败情况仍然十分严重,在干部选拔中的买官、卖官、“带病

提拔”情况也还十分严重。何故?简单地说,就是近些年来,许多地方党内党外的监督体制被大大削弱了,甚至失效了,失灵了!就以我们所透视的那个城市为例,那个市的纪检书记就是几年前花几十万元向省上那个“一把手”买来的;那些公检法司法机关和报刊电台等舆论机关的许多当权者,也都在贪腐势力的严密掌控之下。几年前,一个媒体记者通过秘密采访调查,揭露了那个区委书记打击迫害反腐斗士的情况和一个区检察长杀妻案的实情之后,省市领导是如何面对的呢?他们首先,一面通令全市各地区各单位,一律不准接待媒体记者采访,一面又让公安系统严禁中央某媒体入境,严禁干部群众外出上访,等等。随后,凡在这次反揭露、反监督中庇护贪腐分子有功者,几乎都得到了提拔。

大量事实表明,贪腐势力与反腐败正义力量之间的较量斗争,其焦点集中在加强监督与反对监督上。而反监督的目标,一是严控舆论媒体的采访报道,特别是严控揭露性、批评性的报道;另一是想设法削弱甚至企图瓦解反贪纪检机关的监督力度,甚至收买和拉拢反贪纪检的办案调查人员。这些,在那个省,都相继发生过数次,而且拉拢乃至收买的对象竟是北京的一个高层纪检机关!看来贪腐势力坚持搞“带病提拔”的用意,显然是为了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不断扩大自己的阵地呵! (责任编辑 吴思)

敬告读者

《炎黄春秋》2007年合订本已经出版,数量有限,有订购者请与我刊广告发行部联系。

另:我社2006年《炎黄春秋》合订本库存已全部售完,请不要再汇款,仅有2007年合订本,价格如下:

2007年精装 85元 简装 80元

2007年下半年(7-12期) 45元

注:以上均免收邮费

汇款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收款人:炎黄春秋杂志社

邮政编码:100045 电话:010-68532048

样板戏进课堂有感

王海光

前几天,友人来告,说是教育部要搞样板戏进中小学课堂了。笔者半信半疑地打开电视,果不其然,正播一群孩子咿咿呀呀学唱样板戏的镜头,唱的是《红灯记》选段,李铁梅的“都有一颗红亮的心”。这个场面,我们这些从“文革”过来的人可是再熟悉不过了,谁都有过那段大唱革命样板戏的经历。“文革”过去三十多年了,样板戏再度回到课堂上,抚今追昔,真还是有些感慨,更是有些诧异。

教育部关于“京剧进课程”的文件中说:“为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部决定将京剧纳入九年义务教育阶段音乐课程之中”,并指定了15首京剧经典唱段,先在部分省市试点。所指定的15首教学曲目,大都是“文革”中独行全国的“革命样板戏”。难怪社会舆论为之哗然。网上,“愚蠢的决定”,“不得人心”之类的斥声不断。看来出师不利。反对意见主要是两类。一是对京剧进课堂提出质疑:京剧能进,昆剧、豫剧、越剧及其他剧种为什么不进?戏剧能进,琴棋书画、四书五经、诸子百家为什么不进?其二,是对选用样板戏进课堂提出质疑,优秀的传统京剧剧目很多,为什么偏偏看好江青一手搞出的“革命样板戏”?反对者言之凿凿,并不无道理。

笔者认为,教育部此举,确有着贯彻十七大“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精神和弘扬“主旋律”相结合的考虑,积极表现之心可嘉。但是,“革命样板戏”并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是“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文化标识。八个“样板戏”从出台,到独霸文艺舞台的“一花独放”,记录着中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文化专制主义的发展史。所以,以行政手段在中小學生中推广“样板戏”,不但做法上是草率的,政治上也是孟浪的。于雷厉风行“贯彻”之中,似有把“助兴”变为

“添乱”的味道。

“革命样板戏”的出台,是上世纪六十年代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极“左”思潮发展的一个标志性产物。六十年代初,在文艺政策调整的背景下,戏剧舞台出演了一批优秀的新编历史剧。如孟超编写的昆剧《李慧娘》、田汉编写的京剧《谢瑶环》、吴晗编写的京剧《海瑞罢官》等。这些出自名家手笔的新编戏曲剧目,继承传统,“推陈出新”,堪称佳作。这些剧目表现了惩恶扬善的传统戏剧主题,受到广大观众欢迎,评论界誉声不断,但却被认为是涉嫌影射“大跃进”的现实。1963年12月12日、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接连发出两个批示,对文艺工作进行严厉批评,在文学艺术界开展了一场政治大批判。上述“李剧”、“谢剧”、“海剧”等一批优秀新编历史剧目,悉数成了这场大批判的反面典型,是为“文化革命”的滥觞。在文艺大批判的连天烽火中,不但优秀的古典传统剧目不能再登舞台,连改编历史剧和新编历史剧的做法也被尽数否定,大演京剧现代戏成为时代潮流。作为江青包办的大讲阶级斗争的革命文艺代表作,“革命样板戏”得以粉墨登场了。

“革命样板戏”的特点是“革命”,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反映了那个大搞“阶级斗争”时代的需要。在江青手里,样板戏的“革命”特点被发挥到极致。她不仅移花接木,利用特殊权力把别人的劳动成果据为己有,而且还对原主创人员、编导和演员加以迫害。通过搞样板戏的“功劳”,江青获得了指导“文化革命”的权威,开始露出“峥嵘”,在政治舞台上频频“亮相”。1965年,她组织搞出了对吴晗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剧的批判,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1966年4月,她与林彪合谋,炮制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提出了“文艺黑线专政论”,成为了发动“文

化大革命”的指导性理论。江青本人也因此戴上了“文化革命的旗手”的桂冠，成为祸乱天下的罪魁。

“革命样板戏”不仅迎合了大搞“阶级斗争”的需要，还成为了实施“文化专政”的一根棍子，是推行“文化专制主义”的一个强硬的政治符号。江青给样板戏规定了一套程式，即所谓从政治需要出发的“主题先行”，所谓突出正面人物、突出英雄人物、突出主要英雄人物的“三突出”。英雄人物必须是“高、大、全”，出场要“红、光、亮”，唱腔要高亢、激昂；反面人物则以“短、小、缺”，“蓝、阴、暗”来衬托。这套脸谱化、概念化的艺术表现程式，在“文革”的意识形态中，成为无产阶级新文艺创作的金科玉律。不仅奉为圭臬，推行到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其他的艺术表现方式俱被一概否决，“假、大、空”充斥于世；而且视为“禁脔”，定为“天条”，不允许有丝毫的触动和冒犯。无论各地方的演出，还是其他剧种的移植，对样板戏的一招一式，一言一行，都得原样照搬。稍有不同，就是破坏样板戏的“阶级斗争”。一些创作新剧目的企图，更是被视为对抗样板戏的图谋不轨。因“破坏”样板戏而遭到迫害的人士不计其数。在样板戏大行其道的年代，给我们留下了一段铭心刻骨的记忆。记得前几年曾有一个老作家著文说，一听到电台里播的《红灯记》中李铁梅《仇恨入心要发芽》的高尖唱腔，他就会想到批斗和牛棚岁月，神经就受不了。“文革”十年浩劫，伤及上亿人。闻样板戏之声，触“文革”受难之境，情动而潸然泪下者，应是不乏其人。

当然，“革命样板戏”虽然出身有“左撇子”的问题，但毕竟是举倾国之力，集众多戏剧精英搞出来的，也还是有着较高的艺术水准。既有对传统艺术形式的套用，也有对现代艺术形式的借鉴。近来戏剧舞台上演出的一些样板戏的段子，受到不少群众的欢迎。电台和电视台也时有样板戏曲目的播出，说明还是有不小的受众群。但是，这很难说是传承了传统京剧文化的衣钵。试想，现在五六十岁的人，有几个接触过真正的古典传统戏剧？笔者对传统古典京剧的知识，只知道《四郎探母》是歌颂叛徒的，《游龙戏凤》是下流淫荡的，《恶虎村》是宣扬地主阶级走狗的。

在最需要文化滋养的成长时期，大家接受的都是大搞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文化，哪里知道传统文化为何物。在“文革”整个十年间，全国八亿人民的文化生活，颠来倒去，倒去颠来，反反复复，重重叠叠，就是这八个“革命样板戏”。在这种无微不至的大功率强行灌输中，我们的音乐细胞中，早已浸透了这些样板戏的音符。所谓“八亿人民八台戏，人人会唱样板戏”是也。时至今日，一谈起京戏，过来人哼出的总是几段样板戏。这与其说是对“革命样板戏”的喜好，不如说是一种怀旧情怀，一种生活的惯性作用，或者说，是当年长期“一花独放”的后续效应——再也不会别的东西了。

在文化生活丰富多彩的今天，人民群众的文化欣赏取向早已是多元化个性化了。土洋古现，酸甜咸辣，生旦净末丑，老虎狮子狗，可以各取所好。作为人民群众的文化喜好，样板戏的演出，在电视广播的播出，都是无可厚非的。这是人们文化选择的自由，谁也干涉不着。但是，作为一项政府行为，将学唱“革命样板戏”纳入九年义务教育体系，则是一种在我们的孩子中强行灌输的做法，是让他们从小接受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洗礼，实在大为不妥。在这里，可以试析一下他们的决策思路：弘扬传统文化，即发扬国粹；京剧是国粹，即发展京剧文化；革命样板戏是革命京剧，即要重点继承；继承要后继有人，即要从孩子抓起；从孩子抓起，即要教育灌输；要教育灌输，即要行政干预，于是，就纳入九年义务教育体系，就有了京剧样板戏进课堂。虽然，“京剧进课程”只是某些官员拍脑袋的产物，实践上注定是行不通的。但当下一些官员价值观念的混乱，历史常识的匮乏，行为方式的陈旧，也由此可见一斑。有道是“时过境迁”，须“与时俱进”。唐人刘禹锡有诗云：“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毕竟中国改革开放已有三十年，物是人非了。

笔者行笔至此，也许是头脑中的旧音乐细胞作祟，总是缭绕着《红灯记》中“都有一颗红亮的心”唱段的旋律。忽然间，一个怪念头闪现了出来：心“红”是因为流淌着生命，如果“亮”了出来，失去了生命的流动，那不就变成紫的了么？

（责任编辑 萧 徐）

经济发展随想三则

杜润生

农民在中国

一位领导同志说过：新中国是用了 3000 万人头换来的。由于通过乡村包围城市战略取得胜利，所以 3000 万人中农民占大多数。

国家转向经济建设时期，农民努力耕种，粮食产量由 3200 亿斤提高到 10000 亿斤，避免了从外国大量进口。农民认真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同一时段少生了 4 亿人口，减轻了人多压力。农民还创造出公有土地家庭承包体制，有助于全社会生活达到温饱水平，正向小康阶段挺进。农民已摆脱天高皇帝远，生死无人知的命运。可见 9 亿人力资源闲置不用是

大包袱，一经开发，潜力无限。

勤劳的农民面临人多地少的困难。

土地不能再生，人口可以转移。工业发展要求相互聚集，提高城市化水平，若城市人口的比重提高到 50%，形成人口转移，减少农民、富裕农民。

矿难

过去几年，发生多起矿难，死伤矿工多人。这些今天的矿工，就是昨天的农民。领导上曾主张有水快流，工人提着脑袋下矿，为了生计，不顾生死。

矿难，并非不可避免，只要认真去办，一定能办好，要争取一个好的开端。

能源问题

国家工业化，必须有充足的能源不断供应。我国资源缺乏，大庆之后再无重大油田发现，形成发展瓶颈。现在需要发展新能源，太阳能，潮汐能，风能，我国地形高山低谷，北风、西风、南风，连续不断，风能可作为优先选择，国外技术成熟，可以引进。

煤矿可作为后备资源。现在从国外购进能源，代价过高，不能持续，可增加若干核电站，从中掌握安全技术。据说，法国主要靠核电站推动经济运转，我们还可以在较大的规模上利用核能。

(上接 64 页) 研究中国经济现状过程中，李人俊给他送去很多部门的统计资料和数据，为他的市场经济理论提供了大批实证依据，李叔叔也因此 在文革中受到巨大的冲击。1965 年我们从李叔叔给爸爸的信中知道孙伯伯被调到郊区劳动去了，孩子们不明白爸爸常挂在嘴边的大学问家为什么不去做学问而去做农活。由于无法向孩子们解释，爸爸只能一味叹息，摇头，说“他可真是老天真！可他是真正的理论家，是真正的大学问家呀。”

爸爸尸体上的八件衣服

爸爸死前的一段日子非常苦闷，烟抽得很凶。爸爸妈妈的工资在那个年代算是很不少了，

但是为了能给我们多留一点钱，就在那样绝望的时刻他竟然改抽当时九分钱一包的香烟，这是事后弟弟李嵩和小川在他的衣袋里找到残留的烟盒才知道的。在爸爸去世的那个阴冷的下午，西南局那些可敬的叔叔阿姨们全然不顾将会受到什么样的牵连、谩骂甚至殴打，他们哭红了眼睛，喊哑了嗓子，一个个脱下自己御寒的大衣覆盖住爸爸的身体，一件、两件、三件……整整八件！他们这是想用带着自己体温的衣裳护住李主任尚未冷却的身体，拉回他尚未远去的灵魂呀。爸爸的司机谭叔叔难过得三天三夜吃不下睡不着，他泣不成声地对妈妈说：“我是再也遇不上这么好的首长了。”

(王晓林此文亦有贡献)

(责任编辑 赵友慈)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的文学史定位

鲁
煤

初读《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还不禁胆战心惊，忐忑不安，攒一把冷汗。这是它的特殊题材与主题所引发的。

书中的男主角白刚，少年时候参加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地下革命斗争，被捕入狱，在反动派严刑拷问下顽强不屈，表现出高尚的革命品德。蒙冤成“右派”后，在新中国的劳改农场服苦役，依然坚持实事求是，决不屈服“认罪”，同样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崇高品质。这同一位白刚，在新旧两个时代，经受两种社会制度的专政、镇压，前者来自真正的敌人，而后者却来自自己的党和国家的专政机关！伏案思之，怎不令人痛不欲生？而自己的专政机关在客观上竟变成反人民的工具，何其荒诞、可笑、可恨而可悲！

“文革”结束，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右派”及其他各种冤假错案得到平反。随之，一批表现“右派”苦难历程的优秀电影、文学作品涌现。但这些作品有局限性：有的主要靠艺术虚构创作，有艺术真实性，而没有史料、文献价值。有的是受难者的个人回忆录，有史料价值，但限于个案，视野狭窄，信息量小。鉴于此，作者白石、冯以平夫妇决心构筑宏伟工程：以白石十二年在劳改农场、十年在农村，和冯以平类似的亲历、亲见、亲闻、亲感为依据，多视角、全方位、全过程，立体化地、更大范围、更深程度展示这一段历史的悲惨与荒诞，给国人留下那个时代的真实证言，以便党和人民永远记取历史教训，促进思想解放，尽快完善以法治国的大业。但是，这是对长期以来不准写社会阴暗面的习惯势力的挑战，尤其表现公安、劳改机构的错误、阴暗面，更是极敏感的禁区，作者是要闯关冒险的。但作者认定，科学、全面的历史观，绝不可隐瞒我们国家的社会生活光明面背后的阴影与悲剧。于是他们运用自己拥有的最丰厚的资源，以在劳改中坚持真理、决不屈从的顽强意志，“十年磨一剑”胜利完成了这一部煌煌巨著，尽到了责无旁贷的神圣使命！

我和作者白石同志是解放战争年间华北联大文学系同学、老战友。自1948年睽别三十多年后，于1979年他为落实平反政策来京，我二人偶尔相会。我问他，是否需要找中央负责文艺界落实政策的领导人帮助解决，并调到北京来工作，我可代为向上反映。他表示还是回河北省去解决。1984年春又在京相会，知他已升任河北省委书记，我为他庆幸，但并未予以特别关注。而这次读此书，正沉溺于主人公血泪悲情中不能自拔时，忽然读到这一情节，我却马上感到“石破天惊”般震撼与狂喜。我从中感悟到进入新时期党的组织工作路线、干部政策彻底抛弃了过去的某些陈规陋俗，实现了180度大转变。第一，白石对各级领导强加给他的错误决定，从不认错，绝不奉行“组织服从”，而是抵制到底。而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党中央和河北省委的组织部门，不但不责难于他，反而连提四级——从副处级提到副部级，破格任用，近乎“一步登天”，这实是认同、赞扬、表彰他敢于坚持实事求是的共产党人的硬骨头精神了。

白石从劳改农场放出来后，又在农村劳改十年。他从小在农村最底层艰苦谋生的生产实践中，深感人民公社制度阻碍了农民生产生活的出路，认为允许农工商各业同时发展，才是唯一正确出路。他在刚平反后，在参加中科院召开的农业改革研究会上发言，大胆讲他对改革走向的科学预见，一鸣惊人！于是他被调到河北省委能参与高层决策的岗位上来。这最有力地彰显出，新时期的党中央和省委组织部求贤若渴，任人唯贤，决不再搞论资排辈、压制人才那老一套。

这是一本写从错误中汲取教训，走上正路、走向光明、走向辉煌的书。

一把手更需制衡

——读白石新作《上任以后》

肖 荻

如今，反腐败斗争力度不谓不大、斩获不谓不多。但，贪腐案件发生率居高不下，一些硕鼠巨贪的惊天大案此起彼伏，成为举国上下最大的内忧。在监督机制上，我们有党内监督、纪检监督、媒体监督、人大监督、政协监督、民主党派监督、群众来信监督……但，为何仍难强有力地遏止腐败呢？最近作家出版社出版白石的新作《上任以后》，以一系列起伏跌宕、扣人心弦的情节，对上述问题给出一个深层次的回答。

这本书里的主人公，依然是前卷《从囚徒到省委书记》里的白刚。不过他再也不是那位无辜被错划、被侮辱、被损害的老右，而是在“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光辉照耀下，党中央赏识白刚在农村改革上的真知灼见，不拘一格用人才，经省委严格审查和筛选，他被越级提拔任命为省委副书记、省纪检委书记，省委第五把手了。命运的铁锤强化了白刚俯首甘为孺子牛、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坚强、坚韧和坚定，在纪检岗位上面对腐败链里的魑魅魍魉，他具有疾恶如仇、洞烛其奸的冲击力。他的对立面倒也不是什么三头六臂的大人物，一个省辖市的市委书记官世通。此人身上有三件宝：“壮阳药、避孕套、上上签、佛光照”。他一贯滥用权力，贪财贪色，到处玩弄妇女，敢在路边车内野合鬼混，长期霸占女电话员，情妇争风门前厮打，臭名远扬，人送外号“大叫驴”。他拉帮结派，勾结黑白道构成横行霸道的腐败链，与奸商沆瀣一气借房地产开发狂吞暴敛。罪行暴露，为消灭罪证，设计杀人灭口，疯狂对抗检查。就是这样一个劣迹斑斑、臭名远扬、人人唾弃的败类，竟能边腐边升，即便兵临城下，也总能化险为夷，原因就在于他精通官场人脉的运做，在省委最高岗位上，拥有一堵抵挡正义审判的影壁墙、一把遮风挡雨的大黑伞！

《上任以后》打破了“大黑伞”总由“副书记”担当、一把手一旦归来漫天云雾散的老套路。滨海省省委一把手平哲，是一位习见不鲜的“权力迷恋狂”，在筛选信息上其特征是“选择性失聪”。白刚率纪检人员通过“三

贴近”掌握其亲信严重违法乱纪的铁证，他均不屑一看。相反，凡是官世通对白刚凭空捏造的诬告，他却视若珍宝，待人处事上实行赤裸裸的双重标准。他紧紧盯住白刚的莫须有的“问题”，但当白刚带领纪检、公安坚持深入查办坏人时，他则认为没必要，甚至勃然大怒。当官世通罪证如山无可辩驳时，他则质疑“你们没搞错吗？”“够了，不要说了，散布这些干什么？”“坏人要处理，但也要顾及省委的形象吗？”“省委会议上他垄断话语权。在“顾全大局”的神圣口号下，他巧舌如簧，硬把罪行累累的官世通从县级干部“一步到位”提到省级岗位上来，常委会上有异议，他则动用书记权威“就这样吧，散会！”最后他指使亲信来一个恶人先告状。如果不是中纪委及时分清是非，拿下罪行昭彰的官世通，曾因错划右派劳教，如今刚正不阿反腐败的白刚，就不仅是在反腐败斗争中被横生枝节左拦右挡，即便已难以叫你重尝铁窗滋味，也会微笑拍板逐你出局。有些一把手工作创新虽然常交白卷，但整起人来招法很是老道。白刚最后的艰难取胜，令人感慨万端。

这一系列尖锐复杂的冲突，悬念丛生，波谲云诡，紧张得使人透不过气来。作者的艺术提炼和概括，令人警醒：在我国政治生活中，一把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甚至“不怒而威”，人说“十个副省也顶不了一个正省”。但，大权独揽、缺乏制衡的权力是把双刃剑，可为善，也可为恶。高风亮节、公道正派的领导干部，可以发扬正气，为民造福。但，像本书中那位高高在上、惟我独尊的省委一把手平哲就是人民之祸了，一呼百诺的权力使他发生了可怕的异化，曾经在他们头脑中“闪存”的“这主义”、“那理想”，早已掏空，如今其生存意义100%就是“保住权力、养尊处优”。对己有利，坏蛋也是好人；对己不利，忠良也成叛逆，他亲小人远君子，爱则欲其生，恨则欲其死，全然情绪化行事。从表面上看，是平哲保护和指挥亲信官世通，从实质上看，为他谋私利、“知道他很多事”的官世通，也在牵着（下转 68 页）

朱元璋为何要把孟子清理出孔庙

陈虎

洪武五年(1372)的一天,对于亚圣孟子的神灵来说并不是一个安静的日子。这一天,盛怒之下的朱元璋,想把孟子的木主牌位从孔庙四配的位置上撤下来,取消他配享的待遇。这一事件的发生,不仅对孟子本人,而且对儒家的传统信仰均将产生极为强烈的冲击。要了解这一事件的原因,我们首先要弄清楚孔庙中四配的渊源。

四配的由来

旧时中国的孔庙(或称文庙),多以颜渊、曾参、子思、孟轲配祀孔子,其中颜渊、子思居孔子的右边,曾参、孟轲居孔子的左边,统称四配。孔庙的配享制度,与历史上孔子地位的不断提高有着密切的关系。但三国以前,在文献记载中还不见有孔门弟子的任何人配祀孔子。三国魏齐王正始二年(241)“春二月……使太常以太牢祭孔子于辟雍,以颜渊配”(《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孔子最得意弟子颜渊开始配祀。

一直到唐朝初年,孔庙中也一直只有颜回一人配祀。贞观二十一年(647),唐太宗诏令以自左丘明、子夏、公羊高至晋杜预、范宁等二十二人配享孔子庙中,配祀人员也是不固定的。总章元年(668),唐高宗命赠颜回太子少师、曾参少保称号。唐睿宗太极元年(712),加赠颜回为太子太师、曾参为太子太保,皆配享(以上见《新唐书·礼乐志五》)。孔庙中的配享者增加为颜渊、曾参二人。一直到唐玄宗时期,孔庙中的配祀方式才有了较为明确、具体地规定。玄宗开元二年(714),“司业李元榘上奏曰:‘先圣庙为十哲象,以先师颜子配,则配象当坐,今乃立侍。余弟子列象庙堂不豫享,而范宁等皆从祀。请释奠十哲于上,而图七十子于壁。曾参以孝受经于夫子,请享之如二十二贤。’乃诏十哲为坐像,悉豫祀。曾参特为之象,坐亚之。图七十子及二十二贤于庙壁”(《新唐书·礼乐志五》)。

五代后周显德二年(955),“别营国子监,置学舍。宋因增修之,塑先圣、亚圣、十哲像,画七十二贤及先儒二十一像于东西庑之木壁”;宋太祖赵匡胤还亲自撰写了《先圣赞》、《亚圣赞》(见《宋史·礼志八》)。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立孟轲、扬雄像于庙庭,仍赐爵号”;“诏封孟轲邹国公”。元丰六年(1083)冬十月,“封孟轲为邹国公”。七年五月“壬戌,以孟轲配食文宣王”(见《宋史·神宗本纪三》)。徽宗大观二年(1108),从通政郎侯孟请,绘子思像,从祀于左丘明二十四贤之间。……又诏改封曾参武成侯。“政和三年(1112)……以兖国公颜回、邹国公孟轲、舒王王安石配享殿上”(以上见《宋史·礼志八》)。南宋度宗咸淳三年(1267)春正月“戊申,帝诣太学谒孔子,行舍菜礼。以颜渊、曾参、孔、孟轲配享”(《宋史·度宗本纪》)。“诏封曾参 国公,孔 沂国公”,配享的秩序为:兖国公、 国公、沂国公、邹国公居正位之东面,西向北上,为配位。冉损、冉雍、端木赐、仲由、卜商,居殿上东面,西向北上;冉耕、宰予、冉求、言偃、颛孙师,居殿上西面,东向北上;为从祀。此为十哲(见《宋史·礼志八》)。

综上所述,孟轲的配享起自宋朝。但当时,孟轲的配享地位并不是

没有争议的。北宋神宗熙宁年间，诏封孟轲为邹国公。当时任晋州州学教授的陆长愈奏请于春秋释奠孟子应与颜子并配享之时，就曾引起不小的争议。“议者以谓凡配享从祀，皆孔子同时之人，今以孟轲并配，非是”，提出质疑。礼官们据理力争，说：“唐贞观以汉伏胜、高堂生、晋杜预、范宁之徒与颜子俱配享，至今从祀，岂必同时？孟子于孔门当在颜子之列。”一时争论激烈，只是由于宋神宗亲自下诏裁令“以孟子配食……自国子监及天下学庙，皆塑邹国公像，冠服同兗国公”，才最终平息了这场争议（见《宋史·礼志八》）。

元朝仁宗延三年（1316）“秋七月，诏春秋释奠于先圣，以颜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封孟子父为邾国公，母为邾国宣献夫人。……至顺元年（1330）……（加封）颜子，兗国复圣公；曾子，国宗圣公；子思，沂国述圣公；孟子，邹国亚圣公”（《元史·祭祀志五》）。至此，四配的名位、名号、封爵等已基本完备。历经数百年的波折、反复，孟子才最终确立在四配中的地位。谁曾料到，至明太祖朱元璋时期，孟子的配享地位又一次受到了冲击。这次可是来自封建皇帝的冲击，看来孟子的配享地位真得要难保了。这其中的原因何在呢？这恐怕要从朱元璋和孟子两人身上去找根源了。

朱元璋为何如此恼怒孟子

首先，这要从对儒生首鼠两端的朱元璋身上找原因。在朱元璋一生的政治生涯中，既重用佛、道，又时而杀戮和尚、道士。对儒家、法家等也是如此，虽然他经常大骂李斯、韩非等法家，但他治国思想的精髓又多是从法家著作中生吞活剥而来的。他一向标榜孔、孟，言必称三代，儒家思想似乎是他的惟一旗帜，但他在骨子里又实在看不起儒生。如他命令“有司造成均，凡士人肄习案座，皆以独木为之”，人问其故，朱元璋回答说：“秀才顽，使之坚厚，毋败吾案。”（见《明朝小史》卷1）此虽小事一桩，但可以看出读书人在朱元璋心目中处于什么位置。明朝建立之初，不仅治理地方需要大量人才，而且南京中央政权也需要一批文人学士，朱元璋对于罗致治理天下的贤才包括元遗民，还是曾表现出相当的耐心与真诚的。对于一些早期投奔他的读书人，如宋濂、刘

基、陶安等，他也一度都非常信任。建国前后，对他们也曾给以特殊优待。如把刘基看成是自己的诸葛亮、张子房（良），从不直呼其名，而尊称之为先生，这算是皇帝所能给予的最高礼遇了。洪武初年，在制定处州府税粮时，朱元璋还专门为刘基的故乡青田县减免五合亩税，说是要“令伯温乡里世世为美谈”（《明史·刘基传》）。四先生之一的宋濂，更是一个标准的儒生。他曾做过朱元璋长子朱标的老师，并为朱元璋讲解经史和治国平天下之道。后来任起居注、翰林院学士、知制诰等官，主持修纂《元史》，被称为明代开国文臣之首，是朱元璋的文学、儒学首席顾问，相当长的时间之内，君臣关系相当融洽（见《明史·宋濂传》）。很早就跟了朱元璋的陶安，也同样受到礼重。朱元璋还亲自为陶安的府邸撰写“国朝谋略无双士，翰苑文章第一家”的楹联，使其门楣生辉，文士与荣。

但其他读书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尤其是攻陷大都后从元朝廷转投过来的那些读书人，最为朱元璋所鄙视，最突出的代表人物要推号称元朝“国史”的危素了。危素在元朝曾参与编修《宋》、《辽》、《金》三史，纂写《后妃》等传。明军入大都，“兵入府藏，垂及史册，（危素）言于镇抚吴勉辈而出之。由是累朝实录无遗缺者，素之力也”（《玉堂丛语》卷4）。“危学士素以胜国名卿事我太祖，年既高矣，上重其文学，礼待之。一日，上燕坐屏后，素不知也。步履屏外，甚为舒徐。上隔屏问为谁？素对曰：‘老臣危素。’语复雍缓。上低声笑曰：‘我只道是伯夷、叔齐来。’”（见《前闻记》）如此学富五车之人，尚且受到如此轻慢，其他人就不用说了，动辄惨遭杀身之祸（见拙文《农民皇帝朱元璋的血腥文字狱》）。

朱元璋对历朝历代所给予各路神仙、名人的各种封号也不甚感兴趣。洪武三年，诏革诸神封号，只是对孔子还算宽容，“惟孔子还爵仍旧。且命曲阜庙庭，岁官给牲帑，俾衍圣公供祀事”（以上见《明史·礼志四》）。洪武元年（1368）二月“丁未，以太牢祀先师孔子于国学”（《明史·高祖本纪二》）。又遣使到曲阜致祭，使者临行前，朱元璋谆谆告诫说：“仲尼之道，广大悠久，与天地并。有天下者莫不虔修祀事。朕为天下主，期大明教化，以行先圣之道。今既释奠成均，仍遣尔修祀事于阙

里,尔其敬之。 (《明史·礼志四》) 但当孔子的后人应诏不赴朝时,朱元璋又龙颜大怒。据史料记载,洪武元年(1368)三月,大将军徐达攻克山东济宁,至圣先师孔老夫子的故乡曲阜正属济宁路,朱元璋便传令孔子第五十五代孙元国子监祭酒孔克坚到南京去朝见。孔克坚犹豫不决,称病不出,只派他的儿子孔希学前往。朱元璋疑心这位袭封衍圣公看不起他这个出身微贱的皇帝,感觉受了莫大污辱,虽再三压抑,终是恼怒难消,便拟一诏书,快马送给孔克坚,说道:“吾虽起庶民,然古人由民而称帝者,汉之高祖也。尔言有疾,未知实否。若称疾以慢吾,不可也。”孔克坚这才感觉大事不妙,便日夜兼程地赶到了南京。孔克坚的到来,使元璋转怒为喜。洪武元年(1368)四月初八,元璋在谨身殿态度亲切而温和地召见了孔克坚。八月壬申,诏“衍圣公袭封及授曲阜知县,并如前代制”(《明史·高祖本纪二》)。从此,明清相沿,对袭封衍圣公便只“养之以禄而不任之以事”。朱元璋还赐给孔府土地约60万亩,并钦赐洒扫户115户。如此而已。

但极度自尊、刚愎自用的朱元璋,对于“至圣文宣王”孔子这么一个高高在上灵魂的存在,是一百个不情愿。洪武二年(1369),他就曾下诏说:“孔庙春秋释奠,止行于曲阜,天下不必通祀。”诏令一下,朝野大哗。如时任刑部尚书的钱唐就“伏阙上疏言:‘孔子垂教万世,天下共尊其教,故天下得通祀孔子,报本之礼不可废。’”侍郎程徐也上疏劝谏说:“古今祀典,独社稷、三皇与孔子通祀。天下民非社稷、三皇则无以生,非孔子之道则无以立。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皆圣人也;然发挥三纲五常之道,载之于经,仪范百王,师表万世,使世愈降而人极不坠者,孔子力也。孔子以道设教,天下祀之,非祀其人,祀其道也。今使天下之人读其书,由其教,行其道,而不得举其祀,非所以维人心、扶世教也。”(见《明史·钱唐传》)经过大臣们这么一闹,朱元璋也觉得实在说不过去,只得极不情愿地收回了命令。但他一直又心有不甘,于是几年之后,便把这一腔的无名之火发在了孟子老先生的头上了。

其次,要从孟子的思想中找原因。在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中,“民本”思想在孟子那里表现得最为突出。他有一句名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

轻。”(《孟子·尽心下》) 孟子认为,“土地、人民、政事”是国家的“三宝”,谁能保护人民,那他就一定能称王。因为“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梁惠王上》)。如果残害百姓,就是孤家寡人的“一夫”,这种人是不配得天下的,即使得到天下,也应该被打倒。推翻这样的天子,不是犯上作乱的弑君行为,正如周武王“诛一夫纣”推翻殷纣王的统治一样,是为民除害。孟子说:“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孟子·离娄上》) 得到天下的人,如果失去了人民,那就一定会失去天下。反之,没有天下的人,只要得到人民的拥护,那就一定能得到天下。“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孟子·尽心下》)。就是说,丘民即人民比天子更重要。所以,汉代的赵岐在注“民为贵”一章时所说的“言得民为君,得君为臣,论君民社稷之轻重也”(《孟子注疏·尽心下》),深得孟子的旨趣。

天子若不能保民,天下之人就可以得而共诛之。所以,孟子并不主张天下百姓效忠于一姓一人。孔子曾说过:“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 那么,如果君使臣不以礼,臣将如何办呢?孔子并没有继续往下说。而孟子却接着孔子的话进行了进一步发挥。他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 也就是说,在孟子的心目中,根本就不存在绝对的天子权威,君臣关系也是相对的。他说:“说大人则藐视之,勿视其巍巍然。”(《孟子·尽心下》) 若“天子不仁”,则“不保四海”(《孟子·离娄上》)。这里孟子所说的“仁”,主要是对“民”来说的。为了得到天下,保有四海,天子就必须实行仁政,爱护人民。

那么,怎样才能得民呢?孟子认为,要为民所想,不要把人民厌恶的东西强加给他们。“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离娄上》)。即为民兴利和为民除害,孟子把这种“以德服人”的政治称之为“仁政”、“王道”。与此相反,“以力服人”而丧失民心,孟子称之为“霸道”、“暴君”。比较这两种政治,孟子进一步认为“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天子若“以德服人”,就是

“仁者”，而仁者则是无敌的（见《孟子·梁惠王上》）。“仁者”为什么会无敌于天下呢？孟子说是因为“得道”，“得道者多助”，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得“人和”，当然也就会所向无敌了。以力服人的暴君，企图用武力征服别人，就不断地发动战争，“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这样就犯了大罪，应该“服上刑”（《孟子·离娄上》）。生活于战国战乱不休、杀人如麻这种乱世之中的孟子，能有这些超越时代的思想，是难能可贵的。但这些思想火花，对正欲通过强权建立朱家千秋大业的朱元璋来说尤其刺眼。再加上朱元璋本来就对孟子那个时代异说纷呈的各种学说很反感，还在洪武元年的一次与儒学之臣讨论学术问题时，朱元璋就曾说过：“战国之时，纵横捭阖之徒，肆其邪说。诸侯急于利者多从之，往往事未就而国随之以亡，此诚何益？”“邪说之害道，犹美味之悦口、美色之眩目”，“夫邪说不去，则正道不兴，天下焉得而治！”（《明史纪事本末》卷14）基于这种心理，政暇之时，经常翻阅作为儒家经典著作之书《孟子》的朱元璋，看到这些内容就不高兴了，因此厄运也就必然地降落到孟子的头上了。

事件的始末和结果

罢全国普遍祭祀孔子的问题最终没能执行，朱元璋本来就一直耿耿于怀。洪武五年的一天，朱元璋不经意之中又在翻看《孟子》，见那“民贵”，“君轻”，“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以及“霸道”、“暴君”、“一夫”之类的话，更觉得如芒刺在背。一边读，一边骂道：“如此荒谬之言，哪里像臣子说的话？”“倘此老在今日，岂可免我一刀”。当天就命令将孟子逐出文庙的殿外，不得配享。并发狠地说，诸大臣“有谏者以不敬论，且命金吾射之”（《明朝小史》卷2）。看到这个圣旨，满朝文武，惊恐不知所措。这时，刑部尚书钱唐挺身而出，抗疏直言，为孟子鸣冤。朱元璋当然是愤怒异常，内侍把皇上动怒的情景描述给钱唐。钱唐说：“臣为孟轲而死，死有余荣。”（《明史·钱唐传》）说罢，让人抬着事先准备好的棺材，袒着胸，抱着必死的决心，直

向奉天殿方向走去（见《闲中今古录摘抄》卷1）。朝堂的大臣都为钱唐捏了一把汗。内侍们也飞跑进去禀报。只见朱元璋果然命“金吾”卫士杀气腾腾地引满弓，正等着钱唐的到来。见到钱唐视死如归的模样，气头上的朱元璋更加恼恨，便真的让“金吾”卫士连射了好几箭，钱唐的左臂、右肩、胸部都中了箭，被射倒在朝堂上，但仍然挣扎着向皇帝座前爬去。看着钱唐痛苦而坚毅的样子，朱元璋终于退缩了。此事之后，朱元璋不仅没有因此而治钱唐的罪，还命令太医院的太医仔细地为他治疗箭伤（见《明朝小史》卷2）。第二年，冷静下来的朱元璋，就下了一道谕旨说“孟子辨异端，辟邪说，发明孔子之道，配享如故”，算是极不情愿地把孟子的牌位又请了回去（《明史·礼志四》）。如此说来，钱唐对亚圣孟子可谓居功至伟，难怪后人对其赞不绝口了，后人有诗云：“引棺绝粒箭当胸，拼死扶持亚圣公。仁义七篇文莫蠹，冕旒千载绘仍龙。批鳞既奋回天力，没齿终成卫道功。那得洪恩遍寰宇，泮宫东畔置祠宫。”（见《闲中今古录摘抄》卷1）

但朱元璋觉得这个孟老头实在有点讨厌，什么“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什么“草芥”、“寇仇”；什么“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什么“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未闻弑君也”；什么“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等，这些真有点像是指着鼻子在数落自己。特别是《孟子》又是官定的《四书》之一，各级学校用来做教本，科举考试用来命题，这岂不把天下的学子们都教坏了？至洪武二十七年，朱元璋最终还是没有放过孟子。既然配享不能动，我动你的书应该可以了吧。于是，命令翰林学士刘三吾对《孟子》进行删节。82岁的翰林学士刘三吾奉命后战战兢兢，经过反复揣摩，共删掉85条朱元璋感到刺眼的内容，保留170余条，成《孟子节文》一书。朱元璋立即下了一道诏书，规定“自今八十五条之内，课士不以命题，科举不以取士，一以圣贤中正之学（指《孟子节文》这部书）为本”（刘三吾《〈孟子节文〉题辞》）。孟子配享的这段公案，到此才算结束。

（作者单位：中华书局《文史知识》编辑部）

（责任编辑 徐庆全）

胡耀邦如何对待“清污”

好一个“小兵”金敬迈

集体世袭与“权力场”

走在艰难平反路上的一年

托派老人刘平梅

一把手更需制衡

ISSN 1003-1170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定价: 5.80元